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朱立 教授



卑微與崇高：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
的自我角色認知

研究生：廖珮雯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謝辭

終於來到離別的時候。我一個人飄洋過海到外地念書，轉眼已過了兩年。回想這兩年重回校園的生活，讓我再度感受到校園環境的單純和學習的樂趣。我曾經在新聞界待過，經歷社會上的各種嘴臉、人情冷暖、勾心鬥角、小人的設計陷害，而木訥笨拙的我，仍然學不會人際關係的圓滑處事。所幸，在校園裡，我不需要面對隨時會陷害自己的同事，不用提心吊膽地防備小人。我只需要懷抱單純開放的心，面對給予我無私奉獻和溫暖關懷的朋友們和老師們，專心致志地在知識的海洋裡暢泳。這與社會的經歷和感受截然不同，讓我備覺溫馨和感恩，對於曾經幫助過我的無數個人，內心深切的感激難以一言道盡。

我在碩一下學期幸運地修了朱立老師的採寫課，並找老師擔任我的指導教授。在老師悉心指導下，他給了我明確的論文寫作方向；在我極度沮喪之際，適時地鼓勵我安慰我；對於我無法在時限內完成應該完成的部分，老師也給予最大的包容。老師就好像我在台灣的父親，總是以最大的包容心和愛心，給予關愛和照顧。至今，回想起來，老師給予的心靈輔導和教導的生活哲學、做人處事的態度，更讓我印象深刻。

在經濟狀況沒有很優渥的情況下，我靠著自己工作的積蓄和在校園打工的薪資，完成了兩年的碩士課程。感謝政大老師的幫忙，讓我可以靠打工賺取生活費。我要感謝彭家發老師，教給我很多生活道理；林元輝老師，了解我需要工讀後，盡力協助我；汪琪老師，我對於我常出包的工作表現，深感抱歉與內疚；梅芳助教，見我常跑系辦詢問助學金的事，也讓我在系辦打工；國發所的彭立忠老師，聽說我需要工讀，就熱心地分配我一些工作。最後，我要感謝馮建三老師，在我去香港交換之前，給予我行政上的多方協助，在我回來後，一聽到我還沒找到工作，也立刻爽快地答應幫助我，我真的非常感激！謝謝各位老師在我需要經濟援助的時候，向我伸出援手，讓我得以順利完成學業，我打從心底對老師們抱著深深的感謝！

我還要感謝我們這一屆的導師筱玫老師，政大新聞所教過我的老師，彭芸老師、蘇蘅老師、羅文輝老師、柯裕棻老師、馮建三老師、王泰俐老師、翁秀琪老師和社會所的苗延威老師。此外，在我到香港中文大學交換的一學期中，我有機會向 Louis、Sidney 和 Amy 三位老師學習不同取徑的學術研究，讓我大開眼界。

感謝論文口試委員陳百齡老師和胡幼偉老師，願意撥冗閱讀我的論文並提出寶貴的建議。

除此之外，我還要感謝讓我在山上校園賣便當的慈賢樓老闆和老闆娘，以及我工讀了兩年的圖書館參考室。每當我到圖書館打工或到檢索室寫論文時，熱心的館員們都會給我最大的鼓勵和支持，讓我感動莫名。和我一起工作的碧珠姐、相如姐，常常告訴我寫論文的心得；還有寶琇、怡雯、冠穎、愛麗學姐，一直給我精神上的支持。

感謝所有接受訪問的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他們在繁忙的採訪工作中，還願意撥出幾個小時接受我的訪問，而且他們很樂於把工作上的採訪經驗與我分享，也不吝把對馬來西亞新聞界的想法告訴我，讓我獲益良多。

此外，在這次回國訪問前的準備過程中，我要感謝所有曾經幫我聯繫受訪記者的馬來西亞朋友，ayao、德糧、國偉、來星、巧晶、錦發、愛麗學姐、慧嬌學姐以及各報副總編輯。還有在我完成訪問後，拼著「老命」幫我打逐字稿的來星、愛娣、ayao 和我最親愛的妹妹珮瑜。謝謝國偉的數據資料。

感謝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像媽媽一樣幫助我、鼓勵我，幫我加強信心的楊媽媽。每次光顧都會陪我聊天和鼓勵我的私房面老闆和老闆娘，謝謝你們在我口試當天

中文摘要

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構成馬來西亞的三大種族，馬來人占馬來西亞總人口半數以上，華人和印度人屬少數族群。馬來族群享有憲法上的特權，在政治、經濟、文化、語文、教育上，華人則一直遭受不平等待遇，受到歧視。馬來西亞的報界也反映了這個多種族的不平等特質，馬來文報和英文報具有政治和語言優勢，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而華文報的影響力只侷限在華人圈子。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便是：在這種大環境下，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角色的自我認知。

本論文以 Cooley 的「鏡中自我」和 Mead 的「概化他者」為理論基礎，再引用 Strauss, Stone 和 Goffman 強調的情境式 identity，配合 Hirsch 提出的職業、組織、制度三個研究分析層次，來深入分析華文報記者在不同層次的工作場域，以及面對不同的概化他者，所型塑出的自我認知類型。

筆者以滾雪球的方式，訪問了 18 位在吉隆坡的華文報記者，每位做了一至二小時不等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在職業層面，面對華文報同行，記者有糊口飯吃和受同行認同與賞識的自我認知，而這種自我認知則受記者在報館地位和新聞組別的影響。當面對外文報同行時，有的記者的自我認知是高人一等和承認自己弱點，而有的記者則頗負面，有不屑與卑微的自我認知。

在組織層面，本研究發現，記者面對報館這個概化他者時，出現三種情況：在主流與非主流報章的差異方面，非主流記者的自我認知受到報館地位的影響小，反而因為在報館享有較少的規範與約束而產生高自我認知；相反地，主流報章記者的自我認知，則因為報館地位和規範與約束的影響，產生正負兩種自我認知。此外，記者也會因報章風格而影響自我認知。在大報方面，記者的自我認知不會受報章銷售量滑落影響，反而因為報館的名聲、影響力、地位以及悠久的歷史而產生高自我認知。

在制度層面，本研究將記者與報業環境作連結，發現記者都將造成自我認知卑微的原因歸咎於外在的結構因素，包括華文報業結構和政治環境，卻沒有發現本身語言能力、專業素質和態度的不足，也是出現卑微的自我認知的因素之一。當記者面對政治力量和法令時，產生三種類型的自我認知，包括敢於挑戰、自我設限和反感。

本研究也發現，受到了馬來西亞各種族不平等的政、經、社、教情境的影響，華文報記者有既自大又自卑的自我認知。本研究係質性的「厚描」，將來如有人做量化的社會調查，當能使我們對馬來西亞的華文報與華文記者有更全、更深的認識。

關鍵字：馬來西亞華人、自我、他者、自我認知

目錄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背景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2
第三節 研究架構和研究問題	5
第二章 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環境的政治及經濟概況	6
第一節 1957年獨立前的種族情況	6
第二節 獨立前後（1946-1969）	7
第三節 1969年的後續發展（1969-1981）	9
第四節 馬哈迪時代（1981-2003）	10
第五節 現任阿都拉時期（2003-2008）	11
第三章 報業環境	14
第一節 三種主要語文報的沿革	14
壹、華文報的源起與概況	14
貳、各家華文報概況	16
參、馬來文報概況	19
肆、英文報概況	19
第二節 報業集團和執政黨的關係	21
壹、華文報業大亨張曉卿和世華媒體集團	21
貳、馬華和南洋報業集團	21
參、巫統和馬來前鋒報集團、新海峽時報集團	22
肆、小結	23
第三節 影響報業的法令	24
壹、印刷與出版法令	24
貳、官方機密法令	25
參、煽動法令	25
肆、馬新社法令	25
第四節 馬來西亞報業環境小結	26
第四章 文獻探討	28
第一節 自我認同與社會互動	28
壹、有關「自我」的理論	28
貳、社會情境下的認同（identity）	32
參、社會情境下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	35
第二節 相關記者研究	37
壹、Hirsch的三個分析層次模型	37
貳、職業性分析層次	38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背景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而東南亞華人的認同程度不一，在不同的國家社會中有不同程度的同化情況。當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執政以後，東南亞華人從落葉歸根的觀念轉為落地生根，開始向當地政府效忠，以生活的地區為依歸，並根據各地不同民情，以不同的生存策略來融入當地社會，因此華人的認同問題是值得探究的有趣領域。

然而，海外華人被當地居民接受的程度不同，也引起各地華人的不同反應。各地的華人根據國家政府的政策、國情，策略性地回應所遭遇的對待。以馬來西亞華人為例，在政治地位低落的情勢下，為維護華族文化和華文教育這些民族根本，華文報和華人社團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華文報更肩負民族使命，在華社發揮傳承和宣揚文化的功能。而作為華文報的記者，鑒於華人地位在馬來西亞屬於被統治者的身分，雖然肩負使命，但在殘酷的現實大環境中，他們對馬來西亞整個社會環境的回應及反應是值得深究的。當研究海外華人的學者針對海外華人在當地的社會生活，如何影響他們的認同及認同轉化時，筆者認為，對華社負有使命，卻又受限於種族政治環境的華文報記者自我認知的情况，也是應該被關注的。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是中港台之外，發展最為蓬勃的華文報業。過去有關馬來西亞報業的研究中，多集中在報業的發展與功能，報業與華社、華教之間的關係，報業受政府或政黨監控的情況，財團壟斷報業的影響等，鮮少對華文報的記者展開詳細深入的研究。除了葉觀仕的《馬新報人錄》通過歷史的脈絡敘述殖民時期到獨立後出現的著名報人外，尚無文獻針對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學術研究。海外華人認同是學者關注的課題，但筆者認為作為對華人社會有影響力的華文媒體的自我角色認知，或許有其值得研究之處。

王賡武在 1970 年的《馬來亞華人的政治》一文中，根據政治集團的類型將華人分為三種。其中甲集團主要認同中國政治；乙集團人數眾多但組內差異大，集團內的階層涵蓋層面廣泛，包含擁有經濟權勢的華團領袖，也包括低階工人的草根階級，政治態度隨著時間演變出現程度不一的變化，此轉變較不易全面掌握，而在文化教育的態度則是以保障民族根本為原則；丙集團包含對馬來西亞政府效忠的海峽華人精英，這群人大多為受專業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在政治方面掌握權力，領導華人，同時也有少數倡導多元種族社會的反對人士。

本研究想要探究的是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在華人政治地位低落的大環境，以及華文報業發展備受約束的情況下，記者對自我角色認知的情况如何。他們的認知在不同的情況下，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可能出現對自我角色的不同認知類型。隨著工作環境的不同階層，記者面對同行、報館、報業環境的不同層面，認知類型會有所不同。本研究擬探尋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在同行、報館、報業環境不同層面的「概化他人」為何，以及這些「概化他人」在不同層面與記者的互動關係與情况，同時他們如何影響記者本身的自我角色認知。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壹、馬來西亞華人的地位

馬來西亞華人自獨立以來，由於憲法明文規定賦予馬來人特殊權利，因此華人在國家體制和憲法上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在政治、經濟、文化、語文、教育等方面，華人總是和掌握馬來西亞統治大權的馬來政治精英展開拉鋸戰，在各種相關族群權益的課題向馬來政府極力爭取。不論是任何領域的課題，在馬來西亞種族關係緊張的社會環境中，很輕易地被泛種族化，尤其是被實際統治馬來西亞的馬來政黨－巫統的種族極端主義份子炒作，經常以馬來人的特殊地位被非馬來人威脅之類的話來危言聳聽，讓馬來人信以為真，激化尖銳的種族關係，使馬來人和非馬來人之間，總是存在著既互相依存又互為威脅的敵友關係。

從歷史脈絡來看，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地位在聯邦憲法的制定時已被奠定；經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種族流血衝突的洗禮，華人作為被馬來人統治的臣屬地位進一步地被確立；馬來人在政治上通過巫統在國陣的獨霸地位呼風喚雨，主掌大權；並通過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享受國家豐富的經濟和教育資源，形成新興馬來中產精英階級和專業知識份子；馬來西亞政府並通過「國家原則」，明確規定馬來西亞「就是」馬來人的國家，將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不容任何種族挑戰的憲法內容，作為公開的政府原則，且成為實際政策。而作為少數族群的華人和印度人，原本應有的公民權益被逐漸蠶食。

到了1987年，因為「華小高職事件」引起「茅草行動」的大逮捕事件，三家語文報被勒令關閉，此種打壓媒體的舉動，除了強制國內媒體禁聲，也令作為華社發聲筒的華文報章嚴格要求自我審查，以防政府秋後算帳，華人對於維護種族權益的課題更加小心翼翼，以免踩到主掌政經大權的馬來族群的底限。

近幾年來，雖然馬來西亞經歷了五任首相，華人備受歧視的不平等待遇依然持續。2007年，一名在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華人改編馬來西亞國歌，填上華文歌詞，內容是有關華人遭受不公待遇的事實，並放上youtube。由於歌詞切入實情，赤裸裸地暴露出馬來人蠻橫的專權，點擊率高企，巫統控制的馬來文報章以此大作文章，抨擊華族，並聲言要將這位留台學生繩之以法，youtube也出現充滿種族情緒且措詞強烈的留言。一件對國歌不敬的事件竟演變成種族課題，並引起軒然大波。此事件在馬華的干涉下，由學生公開道歉了事。馬來西亞種族問題彷彿是無法痊癒的傷口，稍一觸碰就引起劇烈痛楚。

貳、馬來西亞華文媒體概況

在馬來人享受憲法和制度帶給他們的特殊權利時，華人仍得在文化、教育和經濟上為維護自己應得的種族權利苦苦掙扎。為維護作為華人文化在海外的根，華社一直以來依賴華文報、華人社團、華文教育這三類最初由民間自發籌辦的機構，在異鄉竭盡所能地保留與傳承華人文化。

因此，華文報對於馬來西亞華人來說，一直有傳承傳統文化、保護華族權益、延續華教使命的功能，也是華社繼華文教育之後，細心維護的一塊屬於華社的領域，華文報對於華社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華文報通過大量發行，傳達華社的心聲、向政府

第二章 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環境的政治及經濟概況

馬來西亞是擁有多元種族的國家，由數十個不同種族組成（黃招勤，2004），其中以馬來族、華族和印度族為主要的三大種族。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於 2007 年的調查，全國人口約 25,265,800，其中土著（含馬來族和各族原住民）佔 16,768,000 人，當中的馬來族就有 13,773,100，原住民只有約 2,994,900。馬來西亞華人約 6,287,900，印度人約 1,883,900。另外，尚有 326,100 屬於其它種族。以百分比來看，土著佔了 66.3%，其中馬來族佔了 54.5%，原住民 11.8%；華族佔 24.9%，印度族佔 7.5%。以華人人口的百分比來看，自馬來西亞 1957 年獨立以來，華人人口從當時的 37%，降至 2007 年的 24.9%，50 年來降了 13%（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08）。華人人口的逐漸減少，被學者認為是政治力量薄弱的因素之一（Lee & Heng, 2000）。瞭解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的政治、經濟概況，有助認識華文報記者的認知。

馬來西亞分為西馬和東馬，東馬就是沙巴和砂勞越兩州。由於東馬的政經情況和西馬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研究西馬的報業情況，因此，嚴格地說，本研究提到的馬來西亞是西馬，而不是指東馬。

表 2.1 2007 年馬來西亞族群人口統計

族群	('000)	%
土著	16768.0	66.3
馬來人	13773.1	54.5
原住民	2994.9	11.8
華人	6287.9	24.9
印度人	1883.9	7.5
其它	326.1	1.3
總人口	25265.8	100.0

數據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第一節 1957 年獨立前的種族情況

馬來西亞在獨立之前是英國殖民地。自 19 世紀開始，英殖民政府為了開發，從中國大陸、印度半島，及現在的印尼地區移入大量的勞工。這些原本以「契約」方式移入馬來半島的各種族勞工，因為當時世界經濟大恐慌和政治局勢的變遷，以及二次大戰的爆發，使當時馬來西亞的流動勞工社會，轉變為長久定居的移民社會。中國籍和印度籍勞工因此留在馬來西亞，與馬來人組成三大種族的多元社會。在數量上，馬來人略勝華人，印度人又次；但在地理分布上，馬來人傾向聚居農村，華人則集中都市，在生產方式上則偏向工商業（楊建成，1982）。

英殖民政府在馬來西亞對各種族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在馬來人的統治策略方面，英國人通過蘇丹貴族間接控制馬來人民，賦予他們政治上的合法地位，但卻在經濟上將他們限制在糧食生產方面（楊建成，1982），即稻米和農作物的種植，妨礙馬來企業階級的成長（Heng & Sieh, 2000）。

在統治華人方面，英殖民政府通過華人社群的精英管理華人。這些精英一般都是擁有經濟權力，並與地方馬來首領有密切關係的華人私會黨領袖，或者是成功的商人、

錫礦主和企業家 (Lee & Heng, 2000)。這些華人領袖在地方事務上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特別是教育事務 (Freedman, 2000; Lee & Heng, 2000)。此外，華人社群爲了在以馬來人爲主的環境中維持社會和文化上的特殊性，由華社精英領導的各種社團紛紛興起 (Freedman, 2000)，在華人的社區福利和文化教育上有很大的貢獻。

華人在經濟方面，主要從事錫礦業和橡膠業，經濟勢力深入社會各階層。另一方面，華人在製造業、原產品輸出業、金融業的經營勢力龐大；在航運業、生產事業、商業上的地位更爲雄厚，華人各種商業組織，不僅遍及各大城市，更深入窮鄉僻壤 (宋哲美, 1963: 84-86)。華人商人運用他們全國性網絡的公會、社團、組織，管理商業交易、周轉資金、交換市場訊息、開發新市場、解決商業糾紛 (Heng & Sieh, 2000)。他們擁有和經營大多數非歐洲的商業機構，且是第二大的投資來源。(Phang, 2000: 97-99)。

而英殖民政府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種族關係的緊張與惡化 (陳劍虹, 1984)。華人掌握經濟優勢，馬來人享有政治特權。當時兩大族群數量相當，因此華巫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種嚴格的層級關係 (楊建成, 1982)。

二次大戰後，新興民族主義開始興起，被殖民者開始反思並號召獨立建國，世界主要殖民地紛紛成立獨立國家，但由殖民地政府「製造」並遺留下來的多元族群社會，卻在組建而成的獨立國家內產生問題，各種族在政治、經濟、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競爭角力，常常因種族問題引起衝突，至今許多戰後獨立的多元族群國家仍無法有效且妥善地解決，成爲隨時引爆的計時炸彈。

因此，自殖民地時期構成的多元族群社會，以及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管理文化，使獨立後的馬來西亞種族關係緊張且衝突不斷，無論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項領域，常常因爲各族待遇不公平的問題而引起弱勢族群抗議反對，種族課題成爲馬來西亞獨立 51 年後依然引起眾多爭議的重大課題。而馬來西亞在二次大戰後爭取獨立的那段時期，則是奠定日後種族衝突根源的關鍵時期。

第二節 獨立前後 (1946-1969)

壹、二戰後的政治發展與聯邦憲法的制定

二次大戰後，馬來民族主義興起，向英殖民政府爭取獨立。1946 年，由受英國教育、保守的馬來貴族組成的巫人統一組織 (簡稱巫統, UMNO,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隨著成立，以爲馬來族群爭取權益。

1948 年，當英殖民政府實行保護馬來人特殊地位的「馬來亞聯合邦」計畫 (Federation of Malaya) 後，馬來亞共產黨 (簡稱馬共, MCP,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展開武裝起義，英國殖民政府隨即宣佈「緊急狀態」(Emergency)。馬共成員和支持者主要爲華人，這種形勢激化了華人和馬來人的衝突。

一些保守的華人爲確保華人得到合法的政治地位，於 1949 年在英國的支持下成立馬華公會 (簡稱馬華, MCA,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這群華人領袖接受英國教育，他們並不注重中國，而是極力以建立一個獨立的馬來西亞爲目標 (Freedman, 2000)。

1955 年，聯合邦舉行首次大選，馬華與巫統加上印度國大黨 (簡稱國大黨, MIC, Malayan Indian Congress)，組成巫華印聯盟 (UMNO-MCA-MIC Alliance)，並在大

選中大獲全勝，這使三大種族組成持久的政黨聯盟，以符合國內種族之間的政治情勢。

勝選的執政聯盟著手進行獨立事項，以及制憲工作。1956年，英政府、馬來蘇丹、及聯盟政府三方面代表在倫敦開會討論馬來亞獨立問題。新制訂的聯邦憲法強烈符合馬來人權益，包括馬來人特權（special privileges）無限期延長；馬來人享有較大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和獎學金；議會中不許用馬來語和英語以外的語言發言；馬來文是國家語文等（Lee & Heng, 2000；楊建成，1982）。

從憲法的內容看來，華人的地位備受威脅。華文和華文中學沒有獲得官方的承認。麥留芳（1997；轉引自黃招勤，2004）指出，馬來人對華人歧視也是寫在憲法裡。而馬華唯一為華社爭取到的，是公民權原則上對華人開放。Freedman（2000）認為，有關非馬來人的經濟主導權使到在憲法上制度化馬來特權，而華人願意妥協以交換公民權和華文教育的適度保護。

當時各族群政黨以協商和交換的方式各自取得好處，任元傑（1985）提到，馬來人控制政府，得到一個以馬來風格（style）、馬來符號（symbol）為主的政體；而華人也得到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所沒有的待遇——公民權、有限的政治參與及擔任公職，更能保持他們的語言、宗教與文化特徵。這種共同同意的安排，使馬來西亞在1969年之前得以維持相當穩定的政治局面……馬來人享有政治及政府職位的優先權，而華人繼續經濟上的優勢。

貳、聯盟政府時代的經濟情況

在1950到1969年期間，馬華在聯盟政府裡掌握經濟大權，使華人企業在經濟上得益甚多。馬華領袖在政治上雖臣屬於巫統，但卻比巫統領袖更能行使經濟影響力（Heng & Sieh, 2000）。雖然在充斥著馬來人特權的憲法上，華人獲得公民權和經濟權益，卻失去了文化、語言、教育的地位。

馬華在掌握經濟大權的情況下，這個時代的經濟模式出現了「阿里峇峇企業結盟」（“Ali-Baba” business alliances）的合作形式。這樣的合作模式是馬來夥伴（Ali）接受金錢，以確保生意妥當，但只是「沉睡」的夥伴；而華人夥伴（Baba）則是作政策決策和控制企業操作的實際執行者（Heng & Sieh, 2000）。

華人企業家在這種合作模式下，紛紛崛起，發展為龐大的企業集團。同時，馬來新興富豪也因為與華人企業家的結盟而出現，且大多數為巫統政治人物（Shamsul, 1996；轉引自 Heng & Sieh, 2000），形成巫統的權貴階級。成功運用與馬來執政精英的關係而致富的華人企業家包括曾經收購《南洋商報》和《中國報》，組成南洋報業集團的郭令燦（豐隆集團 Hong Leong Group, 謙工業 Hume Industries Malaysia）。

但是，華人取得經濟優勢而馬來人在工商業的成就落後於華人，使馬來人對於華人控制經濟勢力大為不滿；而華人對於本身族群在政治、文化和語言處於劣勢的情況，也對馬來人深表不滿。這使種族問題尖銳化，並最終導致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這場暴動從此劇烈地改變了馬來人和華人在政治及經濟上的地位和權利。

第三節 1969 年的後續發展（1969-1981）

壹、政治發展：五一三事件、國家原則

馬來人和華人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在 1969 年 5 月大選達到頂峰，爆發「五一三事件」。事緣華人反對黨民主行動黨和民政黨大勝聯盟政府，使馬來人感受到華人對馬來人特殊地位的威脅。在大選後的 5 月 13 日，馬來人與華人發生流血衝突。據統計，此次衝突中，90% 的吉隆坡華人失去家園和財產，870 餘名華人死亡，馬來人和印度人死亡人數分別為 220 餘人和 60 餘人（Lee & Heng, 2000: 207；楊建成，1982: 238-255）。

關於這次種族暴動的原因，不同學者都對此作出分析。陳鴻瑜（2006:620）指出，馬來人和華人的衝突來自社會內部的嚴重問題，第一、馬來西亞政治是由經濟力量較弱的馬來人所控制；第二、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增大。王國璋（1997:96）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一是日趨尖銳的族群政治環境，也就是掌握政治大權的馬來族群無法獲得經濟上的優勢；二是社會階級間經濟利益的衝突。Freedman（2000）則指出，族群經濟的不平衡是造成衝突的根源。他認為是因為富裕的華人和較貧窮的馬來人之間的經濟不平衡所致。

根據王賡武（1970）的看法，他從政治角度指出內在和外在的政治因素。內在因素包括年輕馬來族群對巫統感到失望，以及年輕華裔選民對於馬華輕視文化教育而感到不滿；外在因素是新加坡和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加入又退出的民族政治，中國和印尼的外部局勢，對華人和馬來人產生影響。王賡武提出的內在政治因素和上述學者提到的族群政治環境相仿。當時的政治局勢因為族群各自被分配的利益有所差距，造成種族關係充滿緊張與衝突。

種族衝突事件過後，馬來西亞政府通過修改憲法，頒布「國家原則」⁴，內容共有五條：1) 信奉上蒼；2) 忠於君國；3) 維護憲法；4) 尊崇法治；5) 培養德行，各族人民都必須遵守。

此外，政府推行新經濟政策，組成國民陣線，以維持種族之間的社會秩序。此新組成的執政聯盟由「聯盟」（Alliance）改名為「國民陣線」（簡稱國陣，BN, Barisan Nasional or National Front），從 3 個成員黨擴大至 14 個。此外，在巫統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禁止任何行爲、言論、出版物在「基本課題」上煽動種族仇恨，包括馬來特權、非馬來人公民權、回教為國教的地位以及馬來文為唯一官方語文的地位（Lee & Heng, 2000；陳鴻瑜，2006）。

在經歷 1969 年大選慘敗後，國陣內的華基政黨馬華，它的政治影響力逐漸削弱，只能從屬於國陣最大黨巫統，在政治上受巫統控制。這次的種族暴動標示著馬來領導層主掌大權，將馬來人憲法上的特權轉變為實際政策（Freedman, 2000）。

貳、經濟發展：新經濟政策

1969 年的種族暴動後，首相敦拉薩制定新經濟政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將華人的財富重新分配給馬來人和其他土著，把馬來人帶進原本由華人支配的經濟領域

⁴馬來西亞國家原則馬來文原文為：Rukun Negara: 1)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4)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5)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英文原文：Principles: 1) Belief in God; 2) Loyalty to King and Country; 3) Supremacy of the Constitution; 4) The Rule of Law; 5) Mutual respect and good social behaviour

第三章 報業環境

馬來西亞主要有三種語文報，反映了該國的種族結構，包括華文報、馬來文報和英文報，本章介紹各種主要語文報章歷史源起、報紙風格、銷售狀況、報業結構及政府對報業的管理，作為我們分析華文報記者自我認知的基礎。

第一節 三種主要語文報的沿革

壹、華文報的源起與概況

要瞭解華文報記者的認知，不可不先認識馬來西亞華文報的歷史背景與現況，從華僑報章到華人報章的轉變、政府管制媒體的先例，以及華文報界概況。此外，華文報界五家全國性報章：《星洲日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和《東方日報》也將逐一簡介。

一、從華僑報章到華人報章

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歷經華僑報章到華人報章的轉變，這項轉變主要是因為二次大戰後，東南亞民族主義興起，脫離西方殖民統治的各地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此時中國境內國共全面內戰，1949年中共成立政權，長期居住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包括生長在當地的華人，從落葉歸根轉變為落地生根的心態。這時，馬來西亞華人所辦的華文報已站在當地人的立場而成了華人報章，不再是華僑報章，當時，華文報業亦大力支持脫離英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朱自存，1994）。

最初，華文報的創始及發展都在新加坡，50年代馬來亞聯合邦的華文報讀者，每日所看的多是從新加坡運來的報紙。後來基於馬新在1965年分家的政治局勢，在馬來西亞設廠的新加坡華文報《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亦隨著形勢轉變而馬新兩地分家（朱自存，1994:17-45）。

二十世紀70年代，以新加坡為基地進入馬來西亞設廠印刷的華文報，資本方面本地化。馬來西亞政府加強了立法的限制，減免了外國人對馬來西亞報業的操縱。國會於1974年通過印刷業（修正）法案，規定外資的擁有權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其他股權歸本地人所有。到了80年代初期，華文報業的資金及人才的馬來西亞化已然完成（朱自存，1994；崔貴強，2002:54）。80年代末期與9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華文報業走向集團化，而一些無法經營下去的報館也隨之倒閉，使原本擁有8家華文報的西馬華文報業，僅剩4家報紙繼續生存。如《星檳日報》和《建國日報》都於1986年停刊。《通報》與《新明日報》也因為銷量呆滯，報份下跌，於1994年及1996年先後收盤（崔貴強，2002:65）。

二、政府管制媒體的先例

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發生「五一三事件」，政府下令所有報紙於16日暫時停刊3天，同時在緊急法令下，在吉隆坡成立「新聞管制中心」，實行新聞檢查制度。《中國報》還因刊登了一則法院新聞，被勒令停刊10天。當時，由新加坡印刷的

各語文報刊也不准入口。東、西馬有多名總編輯，編輯與記者被扣留，在內部安全法令下坐牢半年至兩年不等，對當時的華文報也造成了不小的打擊（葉觀仕，1996）。

1987年，馬來西亞爆發了一場代號「茅草行動」的大逮捕事件。三份不同語文的報紙，即華文《星洲日報》、英文《星報》（The Star）和馬來文《祖國報》

（Watan）的出版准證被吊銷及停刊（星洲日報，2008:66）。當時副內政部長指出，這三家報章利用敏感課題，如教育、語文、宗教及種族權利，為個別族群利益鬥爭，不顧各族和諧、公眾安寧及國家安全，刊登挑起種族情緒的文章和新聞，因而被吊銷准證。這三家報社在1988年3月重新獲得內政部發予出版准證（莊迪澎，2004a；葉觀仕，1996）。這是馬來西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刻，也是馬來西亞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茅草行動」至今仍是馬來西亞人心裡無法抹滅的傷痛（星洲日報，2008:66）。

三、華文報界概況

馬來西亞統計局2007年的數據顯示，馬來西亞所有語文報章在2006年的總銷售量約為3,820,000份，華文報的平均銷售量為753,000份，英文報的平均銷售量為1,002,000份，馬來文報的平均銷售量為1,914,000份。馬來文報的銷售量是所有語文報章中，平均銷量最多的語文報。

華文報在報界的地位始終不及外文報的地位和影響力，華文報作為商業機構，對廣告刊戶缺乏吸引力，盈利不及外文報，欠缺發展餘地。此外，一項重要的事實是：華文沒有官方語文地位，也影響了華文報以及華文報人的地位（朱自存，1994:155）。

而馬來西亞華文報在報導華裔政黨和社團新聞方面，用了相當大的版位。華團和社團依賴媒體將它們的意見、動態，傳達給華人社會，華文報負起這項任務，亦是取得讀者支持的一個重要因素（朱自存，1994）。

馬來西亞的全國性華文報章共有五家，分別是《星洲日報》、《中國報》、《南洋商報》、《光明日報》和《東方日報》。此外，還包括總社在檳城的地區性報章《光華日報》。《星洲日報》自1991年迄今，一直居於領先優勢，確定了華文第一大報的位置。《南洋商報》在1990年代的上半期，銷量堪稱穩健，波動的幅度不大，居第二位，但到了下半期，銷量每況愈下，疲態盡露（崔貴強，2002:71）。原本銷量落後的《中國報》自1993年起，卻有良好的進展，並超越《南洋商報》，成為第二大華文報。

目前馬來西亞約有6,288,000的華人口，根據AC Nielsen於2006年統計的讀者人數，六家華文報章的讀者總人數約2,770,000，有接近一半的馬來西亞華人閱讀華文報，華文報在華人社會的影響力可說非常大。當中，《星洲日報》和《中國報》的讀者人數就佔了讀者總人數的一半以上，約1,810,000人，而《東方日報》的讀者人數最少，只有近130,000人。

根據馬來西亞發行審計機構在2007年發布的各華文報日報和夜報全年單日平均發行數據顯示，《星洲日報》位居第一，共發行357,121份；其次是《中國報》，共231,539份；《光明日報》位居第三，共127,454份；《南洋商報》從1990年代的第一大報位置滑落到現在僅排名第四，共114,049份；2002年才成立的《東方日報》沒有出版夜報，僅日報銷量則有102,500份。

表 3.1 馬來西亞五大全國性華文報概況（報章以總發行量為排位秩序）

	創歷年份	創辦人	所有人（持有年份）	讀者類型	日夜報單日平均發行量
星洲日報	1929	胡文虎	張曉卿（1988）	中上階層	357,121
中國報	1946	李孝式	張曉卿（2006）	中下階層	231,539
光明日報	1987	《星檳日報》記者及華社	張曉卿（1993）	中下階層	127,454
南洋商報	1923	陳嘉庚	張曉卿（2006）	中上階層	114,049
東方日報	2002	劉會幹	劉會幹（2002）	中上階層	102,500 （無夜報）

發行量數據來自馬來西亞發行審計機構（Audited Bureau of Circulations, 簡稱 ABC）在 2007 年 12 月 5 日發布的馬來西亞印刷媒體的認證發行數據。

貳、各家華文報概況

一、星洲日報

《星洲日報》係由商業鉅子胡文虎於 1929 年創辦，主要係為推廣其所經營的萬金油生意（朱自存，1994）。《星洲日報》最初是在新加坡創刊，初期由新加坡總社印刷出版，再運送至馬來半島發行（葉觀仕，1996）。1950 年代的《星洲日報》與《南洋商報》並駕齊驅，被視為馬新兩大日報（崔貴強，2002:58-59）。1965 年馬、新分家，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脫離新加坡總社。1982 年，馬來西亞政府頒布新令，禁止外資擁有當地報章的控制權，當時《星洲日報》持有人為胡文虎後人，他們遂把名下報章轉賣給檳城房地產商林慶金（星洲日報，2008:57）。

1980 年代中後期，《星洲日報》經歷兩大重要事件。首先，當時的老闆林慶金財務陷入危機，導致《星洲日報》被債權銀行接管，但仍繼續發行。接著，在 1987 年，《星洲日報》在「茅草行動」中，遭內政部以報導危及國家安全、挑起種族情緒為由，下令吊銷出版准證而停刊半年。1988 年，《星洲日報》由砂勞越木材大王張曉卿收購，並重新出版（葉觀仕，1996）。

《星洲日報》向來注重報導文教新聞，並大力推展各種文化、教育與社會公益活動，復刊後的《星洲日報》亦稟承此一傳統（葉觀仕，1996）。此外，《星洲日報》也打著「正義至上」的宣傳口號，致力提供文化人舞台，營造「情在人間」的形象，贏得了華社的同情與掌聲，報紙銷售量逐月上升（林德順編，2001:122）。

目前在發行量上，位居第一大報的《星洲日報》擁有將近一半的市場佔有率。但是在 1970 與 1980 年代間，《星洲日報》的銷數遠不及《南洋商報》。1988 年，張曉卿入主《星洲日報》後，兩報競爭更加激烈，甚至達到惡性競爭的地步。自 1992 年起，《星洲日報》的銷售量與讀者人數都超越號稱第一大報的《南洋商報》，成為馬來西亞銷售量和閱報率第一的華文報，從此躍居第一大報地位至今（崔貴強，2002:60；葉

觀仕，1996）。張曉卿分別於 1993 年和 2006 年收購《光明日報》和南洋報業集團後，於 2008 年將旗下四份報章與香港《明報》合併成爲世華媒體集團。

二、中國報

《中國報》於 1946 年在吉隆坡創立，由以李孝式爲首的吉隆坡華人商界和社團領袖所創，作爲親英反共的喉舌，並和左傾勢力抗衡，成爲當時吉隆坡最有規模的地方性華文日報（朱自存，1994；崔貴強，2002:61；葉觀仕，1996）。1957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後，《中國報》加強了本土意識，並關注華社與華教，以及華人權益（崔貴強，2002:62）。1969 年發生的「五一三事件」，《中國報》因爲刊登了一則法庭新聞，曾被令停刊 10 天。（葉觀仕，1996）。

到了 1985 年，《中國報》便因財務出現危機，自動停刊。停刊後，《中國報》由有「報界奇才」之稱的周寶振收購大部分股權，1986 年正式復刊（葉觀仕，1996）。復辦後，《中國報》以彩色形象取勝，每天都有整版彩色圖片呈現給讀者。之後，《中國報》於 1992 年被控制《南洋商報》的豐隆集團收購，成爲南洋報社集團屬下第二份主要華文日報（朱自存，1994；崔貴強，2002:63；葉觀仕，1996）。

在編採政策方面，中國報不設主筆制度，沒有社論，言論採自外稿，注重社會性與趣味性新聞，強調彩色畫頁、圖文並茂，偏重歌影視娛樂性副刊，以迎合中下階層讀者（葉觀仕，1996）。

到了 1990 年，《中國報》銷量僅次於《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躍居爲馬來西亞第三華文報。1991 年，《中國報》在每天傍晚時分率先推出夜報，以爭取更多讀者，再加上傾力推銷，銷量節節上升（葉觀仕，1996）。目前，《中國報》的夜報位居華文報之首，2007 年的夜報平均銷售量爲 87,198 份，而日報與夜報的銷售總數，使《中國報》擠上報壇老二的地位，僅次於《星洲日報》。南洋報業集團於 2001 年被馬華收購，較後在 2006 年，馬華將手上部分股權賣給張曉卿後，《中國報》也跟著易主，並被整合進入世華媒體集團，成爲旗下專攻中下階層市場的一份華文報。

三、光明日報

《光明日報》於 1987 年在檳城誕生，是停刊後的《星檳日報》員工四處奔走集資，獲華僑支持、由華社籌資經營的一份地方性日報。其員工有 90% 來自舊有的《星檳日報》（崔貴強，2002:65；葉觀仕，1996）。《光明日報》發刊初期的銷售成績頗佳，但由於缺乏資金，運作欠佳，銷路無法打開，虧蝕累累，最後於 1990 年 9 月被金馬揚集團（Kemayan）收購。但兩年後，金馬揚集團董事部改組，《光明日報》在經濟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不得已暫停出版（崔貴強，2002:65；葉觀仕，1996）。

1993 年，《光明日報》再度易手，《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收購全部股權，成爲《星洲日報》的姐妹報。經過重組與改革，使它從原是在檳城創刊的地方性報紙，發展爲一家全國性日報（崔貴強，2002:65；葉觀仕，1996）。

《光明日報》注重趣味性與社會新聞、歌影視等副刊全版彩圖，整份報紙完全沒有言論版，也沒有社論，以迎合中下層讀者的程度（葉觀仕，1996）。目前是馬來西亞第三大華文報，《光明日報》同時也出版夜報，在夜報市場上銷量僅次於《中國報》。

四、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於 1923 年由商業鉅子陳嘉庚斥資創辦，以刊登其生產的膠製品廣告。1930 年代初，經濟蕭條席卷全球，陳嘉庚宣告破產。1933 年，《南洋商報》由其女婿李光前與李玉榮等人接收，成為李氏家族的企業。《南洋商報》的總社在新加坡，每日將報紙運往馬來半島，但在 1965 年馬、新分家的政治局勢下而分開編採作業（朱自存，1994:13；崔貴強，2002；葉觀仕，1996）。

由於 1974 年印刷業（修正）法令的影響，新加坡的李氏家族將《南洋商報》的大部分股權售予馬來西亞人，完成資金馬來西亞化的程序。為了符合政府新經濟政策的規定，國企有限公司（PERNAS）購買了南洋報社的 30% 股權（朱自存，1994:17；崔貴強，2002:56；葉觀仕，1996）。其後南洋報業集團也於 2001 年被馬華公會旗下的華仁控股收購，馬華之後再將南洋報業股權轉手予張曉卿，組成世華媒體集團。

《南洋商報》是南洋報社集團屬下最重要的報紙，以吸引白領中上階級的讀者群為主。注重言論、經濟、政治、國內與國際新聞是商報一直以來的特色。除了社評由社論委員會負責撰寫外，言論版也有外論選譯、特約專稿與讀者投書等。立論公正，編排嚴謹，報導翔實是《南洋商報》的主要特色。《南洋商報》在辦報之餘也不忘從事各種惠益員工、讀者與社會國家的慈善公益事業，同時大力贊助各地區華文中小學的教育事業、體育、文娛活動等（葉觀仕，1996）。

《南洋商報》一直都是盈利最豐厚的華文報，1992 年之前，業績與盈利增長迅速，成為馬來西亞規模最大的華文報。1970 與 1980 年代，在所有華文報的銷數與讀者群中，《南洋商報》都是獨占鰲頭，直至 1992 年，《星洲日報》才後來居上，打破了《南洋商報》唯我獨尊的優勢（崔貴強，2002:57；葉觀仕，1996）。目前《南洋商報》的日報和夜報總銷售量已經落居第四，遠遠落後《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和同屬南洋報業集團的《中國報》。

五、東方日報

《東方日報》由砂勞越富商劉會幹擁有的啓德行集團所創辦，出版准證是購自己停刊的《新明日報》，但一直沒有取得印刷執照。《東方日報》曾於 2002 年 9 月 30 日嘗試出刊，但因為仍未獲取印刷執照即出刊，遭內政部以無照印刷，一併吊銷出版准證而停刊。歷經政商網絡的聯繫努力，最後在 2003 年 1 月 1 日重新出版（于維寧，2004:51）。

劉會幹創辦《東方日報》有許多考量，除了成立一份為民喉舌的新報紙外，還意圖與華文報媒體大亨張曉卿互相競爭，搶奪西馬華文報市場。由於張曉卿的《星洲日報》進軍東馬，影響劉會幹胞弟在砂勞越經營的《詩華日報》銷售市場，華社即盛傳劉會幹在西馬創辦《東方日報》，是為了搶奪《星洲日報》在西馬的市場。另一方面，創辦《東方日報》也可為東馬的姊妹報《詩華日報》提供西馬新聞，提高競爭力（于維寧，2004:51-52）。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事件，以及華文報業擁有權集中的現象，使讀者體認《東方日報》有存在的必要，以作為言論較為突出的華文報。《東方日報》新聞內容多為抨擊政府，揭露內幕消息，在政治立場上反對馬華，言論呈大膽批判的風格。但正因為如此，在新聞獲取、通路和銷售市場上，《東方日報》受四大主流報紙的強力圍剿。《東方日報》打著華社言論自由、打破報業市場壟斷的號召，並不時凸顯被打壓

的困境，獲得部分華社的重視、支持與同情（于維寧，2004:52）。在四大報紙的圍攻及封鎖下，《東方日報》自尋出路，2007年銷售量達102,500份，已逐漸站穩市場。

參、馬來文報概況

初期，馬來文報業都發源於新加坡，1920年代以後，馬來文報業逐漸在馬來半島蓬勃發展，並大力鼓吹馬來人意識（葉觀仕，1996）。獨立前的馬來文報，偏重扮演激勵馬來人爭取獨立的角色。目前，它已改變為馬來人的理想和願望而奮鬥，為社群和國家的利益而提供專業服務。它們不但要有馬來人色彩，也要具備塑造馬來西亞人的色彩。這是馬來文報自1980年代開始，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特色（葉觀仕，1996）。Quick（2003）也提到，二戰後的馬來文報章，試圖形塑一個獨特的馬來文化和認同。

1982年初，馬來文報的總銷數只佔報業市場的25%，華文報佔44%，英文報佔27%。但到1986年，馬來文報讀者總數增加到2,300,000。此後，馬來文報的讀者總數便領先其他語文報（葉觀仕，1996）。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2007年的調查，馬來文報在2006年的平均銷售量達1,910,000份。而馬來文報業蓬勃發展的原因是：1) 馬來人口激增；2) 馬來文作為官方語文的地位被確立；3) 國家教育政策的推行，使全民教育普及，非馬來人閱讀馬來文的能力提高；4) 馬來族群的經濟狀況改善；5) 馬來族群的政治意識提高（葉觀仕，1996）。

馬來西亞現有的馬來文報中，主要以《馬來西亞前鋒報》和《每日新聞》最為暢銷。《馬來西亞前鋒報》所屬的馬來前鋒報集團直接受巫統控制；而《每日新聞》也屬於受巫統控制的新海峽時報集團（葉觀仕，1996）。

一、馬來西亞前鋒報（Utusan Malaysia）

1939年創刊於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目前第一大馬來文日報。《馬來西亞前鋒報》所屬的馬來前鋒報集團後來成為馬來西亞規模最大的馬來文報業集團（葉觀仕，1996），出版各種報刊。而《馬來西亞前鋒報》是主流馬來文報業中發行量最高的日報（莊迪澎，2004a）。1982年，新海峽時報集團銳意改革《每日新聞》時，馬來前鋒報集團也大力進行革新（葉觀仕，1996）。

二、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

《每日新聞》於1957年由當年的英文《海峽時報》創刊於吉隆坡的馬來文版。1982年改革之前，銷數不高，直到改革為「馬來西亞色彩多過馬來人色彩」後，報份逐漸增加（葉觀仕，1996）。最初所報導的內幕新聞，似乎成為它的特色。1992年改組後，一躍成為大馬各語文報中，銷數最多的報紙（葉觀仕，1996）。之後被《馬來西亞前鋒報》超越，成為馬來主流的第二大報章。

肆、英文報概況

馬來西亞雖然自獨立後便積極實行國家教育政策，1971年開始逐漸減少採用英文作為教學媒介語（葉觀仕，1996），但從英文報每日的總銷量達一百多萬份來看，英

文在社會上還是有它一定的影響力，因此英文報在馬來西亞依然扮演塑造社會輿論的重要角色。

在馬來西亞所有英文報中，除了由和政治人物交好的陳志遠創立的《太陽報》（The Sun），馬來前鋒報集團控制的《領導者》以及馬華控制的《星報》（The Star）外，其他所有英文報都屬於巫統的新海峽時報集團所有。由此可見，馬來西亞的英文報，即使不是全部由執政黨直接或間接控制，也是完全親政府的（葉觀仕，1996）。英文報當中，以《星報》和《新海峽時報》為主流英文報章。

一、星報（The Star）

《星報》在 1971 年創刊於檳城，初期為地方性報紙。1976 年，馬華公會通過其投資臂膀華仁控股，收購《星報》67.35%的股權後（莊迪澎，2004b:174），移到吉隆坡出版，這是唯一受華裔公司控制的英文報。1987 年，《星報》連同華文《星洲日報》與馬來文《祖國報》在「茅草行動」中被政府吊銷出版准證一段時期。

復刊後，由於大事改革，敢於刊登揭發內幕的獨家報導，同時擴充工商財經版，使《星報》報份激增。此外，《星報》連年享有營利，業務輝煌，可說是國內數一數二的英文傳媒。這主要是因為一般廣告商認為英文報讀者的購買力較強，因此偏向於在英文報上刊登廣告（葉觀仕，1996）。根據 Quick（2003），2002 年馬來西亞擁有最大讀者人數的報章是《星報》，在 2001 年的單日發行量達 279,647 份。

二、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

《海峽時報》在 1845 年創刊於新加坡，原名《海峽時報與新加坡商業日報》（The 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後簡稱為《海峽時報》。1965 年，馬、新分家後，《海峽時報》也跟著分家。在吉隆坡出版的《海峽時報》於 1972 年被巫統控制的艦隊集團（Fleetprint）從當時受新加坡控制的《海峽時報》手中收購，並改稱為《新海峽時報》，由巫統全權掌控（葉觀仕，1996）。

艦隊集團收購吉隆坡《海峽時報》是因為巫青團強烈抗議馬來西亞的新聞事業受到外國，尤其是英國和新加坡的控制（葉觀仕，1996），因而巫統才進行收購行動。莊迪澎（2004b:4）提到，巫統收購《海峽時報》是新經濟政策的結果，也象徵巫統成功收編了這個常對它發表批評言論的報章。

表 3.2 馬來西亞歷年各語文日報的每日平均銷售量

年份	馬來文	英文	華文	淡米爾文
2002	1,777,231	1,048,266	704,786	29,432
2003	1,859,553	1,036,690	709,713	31,122
2004	1,978,419	1,065,403	762,659	32,685
2005	1,908,852	1,059,596	763,748	32,457
2006	1,914,104	1,002,184	752,875	32,462

數據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第四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引用 Hirsch 的三個分析層次，即職業、組織、制度，來作為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整體分析架構。Hirsch 的這三個分析層次雖然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報業結構、企業組織以及記者工作場域的宏觀環境，但在本研究中，只能作為研究分析的整體架構，以宏觀的角度檢視華文報記者在馬來西亞報業環境的情況，卻無法微觀地探討記者的自我認知。如欲深入探討記者的自我認知，即微觀的層面，單單採用 Hirsch 的宏觀式的架構是不足的。

由此，為了深入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角色認知，並切合馬來西亞以種族權益為主要特徵而發展出各種語文報的報業環境，本研究在自我與他者的理論架構方面，引用了 Cooley 的「鏡中自我」和 Mead 的「概化他者」，作為理論和分析基礎。本研究採用自我和他者的相關理論，是為了有系統地分析華文報記者在複雜的種族為導向的報業環境中，所具有的不同層次和不同類型的概化他者，以及華文報記者在面對不同概化他者時，所預設的自我類型和位置。

此外，基於馬來西亞報業環境的特殊性，記者的自我認知也受到工作場域上出現的各式各樣情境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引用 Strauss, Stone 和 Goffman 強調的情境式 identity，作為本研究有關記者認知的理論基礎。這三位學者提出，在社會情境的脈絡下，個人與他人的互動過程，會對個人的自我認知產生影響，而且個人的自我認知是根據不同的社會情境和不同的他者而不斷地改變。另外，本研究進一步引用 Goffman 對於自我認知的定義，來確切劃出本研究欲探討的自我認知的微觀範疇，即個人對自己處境的主觀感受，並且他人對個人的認知，足以影響個人的自我認同，但個人仍可以主觀型塑自我認同。

通過闡明情境式 identity 和受環境及他者影響的自我認知在理論方面的具體內涵，本研究針對馬來西亞報業環境的特殊性作深入分析。此理論架構有助分析特殊的報業環境所導引出的各式情境，並有系統地整理記者在各情境下，以及在 Hirsch 三個分析層次下的自我認知。

第一節 自我認同與社會互動

壹、有關「自我」的理論

在符象互動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有關自我 (self) 的論述中，學者都將 Cooley 有關的理論作為依據，他提出的「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 使他被稱為「符象互動論者」。在有關自我的討論中，他確立了「自我是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立場。Cooley 的「鏡中自我」是指行動者的反省和想像過程，並不是指人與人之間實際互動而產生的 (孫中興，1993)。

Cooley 在《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談到社會和個人的關係，強調兩者是「一種有機的關係」(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浚譯，1992: 25)。他認為，社會和個人是同一事物的集體方面和個體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有機整體。個人在社會中不是獨立地存在，但又擁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個人在社會中同時具備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群體表現又有個體表現。

對 Cooley 來說，真正的社會存在是個人的觀念（the immediate social reality is the personal idea），社會關係只是存在於個人的意識（mind）之中。他人的觀念要存在於個人的意識中，才意味著真實的社會存在。一個有肉體存在的個人若不被想像，就沒有社會性的真實（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浚譯，1992: 87-98）。換句話說，個人或社會要「住」進人的意識中，才算真實存在。

根據個人和社會關係，以及個人意識與有關個人和社會觀念的論點，Cooley 認為，「自我」包含整個心靈，所以也包括所想的所有個人和整個社會。這些個人和社會是存在於個人意識的有關觀念，而自我和他人並非作為相互排斥的社會事實存在。Cooley 強調，「我」的觀念是在和他人或在社會，交流和聯繫中發展起來的。個人意識聯繫著普遍的生活，意識裡與他人關係的這些關於人的觀念，都是社會性的（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浚譯，1992: 87-98）。

從上述的論點，Cooley 強調個人和社會是不能分割的有機整體，而個人意識是存在著思想內部聯繫的作用。個人意識唯有這種作用，才能想像人的觀念和社會。這些觀念只有存在於人的意識中，這些人（包括他人）和社會才有可能真實存在。而人們在社會中的互動，也只有存在於意識中，才是真實的社會存在。根據這種觀點，每個人的想像都被看做是許多人的影響相互作用形成的整體，因此對人的觀念和社會關係的互動透過想像存在於個人的意識中。

由於和其他人的觀念的聯繫，自我的觀念永遠是對個人生活中特殊的或有差異的方面的一種意識。Cooley 認為，個人要在社會經驗、感覺、交流、與他人互動，才會產生自我意識。因此社會的他人以及社會關係互動在 Cooley 有關「自我」的論述中，佔有重要位置，並強調他人在社會互動、交流對自我意識產生的重要性（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浚譯，1992: 132）。

個人把與他人的聯繫的一組觀念系統，透過想像納入意識，構成社會自我，這種社會自我是一種想像自我，是受他人意識所影響。這種受他人意識影響的社會自我，Cooley 稱為「鏡中自我」。個人在想像中得知別人對自己的外表、風度、目的、行動、性格、朋友等等的想法，並受這些想像的想法影響（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浚譯，1992: 135）。

Cooley 把「鏡中自我」定義為包含三個主要元素：一、個人想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二、個人想像他人對自己形象的判斷；三、某種自我感覺，乃是反思他人意識的想像效果。個人所想像的出現在他人意識的那個我的形象，或他人對我形象的判斷，對我的情感有很大影響力。除了對人的觀念，受社會環境、歷史進程的變化而被影響的理智內容的觀念，也聯繫著自我感覺，一併構成自我（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浚譯，1992: 135-136）。

因此，自我具有特殊性，但不孤立於社會環境。在這裡，Cooley 討論的自我也即是社會自我，因為他著重自我的社會方面，強調的自我是與整體社會有聯繫，與他人有密切互動的自我。在 Cooley 的自我形構中，社會裡的他人占據重要的位置，對自我產生重要的影響。Jenkins（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59-60）指出，對 Cooley 來說，自我永遠暗指他人的存在，同時自我永遠是社會自我，與他人既相似又相異。

Jenkins（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52）在描述 Cooley 的主張時，強調意識是個系統，而個體是積極的組件，即「我所說或思考的每件事，都受到他人言談或思想的影響，而且也透過各種方式傳遞自己的影響力」。Mead 在提到 Cooley 的論述

時，談到 Cooley 是從個人出發，「除非是在個體的意識⁵裡，否則社會實際上並不存在」（Mead, 1934；轉引自 Jenkins, 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 2006:52）。

Mead 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討論「自我」時，提到自我意識是採取或預設他人的位置才能達成，這個他人是社會性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Mead 強調，個人如果不能從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就根本沒辦法看到自己。Mead 在討論「概化他人」的理論時提到，賦予個人具有統一的自我的有組織社會群體，可稱為「概化他人」。概化他人的態度是整個社會群體的態度。透過將這一有組織社會群體的這些個體的態度，作為一個整體，個體會對社會計畫和構成其生活的社會過程作出反應和行動（Mead, 1934 / 胡榮、王小章譯 1995: 156）。

自我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有兩點：一是就他接受他所隸屬的有組織社會群體的社會態度，才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自我；二是就他所隸屬的這一社會的個體，經由參照社會群體的過程、活動和制度性的運行，並參照因此構成的經驗和互動關係，接受群體內其他個體的態度，來據此指導自己的行為，發展自我（Mead, 1934 / 胡榮、王小章譯 1995: 157）。簡言之，個人必須接受有組織的社會活動或社會群體的態度，以及其他個體的態度，並以此為根據作出反應和舉動，才能發展完整的自我（Mead, 1956: 219）。

Mead 指出，在自我的充分發展中，有兩個一般的階段。在第一階段，個體的自我是由他人對待自己、以及在他和他人的社會互動中，組織相互對待的社會態度而構成自我。但是在個體自我充分發展的第二階段，自我不僅由這些特定個體態度的組織構成，而且由概化他人或他所隸屬的社會群體構成（Mead, 1934 / 胡榮、王小章譯 1995: 159）。換言之，第一階段是個體通過組織他人的特定態度，構成自我；第二階段是個體通過組織概化他人或他所隸屬的社會群體的社會態度，而構成自我（Mead, 1956: 222）。接下來，個人依據特定他人的態度組織自我的結構；再根據有組織的社會聯繫，組織並概括特定他人的態度，從而將有組織社會群體以及他人的態度帶入自我，並形成自我的一部分。

此外，Jenkins 在論述 Mead 的「概化他人」的觀點時提到，「只有當他採納所屬的有組織社會群體的態度，來面對有組織的、合作的社會活動，或是這個群體所參與投入的一組這種活動，他才能發展出完整的自我...唯有採取概化他人的態度來看待自己，以這種方式，個體才能夠有思考；因為唯有如此，思考才會發生」（Mead, 1934；轉引自 Jenkins, 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63）。

Mead 有關自我的看法和 Cooley 的自我一樣，特別強調他人的存在，他人對自我的影響，以及社會在形塑自我的重要性。而 Mead 的自我涵蓋主我與客我，似乎和 Cooley 在討論他人的觀念必須存在於個人的意識中，才是真實的社會存在的論點相似。在 Cooley 的觀點，這就是在自我的意識中，必然存在著他人的觀念，且這個他人的觀念是個人與他人相互接觸聯繫而存在的。而這個有關他人的觀念，在 Mead 的討論裡，則是社會性的概化他人。Cooley 和 Mead 在自我形構的討論上，擁有類似的觀點。

⁵在包凡一、王媛翻譯 Cooley 的《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一書中，譯者把 mind 翻譯為意識。在王志弘、許妍飛翻譯 Jenkins 的《社會認同》和胡榮、王小章翻譯 Mead 的《心靈、自我與社會》這兩本書中，譯者把 mind 譯為心靈。但是，在王志弘、許妍飛翻譯 Jenkins 的《社會認同》也有將 mind 譯為意識。為了避免混淆，本研究劃一使用「意識」為 mind 的翻譯。此外，本研究並不是集中討論意識與自我的關係，因此關於譯者對 mind 的翻譯，以及 mind 與心靈、意識的意涵和定義，並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

不過，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時，Mead 認為社會是「客觀的」東西，而非僅止於個體意識裡的想法。這和 Cooley 強調的「社會是存在於個體意識裡」的觀點又不盡相同。另外，在有關他人對自我的影響方面，Jenkins 認為，Mead 的自我被內化的他人聲音所決定的程度，跟 Cooley 的鏡中自我不同。Cooley 的鏡中自我裡的他人對自我影響力較大，他人對自己形象的判斷可直接影響自我感覺。但是，對 Mead 來說，他還著重反身性的作用，這反身性牽涉了與自己的對話（Jenkins, 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61），因此他人對自我並沒有主導性的影響。

從 Cooley 和 Mead 的討論，可看出他們對他人的觀點有程度上的差異，Cooley 強調個別的他人，個人在與他人接觸互動後，會在意識裡形成對他人的觀念，聯繫自我感覺，形成一種想像自我，即鏡中自我。Cooley 並沒有詳細解釋這些他人的組成成分，只在描述時，用單一個別的名字來指涉他所謂的他人。然而，Mead 的概化他人則強調他人是「有組織社會群體」，並不是單一個別的他人，而是含有社會意義的一群他人。

Mead 在理論上貢獻了有關概化他人的基礎，但有關概化他人的研究大多圍繞在理論的充實與建構上，還有將自我和他人的概念，概念化為可測量的變項，並測量自我和他人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與關係（Dodds, Lawrence & Valsiner, 1997; Benhabib, 1986; Miyamoto & Dornbush, 1956; Reeder, Donohue & Biblarz, 1960）。雖然 Mead 首先提出概化他人這個名詞，但後來出現的名詞「意義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常被引用在各種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而學者在探討意義他人的定義時，都有提到此名詞源自於 Cooley 和 Mead 有關自我和他人的符象互動論述。

Denzin（1967）指出，社會學家已承認人類學習自我定義（self-definition）和他輔助的社會物體（objects）的定義，是通過和多種類別的社會他人的互動，在 Mead、Dewey、Faris 和 Sullivan 的理論著作中，「他人」一詞佔據核心位置，Sullivan 並創造「意義他人」一詞，以指涉個人所推重的他人對個人行為和態度的評價。通過與他人的互動，自我、意義和想法隨即產生。Kuhn（1964）認為學者對 Sullivan 的「意義他人」在意義上是指對個人社交負責任的他人，還是指個人所推重的他人存有一些疑慮，而學者多引用後者的定義。

Couch and Murray（1964）提到「意義他人」和傳統有關他人的思想相符合，有學者指出這個詞源自 Mead 有關他人的概念。Merton and Kitt（1952）就指出，「另外」（another）、「他人」（other, others）這些名詞，出現在有關 Mead 的闡述文獻裡不下數百次，也就是社會自我（social self）的發展需要對他人態度的回應這個觀點。Couch and Murray（1964）則用「意義他人」來了解個人在角色表演上所接收的評價，和以意義他人的態度來安排自己的行為舉止的關聯性。

另一方面，「意義他人」的使用多被用在量化研究上。有學者建構一系列「意義他人」或相關的概念化測量方法、定義與變項。Woelfel and Haller（1971）在探討「意義他人」對個人的教育和職業期望的影響時，賦予意義他人概念化的定義，以符合他們的研究。在此研究中，Woelfel and Haller（1971:75）定義「意義他人」是對個人的態度行使重要影響的人。在進行概念化定義的過程中，Woelfel and Haller（1971:76）也引用了 Mead 有關自我反身性的概念，即個人的行為是回應一些客體所做的反應，作為其研究的另一變項。

另外，在有關他人的討論與研究中，Goffman（1959）也在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一書，提出不同類別的社會他人，例如通知者、誘餌、冒充者、中間人、非人和同事。

本研究以記者為研究對象，對他們處在特定社會情境的自我認同進行分析，在定義自我的範疇及理論架構時，本研究以 Cooley 和 Mead 對自我及他人的論述為主。在討論自我的同時，其實就暗示他人的存在，所以本研究認為，自我和他人必須一併討論。由於 Cooley 的鏡中自我和 Mead 的主我與客我、概化他人的觀點，在細部有程度上的不同，本研究強調他人存在的重要性，他人對自我的形塑產生重要影響力，以及社會關係和互動影響他人在自我意識的想像，進而影響對概化他人採取的一組態度，即個人所處的社會情境也會對自我產生影響。

另一方面，根據 Hirsch (1977) 有關研究媒體的三種層級模式，即把媒體分為職業、組織和結構的層次來研究，本研究擬依據這三個層次，結合上述有關自我與他人關係的架構，來分析記者在與他人的社會互動中，對自我認同產生的影響。陳順孝 (2003) 將 Hirsch 提出的三種分析層次簡單敘述為：一是職業角色、生涯，以及傳播媒介與組織化個人間的關係；二是把整個傳播媒介組織本身視為一個分析對象，從而探討記者與編輯採訪工作的協調等；三是傳播媒介間的關係，以及傳播媒介與社會經濟環境的關係。

根據 Hirsch 的分析模式，記者從屬於不同的組織和層級結構，也因此面對不同的有組織社會群體和屬於此社會群體的概化他人。而根據 Mead 的概化他人理論，個體會將他人的特定態度和社會群體的社會態度帶入自我，進而形成自我。因此，在 Mead 的概化他人理論，強調有組織的社會群體和特定他人的態度影響自我形構的結構下，處在或從屬於不同類別或等級 (classes) 的有組織的社會他人和社會群體中的記者，自我也會受到這些概化他人所影響。

有鑒於此，本研究對認同的定義架構，也強調個人在社會中與他人的人際互動，以及此互動如何影響個人的行動和對他人採取的態度、想法、行為、表現、語言等。

此外，大多數有關「意義他人」的研究都以量化取向的方式來概念化「意義他人」，並從中發展與意義他人相關的可測量變項，以及自我與意義他人的關係 (Cheng & Starks, 2002; Denzin, 1967; Couch & Murray, 1964; Woelfel & Haller, 1971; Brookover, Thomas, Paterson, 1964)。因此，意義他人的定義是趨向量化測量的定義，而缺乏理論性的意涵。相比之下，概化他人在理論上的解釋結構完整。筆者認為，採用概化他人的概念將有助於分析本研究相關記者的資料。概化他人在理論架構上的完整性對本研究的資料分析較為有用。

貳、社會情境下的認同 (identity)

最初以 identity 作為學術名詞的是 Erikson，他根據 Freud 的有關自我和性格 (ethos) 的形成，發展為「群體認同」(group identity) 和「自我認同」(ego identity)。他對人類本性—社會現實的再闡述，介紹了這個新的專門術語，至少在跨學科方面是有用的。這個辭彙可在大範圍的學術領域、方法、理論方向和政治傾向定義問題。Erikson 以 identity 為組織的概念，寫作與人類發展、歷史變遷和個人健康的著作。他賦予了「自我認同」以精神分析和功能性的定義，作為一種「群體心理學現象」(group-psychological phenomena) (Weigert, 1983: 7)。

Erikson 把「自我認同」定義為「對在自我的綜合方法內具有自我一致性和延續性的事實的察覺，以及這些方法在維護個人對他人意義的一致性和延續性很有效」(轉引自 Weigert, 1983)。Erikson 對於 identity 功能性的思考，開啓了心理學和社會歷史學

的研究大門，發展了一套認識論的空間，來分析人類情況。他把個人認同的心理層面與歷史和社會文化因素影響認同的觀點連結起來（Weigert, 1983）。

然而，Erikson 有關 identity 的研究較傾向於心理學。受 Erikson 影響的芝加哥符象互動學派，就將有關 identity 的研究擴展，運用到醫療的、精神病學的和偏差的問題（Weigert, 1983）。之後，有許多學者發展並豐富 identity 的定義和內涵，學者從各種角度探討 identity 在社會中的多種意涵，在個人與社會聯繫的過程中，人際關係和互動的發展中，identity 在其中的角色為何，使 identity 走入社會心理學的範疇。

但是，學者至今對 identity 的學術定義仍然模糊。學者以各自的方式詮釋和定義 identity，使 identity 的具體概念飄浮不定。Brubaker 和 Cooper（2000）就把學術界使用 identity 的學術研究歸類為 5 大方面：一、identity 被用來強調行動的態勢，即個人或集體被特殊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s）所支配，而不是想像的一般利己主義（self-interest）；二、在將 identity 理解為集體現象，identity 指稱在群體或種類的成員之中，一種基礎的和必然的相同性（sameness）；三、作為「自我」或一項社會生存的基礎條件的核心方面，identity 被指涉為據宣稱是深層、基本、不變、基礎的事物；四、作為一種社會或政治行動的產物，identity 被引用來突出一種可以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集體自我理解、團結或「群體」（groupness）的過程性和互動性發展；五、identity 被突顯為當代的「自我」，具有不穩定、多元、變動和碎裂的本質。Brubaker 和 Cooper（2000）認為，identity 這個詞作為分析的概念被豐富地運用，但卻是模糊的。Brubaker 和 Cooper 的歸類顯示 identity 一詞可引用在各種跨學科的領域，卻沒有明確具體的定義和範疇。

由於本研究想要探討記者在組織內外的社會關係和人際互動如何影響自我認同，本研究要探討的自我認同並不是 Erikson 發展的心理學上的自我認同，而是更傾向於社會情境脈絡下，人際互動與自我認同的關係。

Strauss 在學者把 identity 帶入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範疇後，將 identity 作為符象互動學派關注的問題（Weigert, 1983）。Strauss（1959）在 *Mirror and Mask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裡將 identity 作為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專有名詞，他把 identity 視為需要與「被自己和被他人建構的重大評價」相連結。Strauss（1959）認為 Erikson 典範所發展的「自我認同」（ego-identity）不足以作為社會心理學範疇的定義。他根據典型的符象互動學派程序，運用 identity 為一個敏感的概念，以及一般公認地模糊和普及的概念。他試圖融合符象互動和社會組織的層面進入可使用的社會心理學範疇，因此，他強調語言、命名和互動。他並不是研究 Erikson 的「自我認同」，而是個人如何與他人交流，並被他人影響，以及通過交流彼此互相影響。

Weigert（1983）認為，Strauss 試圖將一個 identity 的構想作為一種互動的現實。Strauss 的理論視 identity 由自我評價（self-appraisals）構成，而自我評價是由自我和他人，個人的定位和評價，賦予個人的命名，生命的歷程所經驗和強加的改變所形成（Weigert, 1983）。Strauss 認為，identity 是由自我評價所構成，而自我評價包括自我和他人，個人的位置和評價，附著於個人的名字，人生歷程中所經驗和被強加的改變。從他有關 identity 的理論，Strauss 強調的是個人在生命中經歷的有關他人、評價、名聲、經驗、改變都有可能影響自我評價，進而影響 identity。可以說，個人是充分涉入社會活動、社會關係與互動，這份與社會及人際關係緊密連結的經驗，使個人從中反饋成為對自己本身的想法，構成 identity。

Stone（1962）的 *Appearance and Self* 也有為 identity 的概念和意涵作更具體的說明。雖然 Stone 以 self 為文章題目，但他明顯地同意 Erikson 把 identity 帶入社會科學領

域（轉引自 Weigert, 1983）。對 Stone 來說，identity 是當自我處於某個情境時，由自我獲取的意義，也即是基於對個人在社會關係裡的參與或會員身份的承認，而將之編排在一個社會客體的位置。此外，由於 identity 從本質上與所有社會生活的會合與分離相關聯，因此會持續不斷地改變。Stone 認為，當他人通過分派給個人有關 identity 的相同字眼，把他安置為一社會客體，個人的 identity 於是被建立，而這個 identity 是適合他自己的（Stone, 1962; 轉引自 Weigert, 1983; Schlenker, 1985）。

Weigert (1983) 認為，Stone 為 identity 所下的定義，是首個簡潔的定義，並被廣泛地應用在社會心理學上。Stone 的 identity 強調根據在一個情境所獲知的結構性價值和人際之間的情緒，安置和評價個人。Stone 採用 Erikson、Strauss 和 Goffman 有關 identity 的主題，並把 identity 以理論性的方式跨前一步，將 identity 明顯地與情境式的社會關係相聯繫，並區分認知、評價和情緒的範圍。此外，Stone 討論的“appearances”有著經驗和理論上的貢獻，因為 Stone 認為“appearances”是 identities 的情境式基礎，而這個 identity 是個人向他人展示並附著在他們身上的（Weigert, 1983）。

從定義中，可看出 Stone 把 self 和 identity 區分開來。他不像一些學者把 self 和 identity 混用，在分析脈絡中將 self 和 identity 指涉同一概念的事物，使 identity 在具體的概念和意涵更加模糊，似乎可解釋多種類似概念，卻缺少一明確指涉的具體意涵。Schlenker (1985) 就指出 identity 可被當成是一種 theory of self，關於自我的內容是通過真實或想像的人際協議，被形塑和維持的。這個內容必須經得起意義觀察者的共識的確認過程。而和 self 的混用也使 identity 這個名詞的出現產生問題，identity 這個字是否可自行發展相關一系列的概念與範疇是值得討論與思考的。

Stone 和其他社會學家聚焦在互動中 identities 的社會建構，人們在共同理解的社會角色、規範和符號的基礎上，彼此之間以特定的方式社會性地分類和行動。個人的 identity 在社會生活的嚴酷考驗下是編造的、表達的、維持的和更改的，因為它的內容經歷觀眾的真實或想像的觀察、判斷和反應的持續過程（Schlenker, 1985）。

即使 Schlenker 把 identity 和 theory of self 畫上等號，Schlenker 也和 Stone 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當 identity 提到個人累積的、概化的 theory of self 時，這顯示 identity 與自我觀念（self-concept）這個詞如何被運用完全相似，尤其是受到 James 和 Mead 的影響。但是，Schlenker (1985) 提到 identity 作為自我概念和 identity 還是可以區分的，當處在社會情境下，identity 是與特定其他人相聯繫時，被放置或構想出來。他並指出情境式的 identity（situated identity）是在一特定社會情境或關係被有意或無意地建構，而個人的情境式 identity 在特定的關係中，是參與者的共同建構（joint construction）。

Stone 在討論 appearances 和 identity 之間的關係時，其所強調的情境明顯有 Goffman 理論的影子，而 Weigert (1983) 也指出，Stone 在 Goffman 等學者的基礎上，發展出 identity 的具體且明確的定義，因此 Goffman 的理論在賦予 identity 意涵，豐富 identity 內容的基礎是重要的。

Goffman 的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將個人的定義和詮釋視為在社會情境下表演的特質。文章是圍繞 self 的概念而組織的。Goffman 並提出結論，指「表演的自我」（performed self）是互動情境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Weigert (1983) 指出，Strauss 和 Goffman 在題目上分別用了 identity 和 self，他們的討論卻反映了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在使用 self 和 identity 於相似的分析上和相似的觀點，但卻沒有清晰的理論性區分。

Goffman (1959) 在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一書裡，巨細靡遺地描述社會關係裡的個人於他人之間的互動過程。Goffman 在個人及他人在見面互動過程

第五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是指任何不是經由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它可以是對人的生活、人們的故事、行爲，以及組織運作、社會運動或人際關係的研究（Corbin & Strauss, 1990/ 徐宗國譯，1997:19）。質性研究在知識論的傳統上與遵循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質性研究強調「真理」會因為觀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質性研究者強調沒有客觀知識的存在。質性研究方法就是假設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也因此不可能有絕對的、單一的公式與詮釋。因此，研究者必須以開放的心，不斷透過各種管道、各種資料、各種不同的人的說法，以嘗試不斷審視問題的本質及現象的意義（蕭瑞麟，2006）。

大多數質性研究的目的不在於「解決」問題，而是在重新「認識」問題，蕭瑞麟（2006）提到，要了解問題，除了不斷吸收各方面的訊息，還要運用不同的詮釋角度。他強調，質性研究的目的是在詮釋問題，以了解現象的含意，對一些看起來理所當然的現象產生新的知識與洞悉力。質性研究偏重以文字說明人是在何種情境之中，形成決策、產生行動，素材多取自人與人之間的對話，由對話去了解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質性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就是「故事」。質性研究者的任務就在說故事，把事件的背景交代清楚，把牽涉到的人物與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作最詳盡的描述，以凸顯出研究者是以甚麼角度來說這個故事，而讀者如何從這個故事了解社會的結構，進而解讀隱晦難明的社會現象（蕭瑞麟，2006:54-56）。蕭瑞麟（2006）強調，質性研究方法的最重大目的就是「使事物被看見」，包括使沒有被注意到的事物，以另一個嶄新的角度重新被審視，被重新認識與省思，並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如文化的制約、政治的控制等。

Corbin & Strauss（1990/ 徐宗國譯，1997:20）在談到質性研究的目的時，也和蕭瑞麟有相似的看法。除了一些學術領域，如人類學、現象學在傳統上鼓吹研究者利用質性研究來分析資料外，質性研究也適合揭露並解釋一些在表面下鮮為人知的現象，對於一些人盡皆知的事也能採取新鮮又有創意的切入點，以彌補量化研究無法深入探討的細緻複雜的情況，也就是蕭瑞麟強調的「使事物被看見」這個目的。

Corbin & Strauss（1990/ 徐宗國譯，1997:25）在質性研究的領域發展了一套「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是用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結果。紮根理論強調的是將資料系統化地分析，發掘、發展，並已暫時驗證過的理論。不過，本研究並不準備依據所收集的質化資料發展一套紮根於社會現象的理論，但採用紮根理論的研究策略為分析資料的方法。根據 Corbin & Strauss（1990/ 徐宗國譯，1997:26）所發展的紮根理論研究策略，是運用系統化的程序，針對某一現象來發展，並歸納式地導引出紮根的理論的一種質性研究方法。經過紮根理論的策略所建構出的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不但是由資料中萌生，而且也被資料暫時性地驗證過了。

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為分析資料的策略，主要是由於在理論架構採用了以 Cooley 和 Mead 為主的「符象互動論」，而紮根理論的發展與這個理論觀點有相關連之處。紮根理論認為社會裡所發生、進行的事件，人與人之間的經驗，都是不斷在製造和產生的。紮根理論並主張是社會裡的人們締造了這個世界，因為是人們互動下的結果，社會世界是一系列的變遷與過程，社會生活是多樣性和複雜性的。因此，紮

根理論強調事件的條件、意義，與行動間的彼此關係（Corbin & Strauss, 1990/ 徐宗國譯，1997:27）。

Flick (2002: 16) 指出，在質性研究的範疇下，各種研究取徑根據他們的理論假設，以及他們了解客體 (object) 的方式，使方法論上所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概括來說，這些取徑傾向三種基本的立場：第一，符象互動論的傳統，關注研究主觀意義和個人感知的歸屬；第二，民族感覺方法論，對人們每天生活的慣例和日常生活的產製有興趣；第三，構造論者或精神分析立場，以心理過程或社會潛意識為出發點。通過強調主體的觀點，可分辨這三種取徑的分別。每一個取徑的研究者以不同的觀點，採用不同的研究方式使被研究的主體概念化，即他們的經驗、行為和互動，是如何與脈絡相關連。

在「符象互動論」的取徑下，個人參與的活動和活動的環境，引起個人主觀意義，會成為個人的經驗。Blumer (1969, 轉引自 Flick, 2002: 17) 將「符象互動論」的三個簡單論點解釋為：第一，人類會對某些事物有所行動，是因為這些事物對他們產生意義；第二，事物的意義來自於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社會互動；第三，個人在詮釋事物的過程中，會修改和處理事物的意義。其結果是個人以不同的方式對物體、事件、經驗等賦予個人詮釋後的意義，構成研究的核心目的。

紮根理論的研究策略首先藉由開放性譯碼，仔細檢驗質性資料而為現象取名字或加以分類的分析工作。而不斷比較與問問題是譯碼過程裡最主要的兩個分析程序，以達到資料概念化和範疇化的目標（Corbin & Strauss, 1990/ 徐宗國譯，1997:70-71）。接著，利用主軸譯碼的方式，指認出特定現象的條件，對這種現象的反應、互動及行動措施，以及行動或互動的結果（Corbin & Strauss, 1990/ 徐宗國譯，1997:111）。本研究試圖採用主軸譯碼對於現象、脈絡、行動／互動策略和結果的定義和範疇，來做為質性資料的分析架構。

由於紮根理論強調是一個科學的方法，因此由 Strauss 在 1987 年寫的有關質性研究的書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被 Denzin 稱為是質性研究的現代主義時期 (modernist phase)。Denzin (1988; 轉引自 Seale, 1999: 2-3) 認為，現代主義假設一個經驗的世界可以被質性方法客觀地研究，這個觀點已經不再支撐得住了。而且，Denzin (1988; 轉引自 Seale, 1999: 3) 認為，Strauss 的質性研究方式要求在許多案例間尋求概化歸納，妨礙了專注在個人特質的案例。Denzin 提到，將質性研究以科學的方式來做，研究者會將社會世界的結構強加於質性資料的詮釋上，而這其實並不能簡單地與社會世界契合，因為社會是被許多互動的個體建構和生活的。由此，Denzin 採取後現代的觀點認為，人們是生活在後現代的世界，個人擁有多重的自我和無止境的分裂經驗。

另一方面，厚描的寫作方法或許能夠補足 Denzin 所認為的紮根理論過於強調科學客觀的研究方法。Geertz (1993, 轉引自 Seale, 1999)，提出的「厚描」觀點，是說明一個有素質的人類學作品，是揭露和建立在社會生活的多層次詮釋，人類學研究者可以描述和深入詮釋存在於特定事件的各種豐富和細緻的意義。相反地，輕描不能扣連文化意義，是平凡的和引不起興趣的。Geertz 通過厚描，強調把社會現象所具備的不同層次的意義詮釋出來。Seale (1999: 94) 指出，雖然 Geertz 沒有顯示出他是根據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來產生厚描的詮釋分析方式，但是他長時間浸淫在田野，卻讓他得以找出一系列各種各樣的事件為實例，去發展他的理論。這是紮根理論和厚描可以互補之處。

第六章 研究分析

第一節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概況

本研究採訪了 18 名馬來西亞華文報的記者，他們分別在五家全國性馬來西亞華文報章工作，由於位於首都吉隆坡總社和位於馬來西亞半島各地地方辦事處的工作環境不同，各個州屬地方環境有所差異，工作性質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設定採訪的樣本是在吉隆坡總社工作的記者，以集中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

這五家全國性報章《星洲日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和《東方日報》，主要在西馬半島各主要地區設立辦事處，而辦事處的規模相當，總社也分別位於吉隆坡中心地帶，因此本研究選擇的報章並不包括總社設在檳城的《光華日報》。

以銷售量來看，《星洲日報》目前是第一大報，加上報章的影響力和公信力，其地位仍無法被超越和取代，大報地位穩如泰山。以聳動的社會新聞異軍突起的《中國報》則因夜報的銷售量領先群雄而在總銷售量位居第二，然而以報格來看，由於鎖定中下層讀者，走小報風格，雖然因擁有廣大的中下層讀者群而有一定的影響力，其公信力卻無法和走大報路線的《南洋商報》和《東方日報》相比。

銷售量位於第三的《光明日報》也以小報風格突圍而出，以軟性、趣味的新聞為主，影響力和公信力則與銷售量不成正比。《南洋商報》曾經位居第一大報位置，但自從被馬華收購過後，其聲勢江河日下，元氣儘失，無法恢復以往第一大報的聲勢。《東方日報》是最年輕的報紙，是上述四大主流報章以外的非主流報章，最初打著以尖銳聳動、批判性的言論為創刊宗旨，但卻因為事事沖著第一大報《星洲日報》而來，而使辦報目的模糊，日漸失色，影響力因銷售量低落而微弱，但《東方日報》是所有報章中唯一與網絡媒體互相合作的報章，以期在主流報章壟斷主要華人市場時，在夾縫中開拓另一條生存路線。

基本上，整個華文報業生態是處於競爭關係，各家報章都會搶獨家新聞。不過，綜觀整個報業環境，比較具有競爭關係的是四家主流報章和《東方日報》。由於四家主流報章於 2006 年 10 月被張曉卿通過股權的收購，並被整合在世華媒體集團旗下後，只有《東方日報》是在這個媒體集團之外的報章，因此形成勢力懸殊的競爭關係。

此外，在四家主流報章之中，由於《南洋商報》和《中國報》是姐妹報，《星洲日報》和《光明日報》也一樣是姐妹報，因此這兩組姐妹報在集團內含有競爭關係，姐妹報之間的互動和合作比較頻密，但是兩方的競爭關係則不像與對外的《東方日報》這般激烈。

談到報章和政府的關係，大部分報章和執政黨國陣的第二大政黨馬華有較密切的關係，《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在還是南洋報業集團旗下時，在華社的反對聲浪中於 2001 年被馬華強勢收購，馬華較後於 2006 年將股權售予張曉卿。

另一方面，《星洲日報》和《中國報》曾經因觸犯政府法令而被勒令停刊。《星洲日報》是在 1987 年的「茅草行動」中被吊銷執照而停刊，而《中國報》則是在 1969 年「五一三事件」中被勒令停刊。雖然之後都成功復刊，但是對於政府的懲戒，各華文報都步步為營，深怕踩中地雷而慘遭同樣的後果。《中國報》還曾經因為一則錯誤的新聞報導，總編輯和副總編輯被迫辭職以換取《中國報》的夜報准證不被吊銷。種

種懲戒使政府法令像無形大手般，籠罩在馬來西亞媒體人身上，使他們噤若寒蟬，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新聞報導上小心翼翼。

第二節 個人自我認知與概化他者的建構

本研究要探究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在其工作環境中的自我認知，採用 Cooley 和 Mead 的自我與他者的定義為理論架構，以從中探討個人在和他者的互動中，如何建構對他者的想像，將他者在個人意識中組織為一整體概念的社會群體，這個他人包括特定他人和個體所隸屬的有組織的社會群體，而構成自我的過程就包含了組織特定他人和社會群體兩部分。Mead (1956) 指出，在自我的充分發展中，有兩個一般的階段，意指包括了組織特定他人的態度和組織概化他人或社會群體的社會態度，來達到構成自我的完整性。

並且，個體在組織他者的想像的同時，想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和他人對自己形象的判斷，進而產生自我感覺，即對自己的認知，從而發展出對待不同他者的互動策略、舉止和行爲。根據 Cooley (1902) 有關「鏡中自我」的討論，社會關係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以及個人要在社會經驗、感覺、交流、與他人互動中，產生自我意識，自我感覺是通過生活經驗而產生，因此「鏡中自我」包含了三個元素，在上述建構和組織他人想像的過程中，同時也想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和他人對自己形象的判斷，進而產生的自我感覺，乃是反思他人意識的想像效果。

在採訪記者的過程中，記者通過回答筆者的問題，詳細敘述了他們和不同層次他者的互動過程，在過程中他們的自我感覺，以及對應此自我感覺的態度、策略、想法和行動。Mead (1956) 提到，個體在組織概化他人為一整體的態度後，並接受這些社會群體的態度，從而以此為根據發展對應的反應和舉動，指導自己的行爲，才能發展出完整的自我。

本研究根據訪談資料，將個體回應概化他人為一社會群體的自我認知過程，分解為互動情境、建構的他者、行動策略、自我認知。這個自我認知的過程首先是建立在 Mead 的「概化他人」理論架構的基礎上，通過社會關係的互動，個體在意識中接受及組織特定他人或社會群體的社會態度，構成一個整體的概化他人的態度，即建構的他者。接著，個體根據概化他人的態度，形成相應的策略和行動。最後根據 Cooley 的「鏡中自我」理論，個體通過想像自己在他人的形象，發展自我感覺，即自我認知。在 Goffman 有關污名的討論中，提到自我認知是個人對自己的處境的主觀感受，是來自社會經驗的存在連續性感覺，也是主觀的、反身的，必須被個人感覺到的。Goffman 強調自我認知的概念可考慮個人對於污名會有甚麼感覺以及管理。不管他人對個體的形象有何種想像或建構，他可以憑自己的意志建構自己的形象，評斷自己，從中建立自我認知。雖然自我受他人的社會態度影響，但個人可憑自己的意志產生相對應的自我感覺。

另外，本研究參考 Strauss & Corbin (1990) 的《質性研究概論》，有關主軸譯碼的方式，將互動情境視為現象，建構的他者視為脈絡，行動策略是個體策略，而自我認知就是結果。根據 Strauss & Corbin (1990)，現象是會引起一連串行動／互動來管理或處理的中心意念、事件或事情；脈絡是與某一現象有關的一組特定的性質，脈絡也意味著是一組特殊的條件，而行動者在這些條件之下，為了回應某一特定的現象，或對之加以管理、處理、執行，而會採取一些屬於行動／互動性質的策略。在本研究中，記者在與不同層次的概化他者的互動中建構了一系列對他者的想像和社會態度，

是有關現象的一組特定性質，並且根據他者的性質，採取相應的行動上的策略。行動策略是記者對於不同特質的主管所做出的回應策略，根據 Strauss & Corbin (1990)，策略的性質包括一、是過程的，在現象裡有逐漸萌生的本質；二、是有目的或目標導向的，是為了要處理一個現象或對之加以反應而產生的，它總有一些回饋的成份在內，有些行動／互動對於某一現象看似無任何關連，但因為會造成影響，因此也算行動／互動的一種。而回應一個現象而採取的行動／互動，或為處理某個現象而採取的行動／互動，都會有一些特定的結果，在本研究中即為記者的自我認知 (Strauss & Corbin, 1990/ 徐宗國譯, 1997: 109-121)。

另一方面，根據 Mead (1956: 220)，擁有一個體意識的個人，他以他所隸屬的社會群體接受或假設有組織的社會態度，去面對各種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是組織或社群面臨的。Mead 進一步以個人進入政黨的情況作為例子，他說明，當個人參與一個政黨，並接受政黨的組織態度來面對其他社會社群，以及政黨在特定社會情境下面臨的問題；接著，他以政黨組織的態度回應或行動。由此，個人進入一個與其他屬於該政黨的個人的特殊設定社會關係，同時，他也進入各種不同的其他特殊設定社會關係，與各種不同階層的個人接觸互動。這些不同階層的個人，也是其他特定有組織的次團體的一員 (Mead, 1956: 221)。

在一個高度發展、組織和複雜的人類社會社群中，這些各種具有社會功能性，隸屬於各階層或次群體的個人，分為兩類。有一些是具體的社會階層或次群體，是具有社會功能性的單位，底下的成員直接相互聯繫。另一種是抽象的社會階層或次群體，他們是間接性的社會功能單位，成員之間只是間接產生關聯 (Mead, 1956: 221)。

在這個情況下，處於第一個階段時，個人的自我是由組織其他個人的特定態度所構成。在第二個階段，自我不僅是組織特定個人的態度所構成，也組織概化他人的社會態度，或者組織他所隸屬的社會群體的社會態度，來構成自我，以達到完整發展的自我。這些社會或群體的態度，是由個人直接經驗感受所帶來的。個人成功接受這些社會態度，並進一步組織它們，概化它們 (Mead, 1956: 221)。也就是說，個人將社會群體的態度概化及組織為個體他人的態度，並對此作出反應和行動，發展完整的自我。

在個人概化有組織的他人為一整體的社會態度的過程中，Mead 指出，這個他者是有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次群體的，而個人會根據個體他人隸屬的不同社會階層和次群體，概化特定他人屬於的那個群體為一整體的社會態度。因此在同行、報館和報業環境這三個層次，華文報記者也自然地將不同的他者設定為不同社會群體的概化他人。同時，這些概化他人有具體的社會組織和間接的社會次群體之分，例如華文報同行、外文報記者是間接的社會次群體，而報館、外文報、政府是具體的社會組織。

第三節 記者與同行

在馬來西亞的媒體業，基於不同族群的需求而擁有不同的語文報，因此華文報記者做為一個個體，在「同行」這個社會群體內，擁有兩組不同的他者。一個是華文報同行，一個是外文報同行。在將華文報同行視為他者的時候，記者是以個體為自我的身份；在將外文報同行視為他者時，記者是以華文報記者做為自我身份的位置。記者在談論不同的他者時，預設的自我位置也隨著他者的不同而自行轉換。這是基於 Mead 提到的，在社會社群裡，有各種不同階層的他者或單位。

壹、個人（自我）vs 華文報同行（他者）

在記者把華文報同行視為他者這個層次，在形成自我認知的過程，包含互動情境、建構的他者、行動策略和自我認知。記者和華文報同行的互動情境包括互相幫忙、分享、交流的融洽相處情況，同時也有同行間互相競爭的壓力，可說是亦敵亦友；建構的他者方面，記者把同行視為被動的記錄員、抄寫員，不假思索地產製日常文字作品；行動策略方面，分為社會新聞和獨家新聞的採訪策略，不同新聞線的記者會發展出慣常的採訪策略，而對於獨家新聞，行內人士會有默契地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規定；在與華文報同行互動情境、建構的他者和採訪策略中，記者發展出來的自我認知包括糊口飯吃、受同行認同與賞識，以及新聞組別差異所造成的自我認知。這些自我認知都和前三項形成認知的過程有關。

1.1 互動情境：

在記者和華文報同行的互動情境方面，包括同行間互相幫忙、分享、交流的良好互動，也有同行間因服務報館立場不同，存有新聞上的競爭和壓力。在良好互動上，華文報記者之間的相處可謂融洽，在可分享的新聞和消息方面，大家都會給予對方友善的協助與合作。但是在重要新聞的爭奪上，則互不相讓，競爭激烈，關係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競爭。

1) 互相幫忙、分享、交流

大部份受訪的記者都說和華文報同行的關係不錯，大家會吃飯聊天，像朋友一樣，維持友好的關係。一些要好的記者同行也會交換相關領域人物的連絡號碼，互相分享公開的資訊。此外，華文報記者同行也會互相幫忙，互相分享一些可以分享的消息，交流新聞的寫作手法，一些年長或資深的同行，也會傳授及分享採寫新聞的心得，維持亦師亦友的關係。

A 記者：「好像閒聊吃午飯，我們都是中文報的一起，都在一起，同文同種的比較容易溝通。」

R 記者：「可能跟你要誰的電話號碼，部長啊，可以給就給。」

L 記者：「大家關係是不錯啦，在一些話題上都可以溝通，畢竟這個是一個團體的領域嘛，你不能獨來獨往，要不然就會被排擠...（華文報同行）亦師亦友，有很多前輩，就會請教他們，會分享應該怎樣寫新聞，一些新進的其他外報記者，也是對我們亦師亦友。」

D 記者：「同行之間大家都是朋友，大家都是認識的，...關係會比較好，會分享資訊...社會新聞，關係人脈強弱，和同行聯絡，互相幫忙，提供照片消息。」

另外，華文報同行一起到記者會採訪後，會互相討論記者會的內容，互相交流分享，如果一些記者詢問有關記者會的內容，大家都樂於分享自己記錄的記者會內容，尤其是記者會上公佈的數字，大家會互相核對。

J 記者：「如果是記者會上的東西，還可以交流。...比如說記者會上，有提到一些數字，大家還會一起對一對。」

R 記者：「看什麼情況，聽不懂，求證，就可以幫。...去一個 assignment 聽不明白，會跟他解釋。」

2) 同儕壓力／競爭

華文報記者同行之間在新聞上都存在著競爭關係，而同行之間的競爭主要來自報館之間的新聞競爭。

F 記者：「一些課題會有競爭，比較時下 hot 的課題會有。大部分是政治和突發性課題。」

B 記者：「跟其他華文報同行只是互相競爭，新聞的競爭。大家見面很好談，但私底下大家會互相競爭，因為大家都在搶新聞。」

D 記者就針對華文報界同行之間的競爭關係略述概況，同行的競爭關係由於報業集團和收購的現況，可說是「亦敵亦友」。收購之前，由於 III 報和 I 報同屬一個集團，是姐妹報，新聞是互相分享；而 IV 報和 V 報之間也是姐妹報，除了分享新聞，在人手不足的時候，還會互相分配採訪行程，再互相交換採訪新聞。這兩個集團之間是激烈的新聞競爭關係。2006 年，III 報和 I 報的集團老闆 ZXQ 通過股權收購了 IV 報集團的多數股份，將四報合併為同一集團旗下的報章，因此四報在新聞合作上出現「亦敵亦友」的關係。四家主流華文報章因為同屬一個集團，大家互相合作的同時也互相競爭。然而，在面對集團以外的報章，尤其是 II 報時，則是劇烈的新聞競爭和激戰。

D 記者：「06 年 ZXQ 收購事件之前，是很激烈的，屬於 III 報 I 報是一個集團，IV 報 V 報是一個集團，報館之間的新聞戰是非常激烈，尤其是在地方新聞上，大家搶獨家...現在，四報合一，亦敵亦友，防人如防敵一樣，有時候大家又要彼此合作，報界同行關係，很微妙。即使收購在一起時，各家報館在新聞上還是互相競爭，只是現在除了內部自己競爭外，還要面對外面的兩大對手，II 報和 GH 報。」

另一方面，在傳統上競爭較為激烈的 III 報和 IV 報，旗下的記者也會很在意對方的新聞準確性和可信度。同行之間除了在消息的獲取上較勁外，同行也會互相比較，看哪一個報館的記者獲取的新聞較準確，自己報館的新聞呈現和處理方式是否勝過對手。

IV 報的 L 記者總是有意無意地將本身的報館和 III 報作比較，不管在兩報的新聞消息的獲取方面，還是新聞呈現方式和新聞的處理手法方面，他都喜歡直接拿 IV 報和 III 報作比較，可見這兩報在記者的觀念裡，競爭關係是非常激烈的。

其中，L 記者將兩報明星記者之間的競爭關係作比較，指出他的 IV 報在獲取消息方面，其實比 III 報略勝一籌。當中，一直被他報視為明星記者的 J 記者，在 L 記者的敘述中，是 III 報的代表記者。

L 記者：「J 記者是代表 III 報，ZHC 是代表 IV 報，就拿陳廣才的新聞⁶來比較，ZHC 拿到的消息，公信力出來了，同行之間就會明白，原來 ZHC 的消息真的是一流的，那種虛榮心就會開始出現，原來我的消息來源準確到，連敵對報...友報的一姐都不如，都不敵我們⁷。」

從 L 記者先稱 III 報為「敵對報」，又改口稱友報的敘述，可看出兩報之間一直存在的競爭關係。而「友報」的稱謂顯示報業環境結構性的改變。但在記者同行間，競爭狀態依然存在。

同行之間也會比較各報章的新聞呈現和處理方式，通過同行之間的非正式審查機制，確立某報館在同行之間的地位，也顯示同行之間的競爭關係和同儕壓力的存在，相互較勁的意味濃厚。而在 L 記者的敘述中，他潛意識預設的競爭對手一直是 III 報的同行。

L 記者：「我不是要抨擊某些報紙，比如 III 報，情在人間，它到底是不是這一回事的話，就由讀者本身去判斷。同行可能看得到他們處理新聞的方式，這些同行可能會比較敏感，會比較新聞。他們看 III 報的新聞，會覺得部長好像沒有這樣說，就開始質疑它的專業，然後看 IV 報，覺得這個角度，IV 報竟然發覺到，IV 報會想到，大家都會覺得不錯...」

除了同行之間存在非正式的同行審查機制，各報館的主管之間也有非正式審查機制，以互相比較各報的新聞呈現和處理手法。

L 記者：「主管層每天都有開會檢討，檢討早報的頭條新聞，會判斷到底 IV 報的新聞比較好，還是 III 報的...大家就會講說，III 報為甚麼會這樣失策呀，大家拿的新聞一樣，但是拿的角度不一樣，就會比較。」

1.2 建構的他者：

在記者的認知裡，當與作為他者的對象互動時，就會在意識預設他者的存在，並在與他者的接觸下，逐漸在意識內建構一個他者的形象。根據 Mead「概化他人」的論述，包含四個階段，首先個人會將有組織的社會或社會群體內的所有個體的態度，概化為一個整體；其次，個人再根據各種各樣的構成群體生活的社會過程來行動；接著，他接受他所隸屬的有組織的社會群體的社會態度，去面對有組織的社會活動，並

⁶ 根據 L 記者的說法：「陳廣才辭職這件事，沒有曝光之前，報界都在揣測他到底會不會辭職，接果 III 報和 IV 報的做法就是，引述消息啦，他們各自的線人就跟他說不同的答案，III 報得到的線索是說，陳廣才肯定不會辭職，IV 報的線索是陳廣才肯定會辭職... III 報報當天的晚報說陳廣才肯定不會辭職，這個新聞見報後，就引起一些回響，結果隔天早報就換了一個新聞，說陳廣才已經辭職了，因為陳廣才在夜報截稿過後的時間宣佈辭職...」

⁷ 不過根據 J 記者的說法，又是另一個考量：「我們通過一些內部的管道，得到消息他已經辭職了。這個消息我們也用自己的方式去證實。以當時來說，要考慮的壓力來自於第一、這是一個確實的消息。第二、我們也知道事情在變，當時他已經辭職了，但是又被人勸告留下來... 我們的壓力就是，如果他回來的話，就會存在政治壓力，認為我們要陷害他。...陳廣才或他的支持者會這樣認為... 首相他們也為了配合，做了一個宣佈，他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即辭職）。」其實兩報獲取的消息是一樣的，只是 III 報還有別的考量，但看在同行記者的眼裡，III 報在新聞的競爭上算是輸了，公信力在同行間下跌。

發展一個完整的自我；最後，當個人涉入有組織的人類社會或他隸屬的社會的過程或活動時，個人接受所有他者的概化態度，以在面對過程或活動時可做為參照，也可做為有組織的社會經驗的關係和互動的參照，構成並導引個體自身相應的行動。

在第一個步驟中，個人將他所隸屬的有組織的社會群體概化為一個整體的他者，因此在記者的意識中，通過和他者的互動，概化和建構他者的形象就已經產生。而第二個步驟是根據與他者的社會活動來發展相應的行動，而他者在個人思考如何應付或行動時，是一個存在於個人意識，並被建構的一個他者形象。因此，記者在與同行接觸的過程中，在發展出相應的行動策略之前，必然有一個建構了的他者存在著。

記者組織及建構華文報同行此一社會群體的社會態度為被動的工作態度，並認為大部分同行工作態度不認真，只抱著交行貨的心態，不是像記錄員、抄寫員，就是像不作太多思考，單純端菜給客人吃的侍應生。

1)被動的記錄員、抄寫員和侍應生

受訪的華文報記者在談到同行時，大部分以華文報記者的工作態度為建構他者社會態度的其中一個特徵。華文報記者的工作態度是同行在觀察時，所留意到的一項顯著社會態度。在華文報同行之間相互觀察到的工作態度中，華文報記者主要以兩項重點來建構同行，即華文報記者只是被動的記錄員或抄寫員，以及把記者的工作當做糊口的職業。

II 報的 G 記者和 III 報的 N 記者，都認為華文報記者是被動的抄寫員，不會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也不會針對課題存疑，並發問問題，沒有屬於記者這個行業應有的態度和認知，只是純粹記錄新聞人物發表的談話，再寫成新聞，完成工作，他們當作記者只是記錄員和抄寫員。

N 記者：「很多記者只是抄抄抄抄，抄完過後，回去對一下，互相討論要拿甚麼做頭，對一下數字，就回去寫新聞，也沒有人發問。」

G 記者認為華文報記者沒有屬於記者這個行業應有的態度和認知，只是純粹把工作完成，不加思索和批判。他也和 N 記者一樣覺得記者只是被動地抄寫記者會的內容。

G 記者：「我覺得記者不應該只是記錄別人講過什麼話的人，可是目前大部分的中文報記者只是記錄員，像是一個 waiter 或者是 waitress，只負責捧菜，不會想到他們自己也可能是一個廚師，負責煮菜出來。... 採訪記者新聞發布會，一大堆人圍著一個人，那個人講什麼你就寫什麼，很被動。」

另一個在工作態度方面塑造其他華文報同行的他者社會態度是，大家都當記者只是混口飯吃的一份職業，沒有認真地把這份工作當做是可用心經營、發展的事業。

F 記者：「一些記者把新聞事業當作工作，所以我做完了就回家。」

K 記者：「沒有理念把它當成一份工作職業，它只是要說...混口飯吃的職業，尤其是結婚成家立業的。」

G 記者更進一步認為，華文報記者寫新聞的心態只是交行貨，能夠把工作做完，向主管交差就行了，沒有意識到記者是對廣大讀者群負責，而不是對主管負責。基於華文報記者缺乏這層認知，他認為華文報記者工作只是為了「找口飯吃」，而沒有身為記者的正確認知，並對新聞抱有理念。

G 記者：「我會將每篇新聞當做自己的創作，可是很多新聞從業員，沒有這樣的，認為寫了交貨，交給主任看，他們不是想到交給讀者看，...只是交行貨，只是找口飯吃。」

1.3 行動策略：

記者提到的行動策略主要是社會新聞和獨家新聞方面的採訪策略。這主要是因為華文報之間競爭較為激烈的新聞類型是社會新聞。在獨家新聞上，同行間都有默契和共識，遵守有關獨家新聞的不成文規定。同時，如果某記者和同行之間關係不好，還會有獨漏新聞的可能。

1) 社會新聞的採訪策略

在與同行的新聞戰中，社會新聞組的記者較能感受到報館之間搶新聞的激烈戰況。有別於普通組記者多數是通過出席記者會來獲取新聞的方式，社會新聞組的記者除了警方召開的記者會，大部分的新聞來源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人脈和強大的聯絡網而來。在建立的過程中，社會新聞組記者各出奇招，以在激烈的新聞戰中出奇制勝，為報館帶來最快、最準確的社會新聞。這是華文報同行之間競爭激烈下，社會新聞記者所發展的採訪策略。

受訪的記者當中，有兩名記者願意透露社會新聞組記者是如何建立人脈關係和聯絡網，以及他們所觀察到的社會新聞記者採用的採訪策略。同行建立網絡的方式是交際應酬、投懷送抱、圓滑、金錢交換新聞。

一直在社會新聞線上的採訪的 I 記者，發展出屬於他自己的消息來源網絡。在社會新聞組，他強調，「要做到自己強，網絡強就會強，線人要強，要犧牲自己的時間」。而他所認同的獲取消息的手法是通過「真正的友誼，需要很多時間去打造」。

I 記者透露其他同行，包括外文報同行建立網絡的手法，是花時間去和線人交際應酬，迎合對方的要求，用金錢買新聞，甚至女記者願意獻身的做法：「（社會新聞組的線人包括）警方、醫護人員、棺材佬、拖車佬，為了建立網絡，（記者）放工後和線人娛樂，迎合對方的要求，花自己的時間、精神、金錢去建立，...甚至一些女同行，為了建立網絡，會犧牲色相，...在這個報界都有的現象，不管是華文報、西報、馬來報，...也有人用金錢買新聞，做他的聯絡網。」

此外，來自 I 報館的 O 記者，也提到這種採訪現象。她最初步入記者行業時，就擔任社會新聞組記者兩年，但是她不喜歡突如其來發生的意外，時間上難以自由安排和控制，加上意外組競爭激烈，她在兩年後就選擇轉組到醫藥組，專職採訪醫藥新聞。

提及在社會新聞組的工作情況，很多同行用不同的手段獲取新聞：「意外組競爭激烈。...（同行）不擇手段，拿新聞白熱化。平常要去醫院要跟棺材佬打好關係，去停屍房、警察局跟員警打好關係，還有拖車佬之類的、葬禮死者家屬。...有女生會對警方投懷送抱，晚上去 disco 應酬...。要請他們吃飯，...要在警官面前會講話。」

2)獲取獨家新聞後和同行的互動策略

雖然華文報在互動方面呈現一片「和樂融融」的景象，互相幫忙、交流、討論，甚至分享相關新聞人物的聯絡方式，但是華文報記者之間都有一個共識，如果是獨家的消息，記者就不會和同行分享。這是華文報同行不成文的規定。

A 記者：「對外的情況，因為報館的政策是這樣子，要保護自己的採訪對象，保護自己的消息來源，那當然是不可能共用的，而且其他的報館記者也不可能跟我們共用。」

R 記者：「如果是私底下拿到就不會給人，大家都想表現，如果給你，我就沒有獨家了。」

在面對同行競爭搶獨家新聞時，I 記者和同行之間的關係仍然很好。他在獲取獨家新聞時，他會通知同行他當天有獨家新聞，讓大家瞭解，而不是默不作聲，以這樣的態度面對同行，是爲了確保和同行之間未來仍然能夠保持良好的關係，以後依然還有互相合作，互相幫忙的可能，同時爲自己在報界保持較好的聲譽。

I 記者：「基本上我跟他報的關係還好，當有新聞上的 scoop 時，我會告訴他們，對不起，我今天會有 scoop，你們看著辦，我會給他們一個提醒，至少人家比較 respect。」

除了獨家新聞以外，報界還有新聞的獨漏，這對於記者來說，是最悲慘的一件事，正如 I 記者說的：「真的，你獨漏兩三次，你自己就要打包了，你準備引咎辭職了」。因此，記者必須建立完善的聯絡網，甚至是和同行打好關係，才能避免被同行排擠和杯葛，出現只有自己獨漏新聞的情況。因此，在與同行的關係上，I 記者更強調和同行保持良好的關係，因此獨漏新聞對社會新聞組的記者來說是承擔不起的重大責任。

此外，D 記者也提到報界記者有關獨家和獨漏新聞的不成文作法：「報界有不成文的規定，當自己的是獨家的話，不會和人分享。如果獨家也被另一家拿到了，那寧願不要獨家，也不要獨漏，就會分享。」可見，新聞上的獨漏對記者來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和同行記者分享消息有時是避免獨漏的作法。

1.4 自我認知：

與華文報同行互動過程中，記者發展出三種自我認知。一是「糊口飯吃」的自我認知。當其他記者認爲同行只是被動的抄寫員，抱著交行貨的心態時，就有一些記者是抱著這樣的自我認知，他們只是把記者當作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以賺錢養家，對工作不抱任何期望和理想。

二是受同行認同與賞識。根據記者在報館身處的位置，其報館在報界的位置，以及概化他者的反應，可對應出記者這方面的自我認知有何特質。有記者由於報館的地位卑微，極欲獲得認同而不可得，因此感到不滿；有記者因為報館的影響力和公信力，以及記者的能力受到同行認同，而產生虛榮感。

三是新聞組別的差異。社會新聞記者對組別差異感受較深，因他們常被普通組記者看不起，覺得這條新聞線的記者低人一等，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組記者接觸的消息來源多為社會較下層的人士，以及進入普通組門檻較高，需要掌握良好語言能力。

1) 「糊口飯吃」的自我認知

在一部分的記者將華文報同行做為他者，形塑了一個「糊口飯吃」的他者社會態度時，就有記者自認為他們只是把記者當成工作，因為記者這份行業對他們來說已經不是能夠實現理想的一份職業，他們唯有抱著「過生活」的態度面對工作。而抱著這種態度工作的記者，不是已經有一定年資的記者，或者年屆退休年齡的記者，就是對這個報業環境深感失望的記者，是空有理念卻無法施展抱負的記者。

在 III 報服務了 15 年的 H 記者，有一定的年資，記者這個行業對於他來說，只是一份「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

H 記者：「我也是找一份工，維持我們基本生活...不太適合把記者的工作，當作實現自己理念的職業，因為環境如果不改變，這樣下去價值不在。」但是，他不認為記者是一份「混口飯吃」的工作，「『混口飯吃』，代表我們不重視這份工作，層次不一樣」，這代表他重視這份工作，但是卻不能當成是實現理想的事業。

此外，和 H 記者一樣喜歡文學創作，擅長寫新詩的 M 記者，自 1985 年開始就在馬來西亞報界當記者和編輯，目前在 V 報擔任華團專線的記者。在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下，他已經瞭解到在報界實現理想的不可能，而且他今年 54 歲，明年就退休了，因此，記者的工作對他來說只是為了獲取一份「養妻活兒的薪水」，「等著放工、下班、上班」。他認為記者只是一份維持生活，為了糊口飯吃的工作，同時記者每天出席日常的採訪活動，只是一架「自覺的錄音機」。他認為，年過一年地當記者，每天應付日常工作，每天審稿、寫新聞，10 年後還是一樣的工作，還是一樣的疲倦。

在 V 報工作的 A 記者，和 V 報的理念格格不入，完全不契合，在空有理想卻無法發揮、實現的現實情況下，她對於記者這份工作的自我認知，也是抱著「糊口飯吃」的觀念。她提到：「雖然我很想去做到這樣高尚情操的記者，可是不行，我們要迎合市場，因為我們 V 報是夜報，是最暢銷的，所以我們寫的事情最重要是吸引讀者。」理念在報業環境無法施展的情況下，她唯有抱著記者只是一份「糊口飯吃」的職業，對它不抱任何實現理想的希望。

A 記者：「我們是以生活所需為主，你看重自己飯碗比看重新聞的所謂揭露正義呀、公正呀，還看得比較重，你最好不要給我的報館關門，我一定要我的報館持續地作業，那我才會有吃飯的機會...因為現在我覺得，記者這個行業，不是那樣的高標準，它就好像一份吃飯的工作，要說爭取公正，達到社會公平呀，要揭發甚麼的，我們還沒有到這個層次，我們只是為了糊口。」

抱著「糊口飯吃」心態的記者，都對報界存有一定的理想和幻想，在經過多年在報界的記者生涯後，他們對現實工作環境不抱太多希望。他們表現出來的是如 H 記者悲觀消極的態度，M 記者對記者工作已覺疲憊，而 A 記者在表達不滿之餘，還多了一份憤慨與無奈。

2) 受到同行認同與賞識的自我認知

II 報的 G 記者在報導了轟動全國的「AP 事件⁸」新聞後，受到各方矚目，根據他的說法，他的報導如果只是刊登在比較不具影響力的 II 報，是不會引起各界，尤其是政府的注意。這是因為馬來西亞著名的網絡部落客黃泉安⁹把 G 記者的新聞「全部翻譯出來」，是黃泉安在網絡世界散佈這個消息後，「才導致整個政府跳起來，要不然是沒有影響力的」。

但是，在報導了這則大新聞後，G 記者出外採訪時，並沒有感受到同行對他的賞識和注意。在他以為華文報很難得地得到通常是外文報才會得到的重大內幕新聞時，他應該能獲得同行的讚賞和矚目，但是同行給予他的態度，讓他對於受同行認同和賞識的自我認知持續低落，尤其是英文報同行對他的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

G 記者：「後來我出去採訪，...他們只知道是 II 報作的報導，因為他們不 care 誰專訪，不 care 你的 II 報是什麼日報，中文報不 care，啊啊，外文報也不大 care，中文報可能...我不大懂啦...」

G 記者感受到同行對他的不重視，和華文報界的競爭關係有關。G 記者服務的 II 報是四家主流華文報章之外的非主流報章，在新聞和報業市場的競爭上，II 報和 III 報尤其競爭激烈。有鑑於四家對一家的競爭關係，II 報記者會感到其他報章記者在新聞上的壓力和威脅。由於其他四家主流報章有新聞共用的不成文規定，II 報記者在漏新聞方面承擔很大的壓力和責任，因此，即使勢力弱小，在銷量市場更是敬陪末座，讀者群無法突破四報壟斷的局面，II 報記者仍然充滿理念，他們唯有在新聞處理和消息的獲取上，儘量做出有素質、具批判性、值得思考的新聞，才能在新聞戰上與四報相抗衡。因此，當從 III 報跳槽到 II 報的 G 記者，他獲取這麼爆炸性的內幕消息時，更是渴望華文報同行能夠對 II 報或他，表現敬佩之情。但是，G 記者並沒有感覺到來自同行的認同和賞識，並進而影響他的自我認知。

須知，華文報記者在外文報常獲取政府相關的獨家消息或內幕消息的情況下，華文報記者要打通和政府官員，尤其是馬來官員的人脈，是難上加難的一件事，一般的馬來官員都不會吐露內幕消息給華文報記者。在這種華文報在報界比較弱勢的情況下，

⁸ 馬來西亞國產車(Proton)首席執行員 Tunku Mahathir 於 2005 年揭露當時的國際貿易部長拉菲達發出汽車入口准證(AP)時，只照顧幾家公司，違反了政府要照顧大多數土著企業家的宗旨。當時由 II 報的 G 記者獨家報導，轟動一時。

⁹ 黃泉安是馬來西亞著名的部落客，他的部落格 *Screenshots...* 專門報導馬來西亞有關的最新課題，主要和政治有關。這個在 2003 年開始設立的部落格，曾經被馬來西亞具有影響力的網絡媒體 *Malaysiakini*，選為「馬來西亞最有影響力部落格」。在 2005 年，他的部落格還獲選為由「無疆界記者」頒予的亞洲項目自由部落格獎項 (Freedom Blogs Awards)，他可說是馬來西亞部落格領域的先鋒。他的影響力在 2008 年馬來西亞大選中得到印證，他代表反對黨之一的民主行動黨 (DAP) 參與國會議員的競逐，並為民主行動黨獲得一席國會議席，得票率為 75.85%。(http://en.wikipedia.org/wiki/Jeff_Ooi)

身為華文報記者的 G 記者能夠取得，已經是難能可貴。更何況，II 報在華文報界又是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因此，II 報在這種雙重弱勢的情況下，報導了能讓國內所有媒體，包括一向居於上風的外文報矚目的新聞，自然是十分值得引以為豪的一件事。

可以這麼說，處於弱勢的 II 報，可算是為華文報爭光。但是由於華文報界內，弱小的 II 報又與其他四家華文報具有競爭關係，因此，G 記者感覺到並沒有受到華文報同行的認同與賞識，反而有「中文報不 care」的感覺，語氣中顯出一絲失望，顯然他的報導並沒有為 II 報和華文報在報界處於弱勢的地位產生甚麼改變。他和 II 報依然不受注意，II 報仍然在媒體的核心之外，對社會仍然沒有一定的影響力。

值得一提的是，IV 報的 L 記者曾經在訪談中提到這則新聞報導，事實上，這則新聞是在 2005 年由 II 報揭露的，至今過了 3 年，L 記者依然記得並提及，而且是以為華文報自豪的語氣來述說：「就好像那個 AP 的課題，也是 II 報的記者，G 記者，西報馬來報都是對 II 報很肅然起敬的，因為這麼大件事的新聞，中文報拿到真的是很難得的。」語氣中流露的是敬佩和認同，對於 G 記者的能力也極為讚賞。

而 G 記者提到的「中文報不 care」的感覺，主要是他覺得華文報同行對待他的主觀觀感，是他個人的自我感覺。究竟事實上，華文報記者是否真的對他「不 care」，則無從確認，不過他個人真實的感受，就是覺得華文報記者沒有留意到他。這顯示出在馬來西亞報界和華文報界處於雙重弱勢的 II 報和 G 記者，極欲通過新聞上的實力來展示 II 報或記者在報業市場和報界的價值和影響力，這個渴望得到認同的心態，源自於雙重弱勢的處境，而 G 記者主觀感受到的同行態度，直接影響了 G 記者的自我認知。

另一方面，L 記者對於受到同行或同事的認同和賞識，有虛榮的自我感覺。而這個虛榮心來自同行之間的讚美，同事給予的認同，以及記者名聲在外界的曝光度。這顯示出記者在報界的地位和價值，也表示記者在處理新聞上的能力受到肯定。

L 記者：「很大程度上是同行之間給的讚美...那就是說你的線索和消息來源不錯，有本事挖到這樣的新聞，然後大家就會把你視為那個領域一哥一姐的地位。...然後甚至受到你的同事的認同，就是說你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報紙，追的新聞很獨特或者是很有價值，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字的存在，然後你就知道原來你還是有知名度，這種虛榮心也會在作怪囉。」

III 報的名記者 J 記者，也提到她受到同行認同和認識時，產生的虛榮感。和 L 記者一樣，她的虛榮感來自記者名聲在外界的曝光度。她的名字常出現在報章上，而且都是重要的新聞，因此讓她晉身馬來西亞華文報界明星記者的行列。筆者在訪問其他報館的記者時，她的名字一再被提及。可見她被華文報同行認識的程度，以及知名度較其他受訪記者為高。對於自己知名度和曝光度如此之高，以及受到同行認識的情況，J 記者的自我認知是感到虛榮。

J 記者：「我在工作上得到的不是滿足感，我覺得我是虛榮感，是不應該有。我的虛榮感來自名字的出現，是社會上的一些政治人物，（會認為）我滿認識她的，她就是這樣。比如說一些同行，會說就是她，她就是報導馬華的。」

3)新聞組別差異的自我認知

一般記者對於社會新聞組記者的認知，通常是層次較普通組記者低下。由於社會組記者都是和社會上比較低階層的社會人士，如棺材佬、拖車佬打交道，報界記者也憑此判斷社會組記者的層級會比較低，尤其是和常出席政治人物記者會，報導的都是關係國家大事、國家政策、政治局勢和動態的普通組記者比較之下。另外，報界記者普遍會認為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不需要擁有良好的語言能力、寫作能力、洞察時事和分析政治局勢的能力；而普通組記者則必須是教育程度較高的記者，有良好的語言能力，這樣才能和政治人物打交道、套交情、在記者會上發問。在這種對能力的要求下，社會新聞記者很容易會被對社會新聞組缺乏認識的其他同行瞧不起，或被認為是記者群裡面較低等級的記者。

I記者在社會新聞線上工作了12年，對於普通組和社會新聞組的組別差異感受特別強烈和深刻，尤其是I記者只有中學學歷，對於大學畢業或教育程度較高的記者會比較敏感，受普通組這類比較高級組別的記者歧視的感受更為強烈。

I記者：「New desk的記者，就是普通組、官方，或者一般function的，會自命不凡，他們那一組和我們這一組想法有差異...所有語文報，都有組別之間的差別。很多時候有機會cover部長、官方節目的記者，都會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其他組別，特別是社會組，他們不屑一看，他們認為我們這種組別跟他們的level是不一樣的。因為能進他們那一組的，語文能力掌握會比較好，大部分那種組別的人都會認為自己的教育程度比較高，自以為是...這是我們同行裡面很強烈的感受和感觸。」

貳、華文報記者（自我）vs 外文報記者（他者）

當華文報記者將馬來文報和英文報記者視為他者時，會以「我們」來指稱華文報記者這個群體，而外文報記者就成為口中的「他們」。受訪記者與外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過程，包含了互動情境、建構的他者以及最終發展出的自我認知。

其中，互動情境下，有兩種互動模式，一種是較少溝通，另一種是互相幫忙，兩種模式都會對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產生影響。另外，華文報記者根據與他者的差異，建構外文報記者作為一社會群體的形象，他們根據外文報記者工作的專業素質和自認為的態度為兩種建構的他者形象。在自我認知部分，華文報記者自覺微不足道和發問問題的自我認知，都是在和外文報記者相比之下，將他們作為一概化他人的社會群體，根據概化他人的社會態度，進而發展出對應的自我認知，表示大部分華文報記者在面對外文報記者時都有種自卑感。

2.1 互動情境：

華文報記者和外文報記者之間主要有兩種互動模式，一種是溝通少和拒絕往來，另一種是會互相幫忙、合作和分享新聞消息。

華文報記者和外文報記者的互動和交流比較少，這主要是因為在外文報工作的記者多為友族，即馬來人和印度人，就算是華人記者，也因為慣常使用的語言和教育背景

不同而少有來往。因此，教育、語言和文化的不同是華文報記者較少與外文報記者溝通的因素。

A 記者：「有和外文報互動，可是我們不會那樣的密切，因為思路不一樣，感覺上思路不一樣，他們也要保護自己的一些東西...同文同種的比較容易溝通。」

L 記者：「...大家沒有太多的交集，就是比較生疏、陌生的感覺。」

此外，也有華文報記者覺得外文報記者的態度很驕傲，而不屑與他們往來。

G 記者：「不會深交，而且他們不大願意，他們看不起中文報的...英文馬來文不好的話，他們不跟你講話，溝通不到啦，我看他們這樣『串』（驕傲），我也是沒有跟他們講話。」

雖然一些華文報記者很少或拒絕與外文報記者往來，也有華文報記者和外文報記者的互動是友好和互相幫助的。

B 記者：「是他們要我們幫忙，還是我們要他們幫忙，都沒有問題的。因為我們跟他們都沒有競爭。」

N 記者：「會互相交換消息，會互相幫忙，問 contact，有時候受訪者不會講國文（馬來文），我們訪問了過後就現場翻譯給外文報記者，他們有甚麼問題要問，也幫忙轉問...」

一些華文報記者甚至經常與外文報記者在新聞上合作，交換消息。這主要是因為華文報記者同行之間競爭激烈，在新聞的獲取和消息的交換上，較不適宜進行密切的合作，以妨危害各自報館的利益，尤其是傳統上競爭較激烈的 III 報和 IV 報；近年來，由於 II 報的成立，作為非主流報章，即四家主流報章以外的報紙，更是無法和華文報記者進行新聞上的合作，旗下的記者唯有和外文報記者合作，以在四家主流報章主導的報業環境中，突圍而出。而 B 記者也提到，華文報和外文報並不存在競爭關係，只要華文報記者懂得如何與外文報記者互動、交流，互相交換消息的合作關係是可以實現的。

在報業環境下處於弱勢的 II 報 F 記者就經常和外文報交換消息，進行新聞上的合作，他甚至和外文報記者的互動還多於華文報記者。當中也包含和外文報記者的交際活動。

F 記者：「我跟外文報記者的互動多過跟中文報的互動。我們會交換消息、喝茶談天，因為你不能夠只是單純只是工作上的來往。」

另一方面，對社會新聞組記者來說，與外文報記者的合作是避免其中一家華文報獲取獨家消息，甚至是避免自己獨漏的方式。

I 記者在提到當時成爲華文報同行的公敵時，他除了依靠自己打通的人脈來獲得消息，也通過和英文報記者，以及通訊社和電視台記者的合作，來獲取華文報記者沒辦法得到的新聞，進而使自己在華文報界中變得強大。

I 記者：「我當初自己獨立的時候，我跟中文報完全沒有合作，可是我跟外報還是有合作，和外報保持聯繫... 電視台也是，甚至是 Bernama（馬新社）。一些聯繫網要做得更強，只有在這種條件下，讓自己變強大，就不怕別人欺負。」

2.2 建構的他者：

華文報記者對英文報記者建構的他者形象分爲兩類。一是工作的專業素質，當中有兩類記者對此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覺得英文報非常專業，是華文報記者無法比擬的；另一些記者則認爲英文報記者並不比華文報記者來得專業。二是英文報記者自以爲的態度，受訪記者中，有三類記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覺得英文報記者自以爲了不起；另一些則認爲英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和接受程度較高；還有一些則持中肯態度，認爲英文報記者不一定自認爲專業，這要視乎記者本身的素質。

1) 工作的專業素質

A 記者非常讚賞英文報記者的管理和編採作業方式，她認爲英文報記者都專注在一個政府部門的專線上；有較多的時間深入研究部長過去的言論和新聞；主管也有給記者特定的採訪指示，要求記者挖到「料」回來，而且對自己挖到的新聞素質有一定的要求。她也對英文報記者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專業的採訪技巧表示嘆服和欽佩。

A 記者：「他們的管理比較專業，他們一個人跟一條線，比如說那個人跟衛生部，就是他了，然後他們有比較多的時間做研究，可能他們還沒有去部長的節目以前，他們就有充足的時間為這個部長以前的新聞做一個跟進... 西報主管有給他們指示要挖哪個課題... 我覺得西報它的專業就在這邊。如果他們那一天問不到重要的東西，他們感覺上會很洩氣... 比較資深的記者，他們會對自己拿回去的新聞有一定的要求...」

相反地，和英文報記者比起來，A 記者覺得華文報記者人數少，無法像英文報記者那般專跑一個政府部門專線；也沒有時間研究和跟進部長的言論和新聞，因爲華文報記者回到報館會非常忙碌，平均一天要出席兩到三個採訪活動；華文報主管也沒有給記者特定的指示，而是記者會內容有甚麼就寫甚麼，只是要求記者被動地記錄記者會所有的情況和談話。

A 記者：「像中文報的記者，因爲人數少，像 V 報只有 20 多位，回到報館我們是不得閒的，就是不能爭取更多時間來深入地去看這個部長曾經講過甚麼話... 主管沒有給你一個特定的課題，你拿到甚麼料回來就寫甚麼料囉... 我們中文報，尤其是 V 報，有甚麼就吃甚麼。」

另一名觀察到英文報記者擁有專業知識的受訪記者是 I 報的 O 記者，她跑了兩年的社會新聞線後，轉到醫藥組，一個對醫藥知識要求非常高的新聞組。她發現英文報負責醫藥專線的記者具有非常豐富的醫藥知識，而且專業素質非常高。

O 記者：「現在接觸的記者有醫藥系畢業的，*The Star* 的醫藥記者是一個醫生。只是沒有實習，就進 *The Star*。他們非常具有專業資格。」

在 III 報專跑財經線的 K 記者，也認同外文報記者，尤其是英文報記者的專業知識淵博：「英文報的架構允許他們專業，他們都會區分，比如新記者你要採訪什麼領域就自己做功課。...英文報財經就是週刊，專業性高。...他們的知識比中文報深入。」

相比之下，K 記者認為其他語文報，如馬來文報和華文報，都不及英文報的財經新聞報導那般深入和專業，對記者的要求也不如英文報那般要求具有深入的財經知識：「馬來報財經新聞比較弱，他們不太重視財經...我們中文財經組就不專業。一個人要跑很多不同的領域，知識比較廣，不深入。」

III 報的 H 記者，提出兩項外文報記者較華文報記者專業的觀點，一是外在的薪酬福利，二是記者本身掌握的語言能力：「（外文報記者）福利比較優秀，高我們一個強項；語言上主導官方新聞，比我們優秀一點。在這兩個條件下，他們認為比我們更專業。」

不過，當華文報記者對外文報記者的專業能力和專業素質大加讚賞之餘，也有華文報記者持有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外文報自以為自己很專業，可是同行對於他們是否有達到專業的標準則表示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外文報記者只不過覺得自己比華文報記者較有機會獲取重大新聞，與政府部門有較好的人脈，就自以為了不起，但是如果要說是否真正具有專業素質，他們則不苟同。

F 記者：「...（外文報記者）專業不專業我就不知道...我覺得他們還沒有達到專業水準。」

L 記者：「如果他（外文報記者）有這樣的地位，他們自然而然地會受到一些方面的嘉許，比如有很多機會去拿到好新聞，去做一些其他記者做不到的事情，這是沒有的囉。他主要採訪首相、副首相，寫一些專題，就這樣而已，可能一些人認識他，一些人知道他是誰，但是要談社會地位和價值的話，也不完全有啦...然後華文報記者就覺得你的專業也不見得有阿，你問的問題很無聊，是白癡問題...」

相較於上述兩方對外文報記者不同的專業形象建構，D 記者對於專業記者的形象建構則比較中肯。他根據他對記者的專業標準，認為不管是外文報記者還是華文報記者，只要具有超越普通人的「經驗、閱歷和人脈，還有觀察力和分析力」，就可稱得上具有專業素質的記者，而外文報和華文報的資深記者都有資格被稱為具有專業素質和地位的記者。但是現在很多普通記者，不論是華文報還是外文報，都沒有達到這個專業標準。

D 記者：「外文報的話，可能一些很資深的記者會覺得自己是專業的，因為我認為記者的那一殺那認為自己是專業的感覺在於說，你的經驗、閱歷和人脈，還有你的觀察力和分析力，只要你這幾點都已經很足夠的時候，你就是專業的，因為你超越普通民眾不能夠達到的境界...外文報的，很多普通記者跟大家一樣渾渾噩噩。」

2) 外文報記者自認為的態度

一些華文報記者認為外文報記者常常自以為是，也自認為很有專業素質，是專業人士。他們對於外文報記者這種自視甚高的態度嗤之以鼻，甚至不屑一顧。同時，這些華文報記者也不認為外文報記者具備專業素質。他們認為外文報記者之所以會高人一等，是因為他們自以為高高在上的心態，以及自以為了不起的態度，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實力。

F 記者：「他們會自以為是...他們都很自我，可能他們會覺得他們跟別人的關係很好，可以拿到一手資料，認為自己很了不起...」

L 記者：「有些西報馬來報的記者，他們會有這種所謂的架勢，就是他們會認為自己就是專業人士...」

R 記者：「他們自以為是。...馬來報記者剛入行會很謙虛，半年後就有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另一方面，有些記者對外文報記者的看法不盡相同，他們不會認為外文報記者自以為很了不起，而是認為外文報記者對於自己職業的自我認知程度較高，尤其是和華文報記者比起來。其實，這兩組記者看待外文報記者的觀點近似，都是同樣描述外文報記者高一等級的地位和態度。但是上一組記者採用負面的情緒字眼，或含有貶意的形容詞來描述外文報記者；而這一組記者則是以較正面的評價，來看待比華文報記者高一等級的外文報記者。兩組記者對於同樣地位和態度的外文報記者，因為各自抱著不同的心態，而有了褒貶不一的他者形象建構。

G 記者：「他們的 self-acceptance，自我接受程度會比較好一點。」

N 記者：「他們的自我認知價值很高的，他們自我定位的價值也是很高的。」

而對於外文報記者自我認知高的原因，N 記者認為：「外文報記者受英文教育比較多，因為西方國家對記者有不同的評價，他們不叫 reporter，叫 journalist...reporter 你 report 你所聽到你所看到的；journalist，你分析，選擇性地報導重要的東西出來，兩個詞就不同了...我也當我自己是 journalist...」

N 記者在把外文報記者當作是專業的新聞從業員，擁有較高的自我認知的同時，也把自己和他們融為一組，是屬於同一個等級的專業記者。

但是，N 記者提到有關 reporter 和 journalist 的觀念，並認為自己是 journalist 的想法，也有受訪記者提出與他一樣對記者定義的認知。那就是認為外文報記者自以為是的 F 記者。他在訪談中曾強調：「具有專業素質的是一個新聞從業員。記者是人家講，然後記錄下來。那個（新聞從業員）已經是更高的層次。」F 記者口中的記者其實就是 N 記者的 reporter，而新聞從業員則是 journalist。因此，他們可說是對記者的角色擁有相同的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對記者角色的認知有相同觀念和定義的兩位記者，在建構外文報記者的他者形象時，卻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態度。N 記者強烈地把自己歸納為外文報記者組別，把外文報記者這個他者納入為自我的一部分；而 F 記者則一直把外文報記者視為他者，以他者的角度批評他們自以為是，同時，也沒有認為自己對記者角色的觀念與外文報記者相似。相反地，N 記者則認為自己對於記者角色的觀念是和外文報記者類似，卻不認為華文報記者有相同的看法。

從 N 記者的敘述中，他極欲通過建構他者和自己的共同點，來讓自己加入那個群組，並意圖擺脫華文報記者比較低下的刻板印象。在他的觀念中，他雖然身為華文報記者，但他是與眾不同的華文報記者，和普遍對華文報記者較為負面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他並不屬於那一類華文報記者的群組。同時，基於他在華文報界第一大報的 III 報服務，也自認為是 III 報的明星記者，他在華文報界就較其他華文報記者高一個等級，也就是其他華文報記者和他相比的話，其實是低一個層次的群組。當他認為他在華文報界處於最高等級的記者位置時，自然就可以很順利地進入一般觀念裡，較華文報記者高等級的外文報記者群組中。

相反地，即使和 N 記者在記者角色的認知上，具有相同的觀念，F 記者始終以華文報記者自居，並不會特別認為自己高人一等，甚或高於其他華文報記者一個等級。雖然 F 記者的新聞理念和華文報的普遍認知不同，他認為華文報太注重量，而忽略新聞的質，但他並沒有強烈的意圖把自己和華文報記者的身分切割、擺脫，而是以華文報記者的身分，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華文報的慣習、報界文化和規定。這和他服務的報館也有關聯，II 報是非主流報章，銷售量是所有全國性華文報中最少的，F 記者縱使具有新聞理念，但有鑑於報館在報界的弱勢地位，他的自我認知不會比 N 記者來得高。由此，F 記者與 N 記者對華文報記者這個身分，擁有截然不同的身分定位。

另一方面，K 記者並不認為外文報記者就是高高在上的專業人士，華文報記者雖然整體專業程度不如外文報記者，但外文報記者仍然還未達到真正的專業標準。這主要是因為 K 記者並不認為記者是一門專業的職業，只能算是半個專家的觀念所致。在這個對記者角色認知的前提下，他不認同外文報記者是專業人士，因為記者這個行業本身就不是一個專業的行業。同時，他也不覺得外文報記者認為自己是專業人士。

K 記者：「我對於外文報記者自認為是專業人士的感覺不強烈。」

另一位 D 記者和 K 記者一樣，並不認為外文報記者是專業人士，同時也覺得外文報的普通記者自己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專業的。但是資深記者則會覺得自己是專業，這也包括華文報記者。在 D 記者對他者的建構中，不存在外文報記者比華文報記者高一等級的形象，但是卻有資深記者與普通記者之分，資深記者實際上會較普通記者來的專業，而資深記者本身也會覺得自己是專業的。

D 記者：「外文報的話，可能一些很資深的記者會覺得自己是專業的...那你去問外文報的，很多跟大家一樣渾渾噩噩，在採訪線上那些普通記者，你問他他也不覺得（自己專業）...可是你去問那些很資深的，4、50 歲的那些，他當然會覺得自己是專業。」

2.3 自我認知：

華文報記者在與外文報記者比較和互動之下，發展出的自我認知有兩類，一是自覺微不足道。由於報業結構和政治環境的結構性條件，包括薪水、政府接近性、讀者群，記者普遍抱有卑微或自卑的心態。此外，華文報記者也因為本身語言能力的不足，而感到自卑。第二種自我認知是華文報記者對於發問問題的認知。由於華文報記者在記者會上一般都不發問問題，一些記者認為沒有必要像外文報記者那樣一直發問，另一些則認為應該向外文報記者學習勇於發問問題。

1) 華文報記者自覺微不足道的自我認知

有關華文報和外文報之間在報業結構上的差異，在薪水福利待遇方面，華文報比外文報微薄；在政治環境下，華文報無法像外文報那樣主導國內的新聞動態，也不如外文報那麼具影響力；同時，由於外文報具有政黨背景，在獲取重大政府相關新聞時，較有優勢，外文報記者在政界有廣大的人際網絡，也是華文報所不能比擬的。

即使華文報記者擁有崇高的理念，卻必須面對社會地位卑微的現實。而在記者的自我認知裡，也因為現實環境的原因，使他們在面對掌握較多社會資源，占據優勢地位的外文報記者時，會覺得自己微不足道、自卑，處於卑微的地位。

G 記者：「我覺得他們（外文報記者）會有一種優越感，自我接受程度會比較高，而華文報沒有那種優越感。可能社團政治新聞的記者，會覺得自己很優越啦，好像 J 記者那種，因為掌握資源，接觸到大人物... 普遍上華文報記者會覺得自己微不足道。」

L 記者：「我是用四不像來形容，它（記者）並不是一個完完全全像香港或台灣那種被塑造成可能是很有社會地位的這種形象，在馬來西亞，不管你是普通新聞（記者），還是娛樂新聞，甚至是財經新聞，你的社會地位等於是微乎其微的，除非你是做到名主播，還是做到報界強人，否則的話你是完全毫無社會地位的。」

F 記者從華文報記者在政治環境下的弱勢處境，來分析華文報記者的在政府方面的接近性不如外文報記者。

F 記者：「中文報很多時候瞭解的就是華社、華團、華基陣黨。... 馬來主流政治的動向，... 政府關聯公司，這些東西往往最先獲得資料的是西報和馬來報。這也是為甚麼人家講說，懂得看中文跟英文的人首選是看英文報。因為英文報的新聞真的是 first hand 的，中文報很多都是翻譯他們的新聞。」

F 記者認為，華文報記者的政府消息來源接近性不強，導致華文報無法取得第一手消息，進而影響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產生自己能力不如外文報記者的自卑心理。而讀者群方面，也是影響華文報記者認知的因素之一，因為懂中英兩種語言的讀者首選是英文報，這除了是華文報的消息不如英文報靈通之外，也暗示了華文報在讀者群中的地位低落，進而使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產生卑微的心態。

除了上述結構性問題外，語言能力是影響華文報記者認知的關鍵因素。F 記者提到，華文報記者會感到自卑的原因主要是語言能力。這和語文的優勢地位有關。英文和馬來文在馬來西亞的地位較高，英文及馬來文報章的地位因此相對較高。由此，在占據優勢的語文報章工作，以及精通這兩種語文的記者，地位也隨著提高。在這種語言優勢決定社會地位的環境下，無法掌握和精通英文和馬來文的華文報記者，社會地位低落，衍生到記者的自我認知上，就因此感到卑微與自卑。

F 記者：「華文報的記者有個通病。我的看法，他們可能是內心的一種自卑，因為你對語文掌握能力不強，...中文報的記者沒辦法跟講英文、講馬來文的記者溝通。」

華文報記者自己也瞭解到本身的語言能力不如外文報記者那麼優秀，在記者會上的表現是沉默、被動的，只有等待外文報記者發問，再把內容記錄下來。

A 記者：「中文報你知道，大部分都不會發問，只有小部分會發問，那大部分不會發問的，只有聽西報記者發問，然後記錄下來，被動的。這主要是語文能力的問題。」

同時，A 記者也認知到自己語言能力的不足。她提到在專訪時還會事先擬好英文書寫的問卷，並看著問卷訪問。可見華文報記者語言能力的不足，影響他們的認知，讓他們感到自卑。

不過，和其他華文報記者比起來，III 報 N 記者的自我認知相對來得比較高。上面分析過，N 記者試圖通過建構外文報記者的他者形象和自己的特質符合，以脫離華文報記者這個群體，進入較為高階級的外文報記者群體。因此，他在自我認知方面，與其他華文報記者不同。上面引述影響華文報記者地位低落的有關談話，記者都把外文報記者當作他者作為敘述對象。但是，在 N 記者的敘述結構中，外文報記者是被納入 N 記者的自我，並屬於同一等級，而其他華文報記者卻成了 N 記者的他者。和外文報記者看待華文報記者一樣，其他華文報記者在 N 記者的眼中是屬於次一等級的群體。因此，N 記者的自我和他者剛好和其他華文報記者是相反的。通過把自我和他者的位置顛倒，N 記者在自我認知方面，潛意識地實現進入外文報記者群體的目的，在報界社會階級的光譜上，往上提升自己的地位，擺脫低人一等的社會階級。

在提到外文報記者會將自己當成是 *journalist*，因此他們的自我認知較高時，N 記者也補充：「我也當我自己是 *journalist*，因為我會分析你講的話，我會懷疑你，你要回答我的問題，而不是很多記者只是抄抄抄抄，抄完過後，回去對一下，互相討論要拿甚麼做頭，對一下數字，就回去寫新聞，也沒有人發問。」在這裡，華文報記者變成了「很多記者」，在敘述結構中成了 N 記者的他者。

同時，由於 N 記者服務的報館在華文報界屬於第一大報的地位，他也推斷基於報館的地位超然，旗下記者的自我認知也高於其他華文報記者。其他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無法與 III 報記者處於同一層次，主要原因是其他華文報的地位都低於 III 報。

N 記者：「他們（外文報）的自我認知價值很高的，他們自我定位的價值也是很高，所以我也是朝這一方面在做...我的自我認知不會低，其他報的可能會，III 報記者的自我認知會比其他報來得高。」

2) 華文報記者發問問題的自我認知

當華文報記者與外文報記者共同出席一項記者會，通常就出現有如 A 記者描述的這個情況：「中文報記者，大部分不會發問...只有聽西報記者發問，然後記錄下來」。在記者會的過程中，外文報記者可以很快地掌握情勢的進展，針對性地詢問新聞人物許多問題，他們詢問的姿態是很有自信的，問題很有深度、內容；有時候，外文報記者還會根據國內一些熱門課題向新聞人物詢問看法和見解，或者詢問報館從內部管道探聽的內幕消息。這時候，華文報記者通常是靜靜地坐在一旁聆聽，沉默不語，手上的筆飛快地在採訪簿上記錄記者會所有人的談話。外文報記者則鮮少忙碌地用筆記錄記者會內容。

針對這個所有語文報記者都印象深刻的典型官方記者會情景，不同華文報記者都有不同的自我認知。

IV 報的 L 記者就不認為時常詢問問題的外文報記者有多了不起，也不代表他們具有優秀的專業素質。雖然外文報記者認為不發問問題的華文報記者是不專業的，只會依賴外文報記者來獲取更多新聞點，但是，在 L 記者的認知裡，外文報記者充其量只不過是問題多，但問題的素質一般，甚至很「白癡」、「無聊」、「幼稚」，毫無專業素質可言。

L 記者：「媒體之間，西報馬來報和中文報，怎樣看對方其實是很奧妙的...西報馬來報就一直發問問題，他們把靜靜不發問問題的中文媒體，講成是靠他們來發問問題，很依賴他們，所以中文媒體是不專業囉。然後我們就聽他們發問問題，這個問題很幼稚、很莫名其妙，懂的人都不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在質疑他的專業，所以大家看對方的專業態度都不一樣。我們不問，不是我們不要問，是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問，但是有些中文報記者是有發問問題的...」

對於華文報記者通常都靜默無語，不發問問題的現象，L 記者的認知是，「沒有必要問」這麼多問題。因此，他是站在華文報記者的位置，對外文報記者以「瞧不起人」的態度看待華文報記者的姿態，深表不滿，也試圖為華文報記者平反，認為外文報記者的認知是錯誤的。

一直對外文報記者的專業素質大加讚賞，也認知到華文報記者的語言能力比較差的 A 記者，對外文報記者的反應沒有 L 記者那般激烈：「我們當然是聽的比較多，不敢發問，後來就會慢慢增加，專訪的時候，迫不得已就擬一個問卷囉，然後看著問卷來問，對方也瞭解，因為我們畢竟不像西報的記者那麼流暢...」她對於華文報記者不發問問題的現象，承認是華文報記者的語言能力不如人，並嘗試去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

O 記者則認為能力不足的華文報記者應該學習別人的勇氣和能力。當一些華文報記者認為外文報記者發問問題是無謂之舉時，例如 L 記者認為外文報記者「問了問題過

後，新聞不見他們寫的喔，是不是浪費時間？」，O 記者認為應該把外文報記者視為學習的對象。

O 記者：「（華文報記者）不然就批評人，那個記者問醬多做什麼又不會寫的。你想想人家有那個勇氣去問，你有嗎？（他們）有站起來的勇氣...他們是學習的對象。」

將自己的位置調整為外文報記者的 N 記者，把華文報記者視為他者，並和外文報記者看待華文報記者的觀點一樣，認為華文報記者的專業能力和素質不足。

同時，N 記者在記者會上和外文報記者一樣，是時常發問問題的記者：「有一位星報的女記者，她很喜歡跟我在一起，她說我們可以一起發問，一起攻擊，問到那個人可以講出我們要的東西，她反而覺得其他報的會比較靜不敢問，她對我的印象是我是一個很敢問的記者 ...」

但是，N 記者也有提到和 L 記者接近的觀點，即華文報記者其實並不是同行眼中不發問問題的記者：「我通常看到一些很多華文報的都不敢問，所以人家會有一種印象，認為華文報記者都是靜靜的，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這兩位記者的觀點雖然近似，但是從他們的敘述結構中，觀看者的身分是不同的。在 L 記者的敘述脈絡下，觀看華文報記者的人是「外文報記者」；N 記者的觀看者是「他自己」去看華文報記者。L 記者提到華文報記者「其實並不是靜靜的」，主要是為了糾正外文報記者的錯誤認知；N 記者提到的「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之前，他提到：「你要勇於發問，就好像現在上面也知道我是很敢問問題的人」，因此「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在這個敘述脈絡下，是要強調他是很敢問問題的華文報記者。

第四節 記者與報館

本節主要以記者為自我的位置，敘述報館作為記者的概化他者，在互動情境、建構的他者、行動策略和自我認知的情況。報館對於記者，是組織層次的概化他者，記者與報館的互動情況，涉及報館組織層面的問題，尤其是體制、規範、制度等組織性的架構，對記者的自我認知產生影響。

壹、個人（自我） vs 報館（他者）

當記者面對報館作為個人在組織層次的概化他者時，具有互動情境、建構的他者、行動策略和自我認知四種情況。在互動情境當中，記者受到的約束和自由度因服務的報館而異，同時，受約束程度和記者與報館理念契合度成反比，從記者敘述來看，越受約束的記者，與報館理念契合度越低。在建構的他者方面，記者根據和報館的互動經驗，在意識中把報館想像並建構為不同類型的他者，包括規範化的體制、自由程度不一的言論環境、充滿壓力的工作環境。在行動策略方面，記者通過自我調適，來面對體制規範和競爭激烈的報界環境。此外，記者在報館的組織層次具有的自我認知包

括，對升遷機會的認知，對報館名聲、影響力和地位的認知，以及受館方認同的認知。

1.1 互動情境：

在受訪記者當中，比較強烈感受到報館方面約束的記者，大部分是來自 III 報館的記者。他們在談到報館的約束和自由度時，言談中主要的他者是以「報館」、「館方」、「內部人爲」等字來指涉報館對記者的約束。在現實情境中，記者口中的「館方」是和「主任」重疊，但是根據記者言談中著重「報館」立場的情況來討論，會較符合受訪記者口中的他者。

互動情境的部分，記者在談到以「報館」作為他者時，主要是做爲個人的記者與報館的相互接觸中，所體驗到的外在意象，包括報館的約束與自由度，記者與報館理念契合，以及記者與報館理念不契合。這三種情況對於記者來說，與自我認知程度不同，這是記者與報館接觸互動了之後，發現的現象，而自我認知則是較傾向於結果，即記者所認知的內在感受。

另一方面，記者與報館的理念契合與否，與感受到報館的約束和自由度，可找到兩者之間互相連結的關係。感受報館約束的記者多傾向與報館理念不契合，而覺得報館自由度較高的記者則認爲與報館理念契合。不過，感受到報館的約束，但仍與報館理念契合的記者也大有人在，這主要取決於記者本身對於理念實現的要求程度。有趣的是，同樣的報館，對於不同的記者，他們是如何在與報館的互動接觸中，發展出幾乎是截然不同的看法與體驗。這個現象在 III 報館的記者身上是最爲明顯的。

1) 報館的約束與自由度

在 III 報館的記者當中，有 3 名記者在言談中提到報館對於記者的約束。其中，H 記者的感受最爲強烈，對於報館的約束也極爲反感。他是 3 名記者當中，年齡最大，資歷最深的記者，但是在位階上屬於「高級記者」，與另外兩名感受到報館的約束，但沒有強烈反感和異議的記者比起來，他在位階上，卻是低一層次的。

另外兩名記者，J 記者和 K 記者在 III 報館已經被升爲「首席記者」。J 記者在受訪時提到，在 III 報館裡，被提升爲「首席記者」的記者不多，總社只有兩個，外面的辦事處有一個。而本研究訪問的 III 報館記者當中，就有兩名是「首席記者」，應該就是 J 記者所說的總社這兩位。

J 記者在報界是相當有名的記者，在另一名受訪的也是 III 報館的 N 記者口中是屬於「明星記者」，另一 IV 報館的 L 記者也提到 J 記者是 III 報館「一姐」級的人物。她只有 32 歲，卻已經當上屬於第一大報的 III 報館的「首席記者」，從事記者有 10 年之久。教育程度是獨立中學，之後進入 III 報館的培訓班。培訓班之後就在 III 報館擔任記者至今。她主要跑執政黨國陣內第二大黨馬華的新聞線，以及和馬華部長相關的政府部門。

根據 J 記者的解說，III 報館的普通記者升到高級記者是要通過主管的推薦，由高級記者升到首席記者也一樣。在 III 報館，首席記者的英文職稱是 executive reporter，

在 III 報館內部的位階裡，則被稱為助理採訪主任，因此，首席記者在執行階層（executive level）內「算是主任」，僅次於管理階層（management level）。

另外，H 記者今年 44 歲，從事記者近 15 年，中學就讀於獨立中學，教育程度是台灣屏東農學院，也就是擁有學院的資格。在到台灣深造之前，他曾經在一家已經倒閉的報館當地方記者達 4 年。此外，他的興趣是寫作。據 II 報館的 G 記者告訴筆者，H 記者是一名大馬作家，「寫散文詩歌的，在文藝圈很有名」。雖然 H 記者擔任記者已有很多年的經驗，但是他目前的位階是「高級記者」，主要跑華團和文教的新聞線。對於記者在 III 報館的擢升情況，H 記者的看法是：

「在 III 報館是很競爭的，一看出去記者都要 50 個，每一年調職的制度可能不到 5%，機率很少。每年的評估是看記者的工作表現、年資，這是從客觀的方面來看；如果是以另一個因素來看，當然是主管的評斷角度不太一樣。所以有些人表現很勤力也不一定升職，在這個領域我們是接受的。」

另一方面，H 記者在訪談中提到有關報館的課題時，顯得較為小心謹慎，他不斷提醒筆者：「這個你不可以寫出來...只是讓你更瞭解一個現象、內部的運作...和你分享，讓你作分析用...不能用我們的言論來反擊 III 報館...」。從他對於報館的看法可看出他對報館不滿及反感，對報館給予記者的約束也感受強烈。雖然在環境的約束下，H 記者表現出小心謹慎的態度，但是他還是很樂於分享他對報館的看法。從 H 記者不斷地、重複地提醒中，筆者感受到報館之於他的一種無形的監督壓力，讓他謹言慎行。

在談到 III 報館在新聞的規畫上，H 記者提到記者不能隨便自己找一個題材來發揮，萬一寫好了卻不適合用，會變成「浪費」，而會造成「浪費」的原因是 III 報館內部每一段時期都有一份黑名單存在。

H 記者：「一些新聞規畫中，以館方的立場，它有一些限制。黑名單不太適合去問，尤其對 III 集團不友善的領袖、政治人物。館方沒有列出來，不過我們寫久了知道哪些人的新聞上不了新聞版。...可能是半年再調整一次。如果那個人本來對 III 報不友善，後來他通過一方面釋出善意或懺悔，那就可以回到新聞版面。」

對於 III 報館的自由度，H 記者給予這樣的評價：「言論自由還比較嚴，新聞的範圍還比較不開放。」

關於黑名單的情況，J 記者也有稍微談到，不過她沒有提到有「黑名單」的存在，只是約略談到這個情形。

J 記者：「我們比較有經驗的記者，就會摸清報館的接受底線。比如說我們知道有些人，並不鼓勵被採訪，即使你一直寫，你也知道他的曝光率不多。」

另外，在採訪的安排上，H 記者也提到如下情況，以強調報館對記者的約束：「採訪的安排上，派比較聽話的記者去採訪重要的新聞，比如馬華；如果是比較有魄力的主任兩邊都會派，才可以平衡報導；當然如果叫叛逆的人去寫，就會不符合他們的口味啦...鋒頭太露、很有主見的記者都沒有機會發展...沒有辦法自由發揮，受約束。」

上面提到的 K 記者，也是受訪者中另一名首席記者，他年僅 29 歲，就已經在去年升做高級記者，並在今年初被擢升為首席記者，和上面兩位記者不同的是，他是隸屬財經組，而 H 記者和 J 記者則屬於普通組。K 記者從事記者的工作只有 5 年，可算是筆者訪問的 III 報館記者中，年資最淺一位，但是他認為「在馬來西亞中文報，5 年算是比較資深的記者，因為我們的流動率向來比較高」。K 記者中學念的是國民學校，也就是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的中學，大學是念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在訪談過程中，K 記者對於問題比 H 更加小心翼翼，在回答之中有所保留，在回答之前也想了一會才回答。他顯現的特質是特別的謹慎、保守、小心、冷靜，不輕易透露對事物的看法。在談到工作的限制方面，K 記者透露：

「至於撰寫報導的立場...因為我們把那個稿寫出來的時候，是以記者的立場寫出。到報館的手上時，可能他們會覺得要照顧報館的立場。」

此外，K 記者在訪談中也隱隱約約表露出報館對記者無形的監督與控制力量：

我：編輯部刪改記者的稿件是因為法令？還是其他外來限制？

K：外來政治人物的干涉，館方內部人為，他們可能覺得新聞不適合，新聞嗅覺不同。

我：內部人為限制太多？

K：沒辦法批評

由此可見，H 記者從升遷機會、新聞規劃、主管對記者的手段，都感受到報館對於記者的約束，並對此在語氣中透露出不滿態度。但同是報館首席記者的 J 記者及 K 記者，他們與報館接觸過程中，發現報館的約束力，但並沒有任何批評及不滿的態度。同時，H 記者和 K 記者在回答時雖顯得謹慎，但兩人的反應仍略有不同。H 記者會通過不斷提醒來表現他的小心；而 K 記者則在答案中有所保留。兩人的反應都表現出報館之於記者無形的壓力和約束。

另一方面，四家主流報章被收購後，在編採政策方面，大多數記者並沒有感到和收購之前有太大不同。報界之間的新聞競爭還是存在，報館的路線和收購之前也沒有太大變化。大部分的記者認為，收購前後各報的編採是獨立運作和各自為政的。不過，依然有記者感受到收購後的編採干預，並對此干預不滿，任職於 V 報館的 A 記者就對此有強烈的感受。

A 記者：「某一些課題我們不能玩的，某一些雜誌，因為我們副刊專題要用很多雜誌，要參考別人的資料然後改寫，天下雜誌，V 報館不能用，只能限制是 III 報館的 privilege，只能 III 用，已經有一個 list 下來了，所有的有分量的雜誌，是 III 報館用的，次要的雜誌，蘋果啊，才歸到 V 報館那裡，對，很生氣！」

相較於四家主流華文報，另一家非主流的華文報就有受訪記者認為，報館給予他很大的自由空間和自主權，因此從中可以看出，主流報章和非主流報章對記者的約束力和給予記者自主空間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主流報章在體制規範上已經發展了很多規定，要記者服從遵守，而且在被納入世華媒體集團後，一些比較沒有嚴格規範的報

章，也需要遵守由集團的核心報館，即 III 報館所指定的規範。而非主流報章 II 報館，成立僅 6 年左右，還有很多規定有待建立，因此記者就有較多的空間在規範內遊走、發揮。曾經在 III 報館工作 2 年再跳槽到 II 報館的 G 記者表示：

「過來 II 報館後，我才發覺我在 II 報館享有這個空間，很自由的創作，不用遵從守則...II 報館給我的空間很大。」

2) 理念契合

在與報館的互動中，記者與報館理念契合與否，是記者可以體驗的較於外在層面的現象，與屬於內在層面的內心感受或自我認知有程度上的不同。與報館相契合的記者對自己的理念有一定的堅守原則，對報館理念也有一定瞭解。

J 記者：「我和報館理念相契合。如果不契合的話，我已經離開了。如果不能和報館最低的原則相契合的話，你沒有必要留在這裡拿一兩千塊的薪水。」

F 記者：「還符合，畢竟 II 報館跑的是比較貼近民生的路線。因為我們不需要服從於任何一個政黨，除了政府。我們不需要看馬華的臉色，也不需要聽民政的話，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約束。...II 報館有其他報章沒有的新聞和觀點，要走尖一點的路線。」

F 記者和 G 記者一樣都任職於年輕的 II 報館，年僅 30 歲就已經從普通記者升到副新聞編輯，在位階上是屬於 G 記者的下屬，主跑的新聞線是馬來政治和執政黨國陣內的第一大黨，巫統。在到 II 報館工作之前，他是在 IV 報館當普通組記者，來到 II 報館之後就一路從高級記者升為助理新聞編輯，到現在的副新聞編輯。

而 G 記者在 II 報館工作僅 6 年，才 31 歲就已經由普通記者升到高級記者、助理新聞編輯、副新聞編輯，現在是新聞編輯。他曾經在 III 報館工作 2 年，後來認為 III 報館是個規範化的機制，不喜歡記者的自主空間被剝奪，在 III 報館只能「唯唯諾諾，要反抗也被壓著」，因此才跳槽至 II 報館。在那裡，G 記者享受到在 III 報館所不能享有的空間和自由，所以他和 F 記者一樣，認為他本身的理念和目前服務報館的定位非常契合。

G 記者：「在 II 報的脈絡裡面做，寫出的新聞要不同的，勇敢的，不是其他報所寫的東西...我覺得 ok，符合我的理念。」

在 IV 報館任職高級記者的 L 記者，和他所服務的報館有著非常一致的理念，強調「穩重負責」。在整個訪談過程中，他非常強調法令對報館的威脅，強調身為記者必須瞭解法律的界線在哪裡，以免誤踩地雷，在新聞的處理上堅持「寧漏勿錯」的原則。

L 記者：「IV 報就是標榜『穩重負責』這個口號，所以我們記者都有一個基本理念，和 mindset，就是你必須對你的報導負責，都有這種心態，所以你寫出來的新聞不能夠隨便、亂來，必須穩重負責。」

在 IV 報館工作僅 4 年半的 L 記者，今年 29 歲，今年初剛被升做高級記者，是 IV 報館訓練班出身。他參加訓練班時，就已經被灌輸相關報館理念，因此潛移默化之下，本身的新聞理念和報館的不謀而和，可說是報館社會化的結果。L 記者在訪談中也自覺被這個環境社會化。

L 記者：「我被洗腦了啦，我是有這種心態，...我個人堅持，必須對新聞負責，因為可能會面對訴訟、法律的追究，所以必須穩重負責...已經浸淫在這個領域太久，就會被同化。」

N 記者在 III 報館工作 7 年，他的理念可說是和報館完美結合在一起，從他的言談間可發現，他以身為 III 報館的記者為榮，同時也因為 III 報館在報界的地位而充滿自信與自豪感。在談到本身的想法時，他經常把 III 報館的理念掛在嘴邊，也經常說「我們 III 報」，即把自我潛意識地和報館結合，形成不可分割的自我。也就是說，N 記者把服務了 7 年之久的報館納入為自我組成的一部分，原本的他者演變成了自我，於是他和報館沒有自我和他者之分，只有納為自我的 III 報館和做為他者的其他報館之分。因此，從 N 記者和 III 報館的理念契合度來看，記者的自我完美地和報館連結在一起，形成一個不僅是記者做為一個個體自我。

N 記者：「在新聞處理上我們都很謹慎，新聞不是譁眾取寵，一份報紙的報格由記者和編輯來決定，...我們每次跟進一些新聞大 case，我們都有加入新聞背景...III 報是第一大報，我們沒有時間去針對一件事，做一個專題。」

N 記者也強調 III 報館最新喊出的理念：「立足誠信，情義相隨」。他提醒筆者，「正義至上，情在人間」的口號是上一屆，「這一次的換了」。有趣的是，他是受訪記者當中，唯一一位能夠正確說出報館理念口號的記者，其他記者不是沒有留意，就是不知道報館的理念口號，甚至是沒有聽說過，有者還因為報館一直更換口號而忘記目前的口號是甚麼。

在提到是否有其他報館和 III 報的理念相似時，N 記者很肯定地說：「我們的理念，跟其他報館的理念未必是一樣的，雖然說我們是 under 世華媒體集團，但是我們是獨立運作，所以別報的理念未必是我們的理念，我們的理念也未必是別報能夠做得到的。」

3) 理念不契合

感受到報館對記者極大約束的 H 記者，在與報館的互動下，體會出自己的新聞理念和報館不契合，而在訪談中道出以下的感受。

H 記者：「我們認為這個訊息是可以融合兩方面的平衡，如果是政治的話，新聞才有平衡點，讀者願意看到...但是我們這邊有時候，比如某一個課題它沒有辦法做到。」

H 記者和 N 記者同是 III 報館的記者，也同是普通組的記者，只是採訪的新聞線不同。如果把 H 記者對於報館的認知，以及 N 記者把報館納入為自我的認知拿來做比較，會發現很有趣的差異，而且是天壤之別。在 N 記者的言談中，「我們」就

是他和報館的結合體，在說到「我們」的時候，就是他和報館的代名詞。但是，上述 H 記者的「我們」代表的是和報館有對立關係的員工立場，而報老闆或報館高層是和他距離遙遠的他者。而且，報老闆或報館對於 H 記者來說，自我和他者的對立關係來自於勞方和資方的對立，即資方無法滿足勞方的要求，包括工作滿足感和薪酬待遇。

此外，H 記者在言談間，不厭其煩地表示他透露的資訊，只是讓筆者作參考分析之用，例如「當然出自他的員工也是不太好，但是我們應該講出來」、「這只是一個現象，和你分享，讓你瞭解」。這些訊息顯示他的謹言慎行，但又不願意說謊的心態，可見報館對記者所施加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這相較於 N 記者和報館理念契合的情況有很大的分別。N 記者甚至和報館高層擁有相同的理念，自我和他者的距離可說完全沒有，還結合在一起。這種極端和矛盾的情況就出現在 III 報館的記者群內。

另一方面，同樣都是在 V 報工作的 I 記者和 A 記者，他們對於 V 報的報格和理念都抱著不能苟同的看法。不同於 IV 報和 III 報的大報路線，V 屬於小報類型，專以聳動的社會新聞和色彩鮮明的圖片引人入勝，以吸引中下階層讀者的目光，是最暢銷的夜報，一直以來占據夜報銷售榜首位，連貴為第一大報的 III 報在夜報市場也望塵莫及。對於 V 報一貫以來所走的小報路線，I 記者和 A 記者在理念上都無法與報館契合。

I 記者：「...我是大報出來的，在寫新聞時，會加一些生字上去，V 報卻不允許，（上面說）我們讀者層次是比較低下的，他們看不明，我不苟同上面的做法，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去教育讀者。」

A 記者：「它（V 報）的 target 就是中下階層，我們總編輯說，不要寫得那麼深奧，『豬肉佬佢都睇得明！』（廣東話）...因為我比較喜歡做一些所謂的大塊頭新聞...可是不行，我們要迎合市場...」

而他們會留下來的原因，據 I 記者的說法：「基本上，我會跳槽，不會因為主管是誰，只要誰給得到條件，我就去哪裡」，從中可看出，和報館理念是否契合，並不是他選擇報館的主要因素，只要薪水達到他的要求即可。而 A 記者也在訪談中一再地提到，就算再怎麼不滿，她還是要「糊口飯吃」。可見薪水對他們來說，是更為重要的考量。

雖然 V 報在業界的名聲、報格低於另外兩家大報，但其薪水待遇卻僅次於第一大報的 III 報。而不可不提的是，因為其夜報銷售量成績亮眼，使其在總銷售排行的名次排在第二位。據受訪記者透露，他們每年可獲得 3 至 4 個月之間的花紅，是 III 報館以外的所有報館中，福利待遇最優渥的報館，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 I 記者和 A 記者的理念就算和他們所服務的報館不同，卻還是願意留下來的原因。

1.2 建構的他者：

記者在有關報館層級的他者建構中，有三點較為明顯：一是把報館建構為一個規範化、體制化的機構；二是把報館建構為一個可發揮言論自由的環境；三是把報館視為工作壓力集中的場域。

1) 規範化的報館體制

表示非常尊重工作機構的理念和想法的 L 記者，隱約談到報館體制結構的強大，是身處在結構最低層的記者所不能碰觸的，唯有服從而已。

L 記者：「我是記者囉，我比較在乎新聞多過公司的政策與管理，但是不能夠忽視公司政策和管理，你只能夠說是去尊重，反映你的看法，至於公司政策與管理有甚麼變動，不在於你，所以只能夠扮演服從的角色。」

在 V 報館工作的 I 記者，也提到記者身分的渺小與報館體制的控制力量，以及他個人在體制內的生存策略，就是跳槽和嘗試新路線。

I 記者：「我們做小的，沒有辦法幫主管去決定，只能從旁提醒，...（報館的未來發展）這方面不由我們這些小的來擔心，對我來說是無所謂。如果真的很不屑，大不了跳槽去我比較 prefer 的領域...如果可以嘗試，我是會去嘗試。」

在 IV 報館工作的 D 記者，談到報館的體制時，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你選擇在這個集團工作的話，只能選擇接受它的規定。管理層有他們的考量，如果你在這個集團，就要接受它的遊戲規則，不接受就出去...否則在體制裡面罵，也改變不了甚麼。」

不管是哪一家報館，記者都或多或少感受到報館的體制，並瞭解身處在體制下，記者的地位是無法對強大的體制做出甚麼改變。在體制的規範下，記者的責任和權力僅止於新聞方面，即提供平衡和詳實的新聞報導，為讀者服務。

不過，也有一些記者認為過於規範化和體制化的報館對記者有所箝制，造成記者無從發揮才能，以致優秀的人才被邊緣化，而備受記者抨擊的報館主要是 III 報館，其他報館的記者則沒有這麼強烈地對報館的體制表示不滿。曾經在 III 報館工作過 2 年的 G 記者，大學剛畢業就到 III 報館工作，度過了 2 年被他稱為「放逐邊疆」的日子，他對於 III 報館的種種規範和箝制深表不滿。

G 記者：「我覺得 III 報館是一個規範化的機制，整個 system 進步到你不能改了，是扼殺創意的地方...（III 報館）規定了規矩，（新聞）要怎樣寫，你去到那個圈子你一定要遵從...因為建立了這麼久，已經有一個規範在那邊，只要 say yes，就可以了...」

相較之下，G 記者跳槽過去的 II 報館，卻給予他很大的自由空間，升職升得很快，短短 6 年就已經升上了新聞編輯，他甚至還可以和以前的上司一同採訪首相的新聞，如果他還是在 III 報館工作的話，是不可能得到這樣的機會。

G 記者：「那時（II 報館）是初創，由零開始，自主權會比較高。在 II 報館是對人，不是對整個機制，比較諮詢式，可以溝通討論，上司都很 ok，很多時候給我說服了之後我就照著我的意思去做，在 III 報館不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去了 II 報館之後，III 報館的上司跟我一起採訪（首相）阿都拉的新聞，那時他是副總編輯了。」

第七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部分主要分成研究結論和研究限制與建議兩部分。第一節的研究結論是針對前面提出的研究問題，以及根據研究分析劃分的不同概化他者的層次，來簡述焦點訪談及資料分析的結果。第二節提出本研究的限制以及未來相關研究可發展的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為三個部分，通過職業、組織和制度層面，來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角色認知。華文報記者在與這三種層次概化他者的互動情況中，由此發展的自我認知也隨著層次和概化他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這一節中，延續上一章研究分析的架構，分為三部分來討論，即記者與同行、記者與報館、記者與報業環境。

壹、記者與同行

在此小節，關於記者與同行的討論，劃分為記者和華文報同行，以及華文報記者和英文報記者兩部分。

一、合作與競爭

在華文報界，華文報記者的互動模式主要分為兩種，一是合作，一是競爭。由此互動模式，在職業層面可引申華文報記者具有兩種類型的自我認知模式。

第一類自我認知來自於同行互助合作的工作場域，在互相交換、分享和討論新聞的融洽工作環境下，華文報界缺少了互相競爭的激烈新聞戰。在互助友好的同行關係下，記者也缺乏主動尋找新聞的動力和積極性，被動地記錄消息來源提供的新聞素材。許多華文報記者被華文報同行認為是被動的錄音機或抄寫員，這與記者的日常工作有關。在隨時可以獲得同行幫助的工作場域，記者並不被要求勤於做新聞背景之類的功課，而是只要盡量把資料記錄齊全，化成文字敘述，產製報章需要的新聞量即可。在這種工作的例常規範下，記者不需要在記者會上挖出有素質的新聞內容，也不需要向新聞對象發問問題，只需要將日常工作量完成。在和華文報進行融洽友好的互動情境下，記者發展的自我認知是消極悲觀的，只把記者當成一份普通的工作。即使有新聞理念，也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被消磨殆盡，甚或是沒有任何理念，只為了糊口飯吃，維持生計，賺取一份薪水生活。表現出這類型負面自我認知的記者，具有的特徵為對主管絕對服從，並不要求工作自主權，沒有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新聞理念。但是，他們認為自己與報館文化以及報業環境不甚符合，得過且過，按時交稿，在時限內被動地完成日常工作，是消極的記錄員和抄寫員。

第二類自我認知來自報館之間新聞競爭的工作場域。記者基於不同報館風格和傳統競爭對手，出現搶奪獨家新聞的新聞戰，或者在新聞呈現和處理手法、新聞的準確

性和可信度、記者的能力素質和人脈網絡，出現相互比較、較勁的同行競爭關係。這種新聞競爭的互動情境，激勵和鼓舞了記者爭取獨家新聞的動力。但是，這種競爭情況並不像上一類融洽的互動情境般，出現在例如記者會的採訪工作場域上。競爭的互動情境並不是在前線的採訪現場發生，而是在幕後的新聞決策、新聞編輯，以及同行之間和主管之間的非正式審查機制的工作場域發生。記者由於法令的限制，無法報導調查式的揭露性新聞，除了通過人脈網絡獲取獨家消息，記者可獲取新聞的採訪場域就是記者會。而在記者會上，華文報同行之間的工作生態就是合作與互助，而同行之間也有不成文的共識，即不會在公開場合搜集獨家消息，因此報館之間的新聞戰就在幕後編輯和決策層面的工作場域產生，包括同行和主管之間的非正式審查機制。不同的是，同行之間的審查機制大部份是發生在採訪現場，同行互相溝通交流及討論時發生，其他競爭的工作場域則在幕後。由此發展的自我認知是相互比較之下記者對自我能力的肯定。其中可分為兩類，一是受報館地位影響，一是受新聞組別影響。不管是受到甚麼因素影響，擁有這類型自我認知的記者，對記者的工作都抱有一定的熱誠和崇高的新聞理念，也會儘量堅持自己的原則，要求擁有工作自主權，不隨波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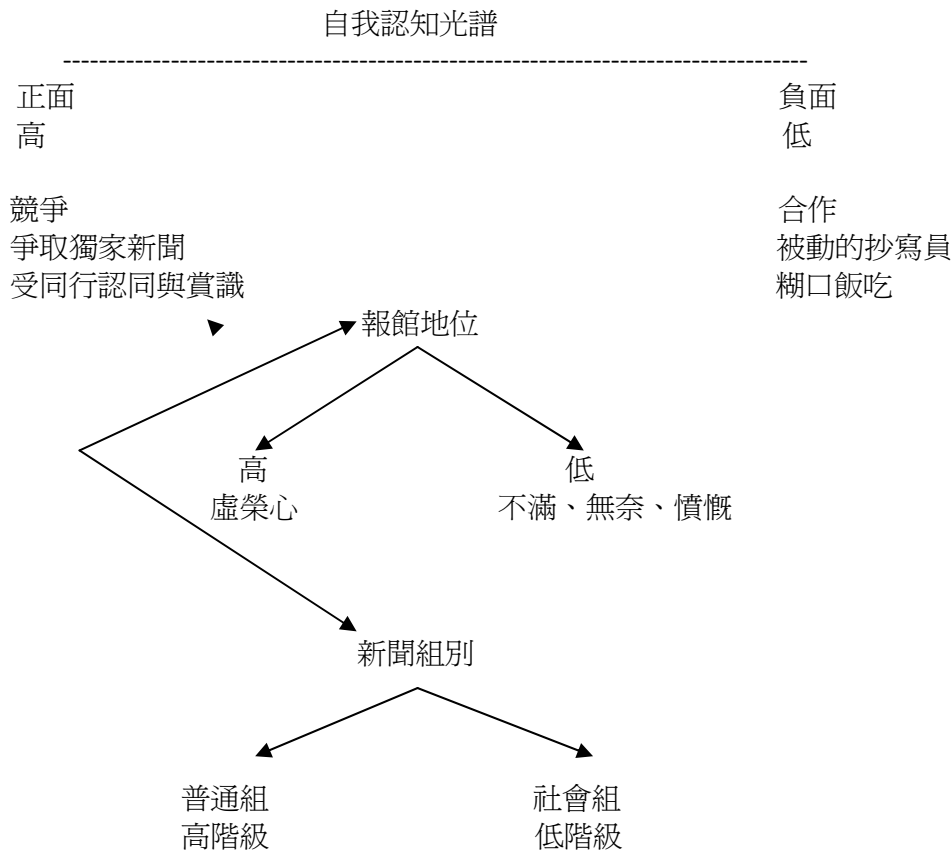
受報館地位影響的記者會因為同行看待報館以及旗下記者的態度，而發展正面或負面的自我認知。報館地位和旗下記者素質備受同行推崇，記者的自我認知會趨於正面，也會產生虛榮心；報館地位低落，報館名聲沒有得到同行贊賞和認同，旗下記者的自我認知也會走向負面，甚至感到不滿、無奈與憤慨。受新聞組別影響的記者則是以同行看待自己所屬新聞組別類型，而進一步產生相關自我認知。主要受新聞組別影響的記者來自社會新聞組，他們因為消息來源和語言掌握能力方面較弱，對其他組投以歧視的眼光感觸較深，進而產生負面和較低的自我認知。普通組記者則因為消息來源來自社會中上階層，且具備一定的教育程度，在報館內的階級較高，因此不會有類似的負面自我認知（參見圖 7.1）。

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界的脈絡下，除了如上述描述的較為極端的典型記者，也有記者是處於光譜的中間地帶，這兩種類型的自我認知可以同時出現在同一人身上，也會出現認知轉變的情況，這視乎記者在特定的工作場域和互動情境下，預設的概化他人為哪一類社會群體。

有部分較傾向於第一種自我認知類型的記者，卻具有第二種類型記者的某些特徵。一些記者雖然消極地把記者視為日常的一份工作，持有負面自我認知，對現實環境深表不滿，但仍抱有崇高的新聞理念；一些記者工作只為了糊口飯吃，但為在報館繼續生存，也必須爭取新聞上的表現，與同行競爭。

也有部分記者傾向於第二種類型的特質，但出現第一種類型的負面自我認知。一些記者擁有崇高理念，批評其他同行記者心態被動、消極，但基於報館地位低落而沒有得到同行肯定，無法產生正面自我認知；一些記者積極表現，爭取獨家新聞，但新聞組別在報館內的等級較低，無法獲得同行認同的眼光，自我認知也跟著下滑。一些記者則傾向擁有第二種類型的正面自我認知，但也會和其他同行互相合作，他們在記者會上會和同行互相分享和交流，但在獲取獨家新聞時也很積極，勤於做背景資料收集的功課，勇於發問，並獲得同行贊賞而有正面自我認知。

圖 7.1：合作與競爭—記者與華文報同行



二、讚賞與不屑

在馬來西亞報界，當華文報記者在採訪現場與外文報記者互動時，有兩種類型的互動模式，一是友善互助，一是陌生和不屑。由此互動模式，華文報記者形塑出對外文報記者的兩種態度，即讚賞與不屑。而由此延伸的華文報記者自我認知，具有四種類型，一是高人一等，二是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嘗試提升能力，三是不屑，四是卑微。

互動情境方面，第一類與外文報記者友善互助的華文報記者，他們會互相幫忙，交換消息，彼此沒有華文報記者之間的競爭關係。如果維持良好關係，外文報記者是很好的合作夥伴和消息來源。這一類的華文報記者把外文報記者視為專業人士，具有優秀的專業素質，和專業的工作態度。他們對外文報記者與報館之間的管理及編採作業達到專業水平感到讚賞，同時對外文報記者在採訪現場或記者會表現出的專業素質和能力大為賞識，並認為外文報記者語言能力良好，能提出有素質的問題，與採訪對象互動頻繁。他們認為外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很高，認知高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外文報記者的教育水平、語言能力和專業素質及態度。由第一類的互動情境和對外文報記者的形象建構，華文報記者發展出的自我認知是上述提到的第一類和第二類，即高人一等，和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嘗試提升能力，這兩種類型的自我認知。

第一類自我認知類型，是自我認知自己地位高人一等。在認同外文報記者的專業能力的同時，他們也將自己納入外文報記者的社會群體，認為自己與外文報記者屬於

同一層級，比其他華文報記者具有較高的階級，並通過提升自我認知，進入另一較高層級的群體，來擺脫原本隸屬的低階級社會群組，以顯示自己雖然是華文報記者，但在記者的地位階級上是高人一等的。在自我認知的光譜上，是處在最極端的一方，具有最正面的自我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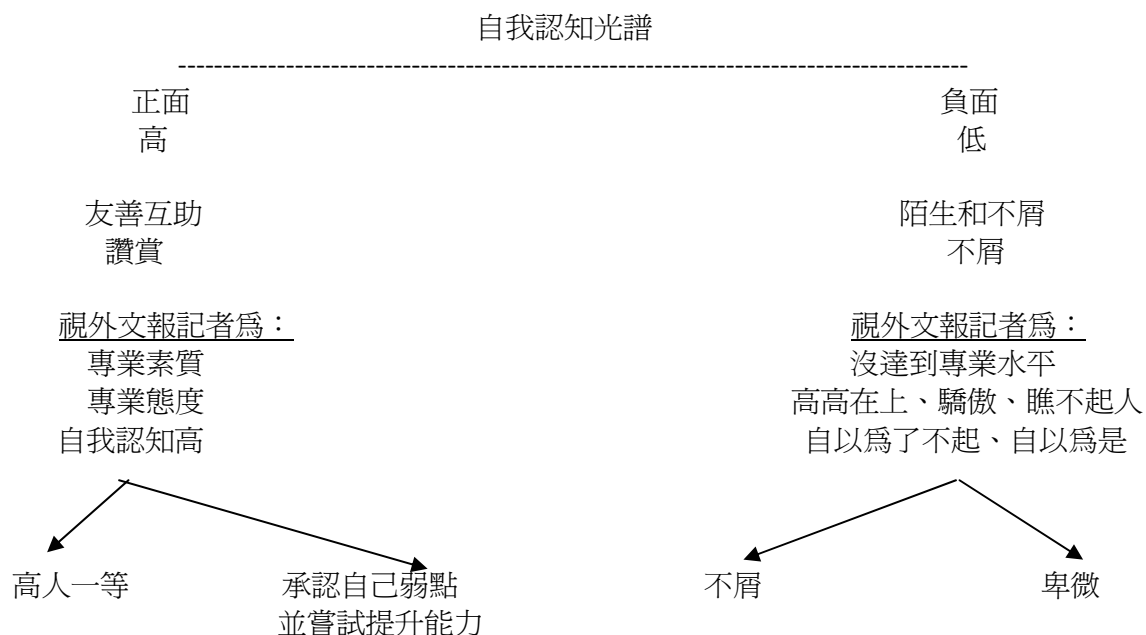
第二類自我認知類型，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嘗試提升能力的記者，他們並不會因為在專業素質上弱於外文報記者而感到自卑和卑微。他們對外文報記者的素質和能力大加讚賞，並以外文報記者為目標，以學習及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他們誠實地面對華文報記者地位低於外文報記者的實際情況，並反省自身的缺點和弱點，試圖從中改進。他們的自我認知是介於光譜的中間位置，並偏向高人一等的正面方向，對自己沒有過於負面的自我認知。

另一方面，從另一類型的互動情境，即和外文報記者的關係陌生，甚至不屑與外文報記者互動的這類型互動模式下，他們和外文報記者較少互動和溝通。主要是覺得友族或接受英文教育的外文報記者，他們的思維和接受華文教育的華文報記者不同，難以進行密切的交流，因此也沒有太多的交集，彼此之間感覺陌生和冷漠。此外，也有記者甚至認為外文報記者擺著一副既高高在上又驕傲的姿態，而不屑與他們溝通和交流，拒絕與外文報記者往來。在評價外文報記者的專業素質方面，他們都和上述類型記者持相反意見，認為外文報記者並沒有達到真正的專業水平，在新聞呈現方面還不如華文報的素質，只是稍微比華文報記者更易獲取有用的資源。他們認為外文報記者並不是自我認知高，而是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是，沒有專業實力，卻擺著一副高姿態，還有瞧不起人的樣子。還有一類對外文報記者抱著中肯看法的記者，他們也較少和外文報記者互動，但並不認為所有外文報記者就是專業人士，只有一些資深記者才達到專業水平，他們認為華文報記者群內也有資深且非常專業的記者。由第二類的互動模式和對外文報記者較為負面的形象建構，這類型的華文報記者發展出第三類和第四類的自我認知類型，即不屑和卑微。

採取第二類互動模式的記者，在發展自我認知方面，不屑和卑微在他們身上很難劃分，他們會對外文報記者自以為是的態度不屑一顧，與此同時也感到卑微、自卑和微不足道。他們的不屑表現在與外文報記者互動上，同時對外文報記者自以為專業的態度嗤之以鼻。對外文報記者產生不屑的自我認知，可說是對外文報記者自以為是的驕傲態度的一種反擊策略和心態，通過自我貶低外文報記者的形象，來遮掩華文報記者技不如人的實際情況，以及華文報記者地位低落的現實。在自我認知方面具有不屑類型的記者，之所以不能與卑微的自我認知類型加以分割，是因為在記者對外文報記者感到不屑一顧時，是因為他認知到自己的地位卑微，才衍生出和卑微看起來相反但實則因深感卑微而出現的激烈反應。不屑的自我認知和卑微比起來，在程度上並不及卑微那般負面，它是因較為負面的自我認知，而激發出來的傾向正面的自我認知，以提升或遮掩低一層次的自我認知。因此，不屑和卑微是息息相關，互相影響的。大部分第二類型的記者在感受到無論在報業內部結構和政治情況的結構性環境中，還是自身的專業素質和語文能力，都無法與外文報記者比擬，卑微的自我認知油然而生，也感覺到悲哀、自卑、微不足道。一些記者進而迸發出不屑的態度來面對地位卑微的情況。在自我認知的光譜上，卑微處於另一處極端位置，是最為負面的自我認知。由於不屑是由卑微心態衍生，試圖擺脫最負面的自我認知，經由貶低他者來提升自己的卑

微地位，雖力圖往正面方向前進，但不屑仍屬負面自我認知。它只是比卑微的自我認知稍高一級，但是處在負面自我認知的光譜那端（參見圖 7.2）。

圖 7.2：讚賞與不屑－華文報記者與外文報記者



貳、記者與報館

在此部分，關於記者與報館的討論，劃分為主流與非主流、大報與小報、大報與大報之間的關係，對旗下記者自我認知的影響與結果。

一、規範與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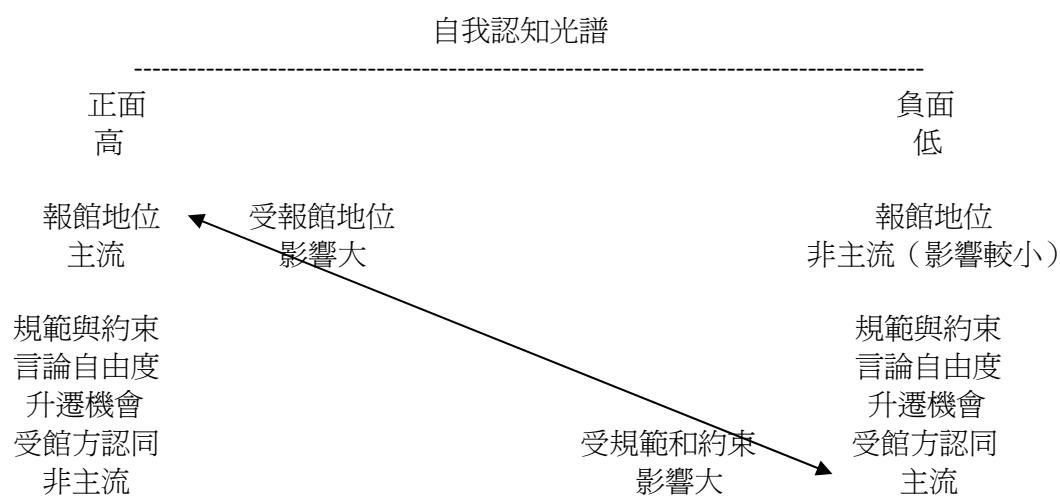
華文報界的四家主流報章和一家非主流報章在銷售量以及報館的影響力和地位方面，相差非常大。四家主流報章在銷售量遠勝非主流報章，主流報章的影響力和地位也因創刊歷史較長，累積的讀者群廣大，也不是非主流報章可比擬的。雖然報館在業界的地位會影響記者的自我認知，使記者在面對其他報館記者時，具有較高或低的自我認知，但是，受訪的記者中，來自非主流報章記者的自我認知仍然正面，報館的地位對記者的影響是有，但較微小。相反地，來自主流報章的記者，他們在組織層面呈現的自我認知差異性很大，因報館的銷量和地位受到影響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深受影響，因報館的名聲地位而具有非常正面的自我認知，有些則完全不受影響。但是，如果以報館的規範與約束、言論自由度、升遷機會、受館方認同的項目來看，非主流報章記者都一致呈現自我認知高的現象，而主流報章的記者，大部分在這些題項都不具有高自我認知，當面對報館這個概化他者作為一社會群體時，主流報章記者表現出負面和較低的自我認知。

非主流報章記者在報館作為組織層次的概化他人時，報館對記者的規範和約束不高，在報館內部層層階級的壓迫和限制不明顯，記者有較大的空間發揮他的新聞理想，享有較大的言論自由。除卻外在政治環境和法令對媒體的限制，非主流報章記者在報館的體制下，可任由發揮，掌握較大工作自主權，將新聞理念付諸實現，在工作上的學習和成長也很豐厚。除了記者在新聞處理方面獲得報館賦予的自由和自主，在報館體制的升遷結構下，也獲得更大機會。年資不滿十年的年輕記者可以在短短數年從普通記者升職到中階主管位置，受到館方認同與賞識。在工作成就感獲得滿足的情況下，非主流報章記者的自我認知隨之提升，呈現正面自我認知。

相較之下，主流報章的記者在報館系統化體制下，受到的規範和約束較大，無法根據記者的新聞理念，在層層管理的報館體制下，追求言論自由。記者在撰寫新聞時講求新聞至上，因為具備記者認為值得刊登的新聞價值，而把事件報導出來，但是館方處理新聞講求以報館利益至上，威脅報館利益和名聲的新聞課題，都不予以刊登。記者在實現新聞理念上無法達到滿足，工作自主權無法發揮，工作成就感不高，因而面對報館作為概化他人時，出現悲觀、消極的自我認知。有鑑於報館賦予記者無形的壓力與壓迫，記者表現出來的是小心謹慎，謹言慎行。即使獲得升遷機會和受館方賞識，卻意識到報館對記者的規範與約束，時刻警惕在意，小心發言，處處受束縛，自由度不及非主流報章記者。在體制方面，記者獲得升遷機會不如非主流報章來得容易，也較不容易受到館方注意和賞識。

然而，由於四家主流報章記者差異性頗大，受報館的規範與約束的程度也不一，且是和受報館銷量和地位影響的程度呈反比。因報館銷量或地位高而具有高自我認知的記者，和報館的理念契合度也高，自然受報館規範和約束程度影響不高，維持高自我認知的情况。不受報館銷量或地位影響自我認知的記者，並不會因為報館地位而具有高自我認知，反而因為與報館理念的契合度不高，受報館規範和約束程度影響較高，而具有低自我認知，呈現負面和消極的主觀感受（參見圖 7.3）。

圖 7.3：規範與自由—主流與非主流



二、寧漏勿錯與寧錯勿漏

報界以大報和小報來稱謂走不同路線、風格的報章。報章的風格對報章在業界的名聲、影響力和地位有直接的影響，也由此影響記者的自我認知。

兩家走大報風格路線的報章，記者對於這點的自我認知都高。大報風格的報章為維持在業界的良好影響力和公信力，對於新聞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都是經過再三證實才予以報導。記者也認同報章這種謹慎做法，認為新聞處理必須經過求證確認，而記者必須據實報導，對社會大眾負責。當記者抱著如此崇高的新聞理念，而又在大報工作時，記者發展的自我認知是趨於正面的。記者和報館都抱有寧願漏新聞，也不刊登錯誤訊息的新聞理想，即「寧漏勿錯」，是對社會懷抱正面價值觀和擔負社會責任的記者都認同的理念。由此推演，在大報服務，懷抱理想的記者，受報章風格影響程度高，具有高和正面的自我認知。

相反地，走小報路線的報章，記者面對報章風格問題，發展的自我認知較低，尤其是抱有正面新聞價值觀，要求新聞要有可信度，以及講求對社會大眾負責的崇高理念的記者，其自我認知受報章風格影響的程度大。小報作風的報章，對新聞處理講求快、狠、準，只要聽到消息，即使未經證實，都照樣刊登，所抱持的理念是「寧可殺錯不可放過」，即「寧錯勿漏」。這與小報占據夜報市場銷售量的情況有很大的關係。夜報新聞講求快和聳動，以吸引讀者注意和青睞。對小報來說，由於打著報導最新最快的消息為報章特色，漏新聞是絕對不能被允許的，即使只是收到風聲，也予以刊登，才能維持夜報一貫標榜的特色。一些抱著崇高新聞理念的記者，不苟同這種報章風格，自我認知傾向負面。

同樣走小報路線的《中國報》和《光明日報》，在夜報市場上占據首兩位名次，其中以《中國報》的銷售量為最高，市場佔有率超過一半，來自《中國報》的記者大部分都受報章風格影響，理念不契合程度高，出現自我認知低的情況。可是，銷售量較低的《光明日報》，記者的自我認知卻一致性地不受報章風格影響，也沒有受到銷售量不如人的影響，受訪記者都抱著高和正面的自我認知。究其原因，《光明日報》在四家主流報章裡規模較小，記者人數少，因此沒有嚴格的新聞組別之分，不管任何新聞線，記者都必須去採訪。記者受報館體制規範影響較小，記者不受約束，自由度高，是主流報章裡，記者享有最大自主權的報章。同時，也由於規模小，人數少，記者之間的凝聚力強，與報館理念的契合度高，對報館的忠誠度也較高。在和報館如此契合，工作環境自由，同事之間的歸屬感較強的情況下，記者的自我認知受這方面影響大，因而產生高和正面的自我認知。這和同樣走小報路線，但報館規模較大，記者人數多的《中國報》不同。後者新聞路線劃分清楚，制度和規範相較於《光明日報》也更為系統化，因此記者的崇高理念無法獲得實現，又在體制和規範束縛下，處於報館位階裡最底層的階級，所發展的自我認知是負面的（參見圖 7.4）。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于維寧（2004）。《馬來西亞《東方日報》之研究：在報業壟斷與政治干預夾擊下的生存之道》。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社會認同》，台北：巨流。（原書 Jenkins, R. [1996].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王國璋（1997）。《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
- 王賡武（1970）。〈馬來亞華人的政治〉，姚楠（編），《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頁 155-192。北京：友誼。
- 包凡一、王浚譯（1992）。《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台北：桂冠。（原書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古鴻廷（2003）。《教育與認同：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1945-2000）》。廈門：廈門大學。
- 任元傑（1985）。《協和民主的理論與實際—複式社會政治秩序與變遷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朱自存（1994）。《縱觀華報五十年：馬來西亞華文報發展實況》。吉隆坡：東方企業。
- 宋哲美（1963）。《馬來西亞華人史》。香港：中華文化。
- 李萬千（2001）。〈張曉卿：林良實的策略夥伴〉，林德順（主編），《報殤—南洋報業淪陷評論集》，頁 126-130。馬來西亞：飛腳。
- 林德順（主編）（2001）。《報殤—南洋報業淪陷評論集》。馬來西亞：飛腳。
- 星洲日報（2008）。《星洲日報—歷史寫在大馬的土地上》。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 胡幼慧、姚美華（1996）。〈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141-158。台北：巨流。
- 胡榮、王小章譯（1995）。《心靈、自我與社會》，台北：桂冠。（原書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孫中興（1993），〈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導讀〉，包凡一、王媛（譯），《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頁 ix-xxii，台北：桂冠。

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原書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United States: Sage.）

崔貴強（2002）。《東南亞華文日報現狀之研究》。新加坡：華裔館。

莊迪澎（2004a）。《強勢首相 vs 弱勢媒體：給馬哈迪的媒體操控算帳》。馬來西亞：破媒體。

莊迪澎（2004b）。《看破媒體》。馬來西亞：破媒體。

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台北：五南。

陳劍虹（1984）。〈戰後大馬華人的政治發展〉，林水豪、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頁 91-138。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陳鴻瑜（2006）。《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台北：翰蘆。

曾維龍（主編）（2007）。《黃絲帶飄揚—2006 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馬來西亞：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

黃招勤（2004）。《西馬來西亞華文報之發展與困境—多族群環境中報紙角色和功能的轉變》。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建成（1982）。《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係之探討(1957-1978)》。台北：文哲史出版社。

葉觀仕（1996）。《馬.新新聞史》。馬來西亞：韓江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系。

葉觀仕（1999）。《馬新報人錄》。馬來西亞：名人。

蕭瑞麟（2006）。《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台北：台灣培生教育。

羅文輝等（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巨流。

貳、英文部分

Arbee, A. R. (1990). Malaysia. In C. J. Hamelink & A. Mehra (Eds.),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in Asia* (pp51-67). Singapore: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Barrett, G. H. (1984). Job satisfaction among newspaperwomen. *Journalism Quarterly*, 61(3), 593-599.

- Benhabib, S. (1986). The generalized and the concrete other: The Kohlberg-Gilligan controversy and feminist theory. *Praxis International*, 5(4), 402-424.
- Brookover, W. B., Thomas, A. & Paterson, A. (1964). Self-concept of ability and school achievemen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7(3), 271-278.
- Brubaker, R. & Cooper, F.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1), 1-47.
- Chan, J. M., Pan, Z. & Lee, F. L. F. (2004). Professional aspirations and job satisfaction: Chinese journalists at a time of change in the media.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2), 254-264.
- Cheng, A. & Starks, B. (2002).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4), 306-327.
- Cooley, C. H. (1983).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5th e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Couch, C. J. & Murray, J. S. (1964). Significant others and evaluation. *Sociometry*, 27, 502-509.
- Denzin, N. K. (1967). The significant others of a college populati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7(3), 298-310.
- Dodds, A. E., Lawrence, J. A. & Valsiner, J. (1997). The personal and the social: Mead's theory of the generalized other. *Theory and Psychology*, 7(4), 483-503.
- Flick, U.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 Freedman, A. L. (2000).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 Gilley, B. (2000). Affirmative reac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3(32), 26-27.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omez, E. T. (1994). *Political business: Corporate involvement of Malaysian political parties*. Townsville: 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ern Queensland.
- Heng, P. K. (1992).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s of Malaysia. In Ruth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 (pp.127-44).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 Heng, P. K. and Sieh, L. M. L. (2000).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in Peninsular Malaysia, 1957-1999. In K. H. Lee, & C. B. Tan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p.123-168). New York: Oxford.

Heuvel, J. V. & Dennis, E. E. (1993). Malaysia. *The unfolding lotus: East Asia's changing media* (pp.146-160). New York: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Hirsch, P. M. (1977). Occupa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models in mass media research: Towar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In P. M. Hirsch, P. V. Miller & F. G. Kline (Eds.),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13-37). Beverly Hills: Sage.

Idid, S. A. (1989). Malaysia. In A. Mehra (Ed.), *Press systems in Asean states* (pp.41-56). Singapore: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Jayasankaran, S. (2000). A nation still divide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3(49), 26-28.

Kuhn, M. H. (1964). The reference group reconsidered.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1), 5-21.

Lee, K. H. and Heng, P. K. (2000). The Chinese in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system. In K. H. Lee, & C. B. Tan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p.194-227). New York : Oxford.

Mahathir, M. (1989).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ess. In A. Mehra (Ed.), *Press systems in Asean states* (pp.107-116). Singapore: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Mead, G. H. (1956). *On social psych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ton, R. K. & Kitt, A. S. (1952).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reference group behavior. In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Merton, R. K., Fiske, L. M. & Kendall, P. L. (1990). *The focused interview: A manual of problems and procedures*. New York: Free Press.

Miyamoto, S. F. & Dornbush, S. M. (1956). A test of interactionist hypotheses of self-concep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1(5), 399-403.

Montlake, S. (2008). Race politics hobbles Malays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71(2), 36-39.

Parker, E. S. (1982). Malaysia. In G. T. Kurian (Ed.), *World press encyclopedia* (pp.613-626). London: Mansell.

Phang, H. E. (2000).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In K. H. Lee & C. B. Tan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p.94-122). New York: Oxford.

Pollard, G. (1995). Job satisfaction among newswriters: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ism,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social attributes. *Journalism Quarterly*, 72(3) 682-687.

Quick, A. C. (Ed.). (2003). *World press encyclopedia: A survey of press systems worldwide* (Second Edition). Farmington Hills: Gale.

Regional outlook Southeast Asia 2006-2007 (2006).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Reeder, L. G., Donohue, G. A. & Biblarz, A. (1960). Conceptions of self and other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6(2), 153-159.

Safar, H. M., Sarji, A. & Gunaratne, S. A. (2000). Malaysia. In S. A. Gunaratne (Ed.), *Handbook of the media in Asia* (pp.317-349). New Delhi: Sage.

Samuelson, M. (1962). A standardized test to measure job satisfac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29(2), 285-291.

Schlenker, B. R. (1985). Identity and self-identification. In B. R. Schlenker. (Ed.), *The self and social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Shaver, H. C. (1978). Job satisfac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among journalism graduates. *Journalism Quarterly*, 55(1), 54-61.

Sherwood, J. J. (1965). Self identity and referent others. *Sociometry*, 28(1), 66-81.

Sieh, L. M. L.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laysian business groups. In Ruth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 (pp.103-26).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Stone, G. P. (1962). Appearance and self. In M. R. Arnold (Ed.),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trauss, A. L. (1959). *Mirrors and mask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Glencoe: Free Press.

Weaver, D. & Wilhoit, C. G. (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Weigert, A. J. (1983). Identity: Its emergence within sociological psych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6(2), 183-206.

Woelfel, J., Haller, A. O. (1971). Significant others, the self-reflexive act and the attitude formation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1), 74-87.

參、網絡資料

〈興都權益大集會特別報導〉，〈當今大馬〉。(2007年11月30日)。取自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75529>

丁國亮(2008年3月14日)。〈抗議檳州廢新經濟政策 約五百巫統馬來人示威〉，
《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08年3月14日，取自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php?n=6252>

金格（2008年3月4日）。〈本屆大選主軸：否決「巫統特權主義」〉，《當今大馬》。上網日期：2008年3月10日，取自 <http://malaysiakini.com/columns/79108>

楊凱斌（2007年10月31日）。〈林巴再也木屋興都廟拆遷衝突 四黨團律師被控警局鬧事遭扣〉，《當今大馬》。上網日期：2008年3月10日，取自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74196>

蕭方（2007年1月31日）。〈巫統亮出「馬來劍」 馬來西亞再陷種族主義泥沼〉，《鳳凰周刊》。上網日期：2008年3月10日，取自 <http://news.ifeng.com/phoenixtv/73007589264195584/20070131/907816.shtml>

Department Statistics of Malaysia. (n.d.). Retrieved February 29, 2008, from <http://www.statistics.gov.my/>

Freedom House. (n.d.). *Map of freedom 2008*. Retrieved August 27, 2008, from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2&year=2008&country=7440>

Freedom House. (n.d.). *Map of press freedom 2007*. Retrieved August 27, 2008, from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year=2007>

Hannah Beech (2008, February 28). Lowered Expectations as Malaysia Votes. *Time Magazine*. Retrieved March 14, 2008, from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717906,00.html>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n.d.). *Worldwide press freedom index 2006*. Retrieved August 27, 2008, from 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9388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n.d.). *Worldwide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Retrieved August 27, 2008, from 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4025

附錄：訪談問題

第一部份：個人背景

1. 性別
2. 年齡
3. 從事記者工作的年資
4. 教育程度
5. 教育背景（小學、中學、高等教育）
6. 大專／大學主修學科
7. 曾經工作過的報館
8. 目前和過去的職稱／位階
9. 目前和過去曾跑過的新聞線

第二部分：工作場域／新聞室／occupational

壹、人際關係

1. 記者階級（高級、明星）
2. 同事關係
3. 與主管、編輯關係（自覺服從？）

貳、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1. 新聞產制的例行操作
2. 編採政策／採訪策略
3. 獎懲制度
4. 工作限制／難題
5. 語言能力

參、理念／態度／價值觀

一、記者對以下觀念的看法

1. 工作自主權
2. 專業新聞價值觀
3. 專業倫理
4. 對爭議性編採手法的態度
5. 記者擔負的社會責任

二、記者在特定情境下的想法比較

1. 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或想法，和大馬報業環境符合嗎？有何不符／衝突的地方？為什麼？（institutional）
2. 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或想法，和大馬馬來文報以及英文報業環境符合嗎？有何不符／衝突的地方？為什麼？（institutional）
3. 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或想法，和大馬華文報業環境符合嗎？有何不符／衝突的地方？為什麼？（institutional）

4. 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或想法，和你服務的報館文化符合嗎？有何不符／衝突的地方？為什麼？（organizational）
5. 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或想法，和報社內其他記者的想法相近嗎？有何不符？為什麼？
6. 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或想法，和報社內其他組別（線路／類型）的記者想法相近嗎？有何不符？為什麼？
7. 根據你的理念，你認為你會較適合目前的線路還是別的線路？你認為你屬於什麼類型的記者？

肆、對職業的期許

一、記者對以下觀念的看法

- （一）工作的成就感
 1. 工作的挑戰
 2. 工作的社會影響
- （二）工作的目標
 3. 工作的學習成長
 4. 工作生涯的規劃

二、記者在特定情境下對職業的評價

1. 你認為馬來西亞人會認為記者是一種專業、有社會地位的職業嗎？為什麼？（institutional）
2. 你認為馬來人和印度人會認為記者是一種專業、有社會地位的職業嗎？為什麼？（institutional）
3. 你認為華人社會會認為記者是一種專業、有社會地位的職業嗎？為什麼？（institutional）
4. 你認為外文報社的記者會認為記者是一種專業、有社會地位的職業嗎？為什麼？（institutional）
5. 你認為其他華文報社的記者會認為記者是一種專業、有社會地位的職業嗎？為什麼？（organizational）
6. 你認為報社內的記者會認為記者是一種專業、有社會地位的職業嗎？為什麼？
7. 你自己會認為記者是一種專業、有社會地位的職業嗎？為什麼？

三、工作滿意度（工作主動創新機會、工作成就感、工作社會影響、工作自主程度、受人認同與賞識、學習新知識機會、同事關係、與主管的互動、報酬收入、福利待遇、升遷機會、工作穩定、公司政策與管理）

1. 選項中哪些是令你在工作上不滿的？為什麼？
2. 選項中哪些是令你在工作上滿意的？為什麼？
3. 你認為報社內記者會認為哪些選項令他們在工作上滿意？為什麼？
4. 你認為其他華文報記者會認為哪些選項令他們在工作上滿意？為什麼？（organizational）
5. 你認為外文報社的記者會認為哪些選項令他們在工作上滿意？為什麼？（institutional）